

前 言

唐贞观九年，叙利亚高僧阿罗本，自西域入长安，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此后二百年间，景教在中国传播，三起三落。唐太宗下诏传教，景教一度也有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繁盛。随后就是武则天圣历年间，洛阳的佛教徒闹事，景教危机，但很快复兴。玄宗登基，长安的士大夫开始诋毁景教，景教经历了又一次起落。“安史之乱”前后六十年，是景教最繁荣的时候。然后就是德宗建中年间士大夫再次攻击景教，虽然平安渡过此关，但好景已经不长。武宗会昌灭法，殃及景教，终成灭顶之灾。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这样落下了。

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在蒙元世纪到来，不仅景教复兴，天主教也进入中国。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刺和林，八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又前往蒙古，在哈刺和林拜谒蒙哥大汗。1294年，罗马天主教修士孟德·高维奴到北京传教，在北京、泉州等地设立主教堂，1307年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的大主教，统辖中国教区。不久鄂多立克

旅行到刺桐港，竟住在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士主持的教堂里。据说此时在中国的拉丁基督教教团，已有上千人。而景教徒则有数万之多。

从1245年柏朗嘉宾修士出使哈刺和林，到1347年约翰·马黎诺里从中国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基督教福音事业曾经在华夏土地上再次燃起希望，然而，很快又归于寂灭。元朝灭亡，传教士或跟着蒙古人亡命塞外或回返原籍，教皇此后半个世纪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一概下落不明。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的浪潮，又第二次落下。

中国这片土壤，是否适应于福音生长？基督教在西方，是一种“草根”宗教，到中国，却一再周旋在上层社会、外族人群，飞絮般地飘落中华，又飞絮般地零落。阿罗本将景教传入大唐中国，曾经有两个世纪的繁荣，然而，孟德·高维奴到北京传教，发现“中国这些地区从未来过任何一个使徒或使徒的弟子”。元代天主教、景教活跃一时，二百年后，耶稣会士再度到中国，巴瑞托在澳门写道：“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1582年，罗明坚、巴范济神父获准在肇庆建堂，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次福音的命运将会怎样？

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景教僧侣的功德，第二次主要是圣方济各会修士的努力，第三次则是耶稣会士“适应”式传教方式的成果。中国是一个独特的、高度文明的东方国家，在中国，基督教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归化中国，而是如何让中国先接纳他们。只有先“中国化”，然后才能使中国基督化。“利进士”开辟了“适应”式的传教道路，许多杰出的耶稣会士随后来到中国。17世纪初从广东到北京的帝国大道上，已有了4个传教点，近两千名中国人接



受了洗礼。南明皇室逃到华南的时候，一次就有五十多名皇室成员领洗。满清入主中国后，汤若望、南怀仁又受宠于顺治、康熙皇帝，他们用他们的知识与德行，创造了基督教入华传教的一段蜜月。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依旧好景不长。从广东到北京，耶稣会士扮成“大西洋和尚”或“洋进士”，穿起中国服装，学说汉语，读四书五经，介绍西方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帮助中国人制造科学仪器与火炮，带上自鸣钟、地球仪、三棱镜，贡献皇帝，结交权贵。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上帝，为了上帝在东方收获灵魂。当然，也有彩虹出现的时候，但最终，“礼仪之争”爆发，雍正禁教，耶稣会士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荡然无存。中华帝国有自足的政治经济体系与自足的文化思想体系，既不需要西方的财物，也不需要他们的上帝。

远游的福音，是否可能落户中国？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次浪潮：景教僧侣们的功德 1

- 一 想象阿罗本 1
- 二 许多世纪前福音盛行 6
- 三 大唐景教三起三落 12
- 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18

第二次浪潮：圣方济各会修士们的努力 23

- 一 去东方，九死一生 23
- 二 席卷世界的草原风暴 29
- 三 东方世界真让人捉摸不透 35
- 四 世间将只有一个家，一个牧师 43
- 五 野蛮人的家乡是世界的桥梁 48
- 六 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54
- 七 欧亚大陆一体化与“蒙古和平” 60
- 八 去东方，难有收获的旅行 68



九	条条大路通中国	74
十	剩下的好时光不多了	80
	第三次浪潮：耶稣会神父们的适应	85
一	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	85
二	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90
三	将财富运回家乡，将福音送到世界	94
四	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	100
五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	107
六	洋和尚在中国腹地游荡	112
七	皇帝的钦天监与上帝的传教士	119
八	信仰之光或科学之光	125
九	在沙皇与皇帝之间铤而走险	133
十	同时被皇帝与教皇抛弃	136
十一	第三次浪潮落下	139



第一次浪潮：景教僧侣们的功德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将在万事中经历祸福。

——《传道书》

一 想象阿罗本

迎春花开，春天就要到了。

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家乡远在叙利亚的景教高僧阿罗本，自西域入长安。大唐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西郊迎接。

这是一件大事，对当时的大唐皇朝，对日后的基督教，都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此行从何处来，很可能他在大唐西域到波斯一带传教，已有许多年，在突厥人、回纥人中，有他不少的信徒。^①人们

^① 方豪先生认为，景教顺利进入长安，必定已在西域传教多时：“贞观九年以前，阿罗本必定在长安以西，中国边境上，早就展开传教活动，并且一定是很有成就，深为人民悦服，然后有人报告太宗，才会有那样隆重的接待。就像利玛窦到北京之前，在澳门、广东、江西、江苏等处，先盘桓了二十余年。”（《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著，中华书局，1988年版，上，第5-6页。）景教传入西域吠哒人、突厥人间，当在南北朝至隋，参见高永久《西域景教考述》（《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刘仲康文《景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11期）。



在天山南麓高昌故城，曾经发现过叙利亚语、粟特语、中世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福音书以及部分传教文件，当地寺院的壁画中，也有景教内容，尽管这些文物的年代难以确定，但从字体判断，当不晚于隋朝。

如果不是阿罗本在西域传教久负盛名，朝廷也不会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大唐皇朝博恩广施，巡抚长驾。经营西域，一是要稳定边疆，抵御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二是要开通西去的丝绸之路，保证中原与中亚、波斯一带的交通贸易。军事远征、朝贡贸易、和亲政治，都是办法。但是，以暴力、利益、伦理维系的关系，总不如心灵与信仰上的关系更稳定。将他们敬若神明的高僧大德请到长安，从昭武九姓之地远到波斯、西亚，凡景教信众，自然心向长安。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是如何从西域或波斯到长安的。景教碑文说他“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未免轻率而笼统。阿罗本东来长安时，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已经八年了。我们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描述中，可以想见旅途的漫长与艰辛。如果从波斯出发，经昭武九姓国土（今乌兹别克一带），沿大清池（今伊塞克湖）东行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索尔岭），进入新疆境内，沿天山南麓继续东行，进入玉门关。天地苍茫，一路孤征远举，野尘荒风，冬则寒冷彻骨，夏则酷热难忍；夜则遍地磷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猛虎。可惜阿罗本没有留下任何史料记述他的旅行，不论在汉语还是在叙利亚语中。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生于何时何地，只知道他是叙利亚人，信奉景

5世纪末6世纪初希腊景教徒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著《基督教世界风土志》记：“在巴克特里人、匈奴人、波斯人和其他印度人……以及整个波斯地区，都有无数的教堂、主教和大量基督徒，殉教者为数很多，禁欲弃世之隐士亦不乏其人。”（《西域纪程录丛》，裕尔一考迪埃著，张绪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嚧哒人为突厥所灭，嚧哒人信奉的景教可能为突厥人继承，沙畹指出，“突厥人中既有基督教徒，则635年西安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阿罗本传教中国之事亦无足异矣。”（《西突厥史料》，沙畹著，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9页。）

教。在他年轻时代的某一天，跟着丝绸之路的商队，东去传教，或者边贸易边传教。从地中海到东海，穿越亚洲大陆，自古以来就有一条或几条商路，统称丝绸之路。贸易沟通世界，宗教分割世界的同时



胡人骑在骆驼上，穿越古老的丝绸之路，从西向东又从东到西。

也沟通世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货物与人流动，希腊人与他们的葡萄、雕塑，罗马人与他们的珊瑚、水银、琥珀、五色玻璃，安息人与他们的石榴、毛皮、金银制品，大宛康居人与他们的马、苜蓿、玛瑙水晶，印度人与他们的金钢、苏合、珠贝、郁金香、红兰花，中国人与他们的丝绸、铁器、桃梨肉、生姜、稻谷、麝香、大黄，从西向东又从东到西，沟通了欧亚大陆的古代世界。萨满教、道教、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一边用信仰将人分成不同的群落，一边也通过传教将相隔遥远的世界连接起来。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为什么到东方。景教保存了完好的早期僧官任命的文书档案，但其中找不到阿罗本的名字。也许阿罗本最初离乡时，只是某个叙利亚商队随队的景教僧侣。叙利亚商人大多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信徒，或者追随安提阿基督论教派，或者是坚定的聂斯托利信徒。也许离乡的时候，阿罗本本人就是位商人，前往中亚贩运宝石与皮毛。在漫长孤寂艰险的商旅生活中，突然感悟到那种神圣的力量，决定将自己尘世的生命，完全献给福音事业，就像那位著名的教友科斯马斯，早年去东方，追求财富，中年开悟了，守在沙石筑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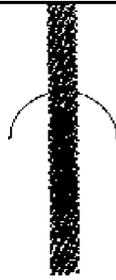


修道院里，在寂静与苦难中冥想苦行。前半生过得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商人，后半生过得像中世纪的苦行僧。科斯马斯可能也曾到过中国或中国边境的某个地方，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他不仅记载东方有“有无数的教堂、主教和大量基督徒”，而且还提到过一个地上天堂般的丝绸之国。从波斯前往这个国家，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另一条是海路，海路更远，到锡兰岛再向北。他说：“即使在地上也存在有天堂，那些由于受好奇心或贪婪心所驱使而想知道这一切的人们也会毫不延迟地冲去寻求之。因为，如果有人为了从事可怜的贸易而获得丝绸，那是不惜前往大地的最后尽头旅行的。他们怎会犹豫前往能享受看到天堂本身的地方呢？这一丝绸之国位于印度最偏僻的地方……”^①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最初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在西域很有影响的景教高僧，公元635年来到长安。他的同乡先贤，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托利，整整200年前，公元435年，因为不相信上帝竟然是一个女人生下来的两三个月大的婴儿，被罗马皇帝定为异端，流放到当年摩西带领族人流浪的沙漠地区。而从此，追随聂斯托利的信徒另立聂斯托利教派（Nestorians），开始向东方传教。阿罗本是他们中走得最远的一位，将景教福音带到东土大唐。

聂斯托利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东方分支。公元4世纪以后，以东罗马帝国为主的东方基督教，有四个中心，分别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与耶路撒冷。四座城市各有一位宗主教，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但在资历与威望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无疑高于其他三位。公元428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聂斯托利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这次任命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多出了一位宗主教，而在于多出了一种基督教教义和一个教派。

^①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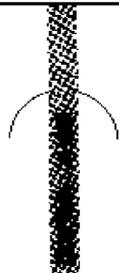
聂斯托利是一位有见解好争辩的人，也生在一个教义争辩异常激烈的时代。拜占庭从僧侣到工匠、从宫廷到民间，都热衷于深奥枯燥的教义论辩。纳萨的格里高利4世纪末到君士坦丁堡，发现那里人的教义论辩热情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你要某人给你一些零钱，他会对你基督的‘被生’和‘不被生’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如果你对一个仆人说：‘我的浴水准备好了吗？’他会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的。”^①

小人物争论大事，是一种游戏；而大人物争论小事，则有可能成为灾难。东罗马帝国早期，从4世纪初到9世纪初，是所谓七次公会议时代，教会论辩持续不断，争论的主题从三位一体神学到基督的位格一直到圣像崇拜问题，争论的结果是教派分裂与宗教迫害。有关基督的位格的争论，开始于如何理解基督是真实的上帝同时又是一个真正的人。聂斯托利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继承安提阿教会的基督论传统，坚持基督人性的完整性。他认为应该区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反对将马利亚奉为圣母，神性总不可能由一位女人产生，“上帝怎么可能是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婴儿？”

聂斯托利的观点遭到亚历山大教会的反对，罗马教会支持亚历山大教会，在431年以弗所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亚历山大教会圣西里尔一派在安提阿学派代表到会之前，抢先控告聂斯托利为异端，会议决定罢免其一切教职。起初拜占庭政府支持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支持聂斯托利。罢黜聂斯托利的决议做出四天以后，安提阿学派代表到会，推翻了决议，并另召开会议，宣布罢免圣西里尔与以弗所教会监督梅农，而几天以后到会的罗马教会代表，又宣布罢黜安提阿主教约翰。

宗教论争乱作一团，破坏了帝国的安定团结，拜占庭皇帝出面裁

^① 《牛津基督教史》，（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决，安提阿教会背弃了聂斯托利，狄奥多西二世最终宣判聂斯托利为异端，放逐到帝国西南部的沙漠地区。聂斯托利被迫害致死，他的追随者们，形成聂斯托利教派，向东方发展，在叙利亚、波斯、阿拉伯、中亚、印度传教，200年后，阿罗本将他这位同乡的教义带到大唐中国。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阿罗本辞别他远在地中海岸的家乡，从叙利亚穿过古老的伊拉克地区东去，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波斯、中亚，又用了多长时间才最后到长安。而到了长安，就到了终点。大唐皇帝的礼遇是隆重而宏厚的。在皇宫“问道”、在书殿“译经”，三年以后，感动或取信了太宗皇帝。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那年初秋时节，皇帝的诏书下达了，肯定他的教义济物利人，准予传教，并在义宁坊造大秦寺，度二十一位教士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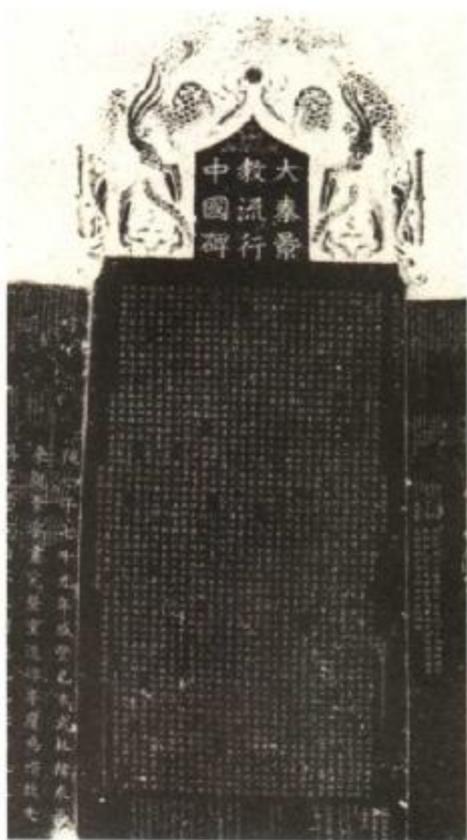
关于阿罗本，我们知道的实在很少。如果不是990年后，陕西盩厔（周至县）的农民挖坟偶然发现一块石碑，利玛窦的一位中国信徒从碑刻中认出福音消息，人们可能永远忘记了这个人在这段事。^①“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摠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二 许多世纪前福音盛行

皇帝下诏，景教“宜行天下”。这是基督教传教史上的大事。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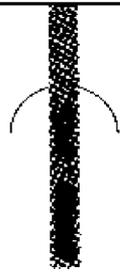
^① 有关“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见《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42页。

之后葡萄牙人华传教士曾德昭听说“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感到格外欣慰，甚至兴奋：“一线光明使我们从冥昧中解脱，有极清楚的证明，许多世纪前福音已经盛行……”他将深奥的汉语铭文译成拉丁文，附在他的《大中国志》中出版。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大唐皇帝下诏说：“道或真正的教义是没有定名的，世上的圣人也不止一位。教义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目的是给全人类带来好处。在大秦国，阿罗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来自遥远的异邦，带来经籍与图像，在长安传播。在认真审视他的教义后，我们发现教义深奥玄妙，却简洁合理。这样的宗教，济世救人，宜于在我们国家传播。”^①



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立。

^①《大中国志》，（葡）曾德昭著，李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9、193—194页，引用时译文有所改动。



阿罗本到长安，唐太宗下诏，景教“宜行天下”。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起点。虽说此前基督教也有可能进入中国，但大多是些捕风捉影的传说：一说保罗西去传教的同时，圣多马东来，先到印度马德拉斯，后往中国布道；二说是使徒多马和巴多罗买往东方传教，圣多马在印度，圣巴多罗买则到了中国；三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基督徒逃难到东方，将福音传入中国；四说见罗马人阿尔诺比乌斯的《驳斥异教徒》（约公元300年成书）记基督教在丝人国传播。诸如此类等等，还有中国方面的佐证。明初江西卢陵出土了一个三国时代的铁十字架，刻有孙吴赤乌年号（238—250年），十字架上的对联令人联想到基督受难的教义，所谓“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还有人在汉画像石上发现圣经创世纪的图像，有上帝创造世界、夏娃被蛇诱惑的故事。但凡此种种，都无可稽考，如果不是“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人们还真无法确定中国的基督教始于何时。

中国的基督教始于盛唐。阿罗本生在一个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公元630年初春，也就是阿罗本到长安五年前，定襄道行军总管与通漠道行军总管率部击破东突厥汗国，俘获十几万人、几十万牲畜。唐太宗李世民从骊山温泉回宫，大赦天下。三月三日，几十名蛮族酋长、君主，跪在皇宫门前，请求李世民接受他们奉上的尊号：“天可汗”。“我是中国天子，难道还要兼作可汗不成？”李世民故做姿态，文武百官、四夷酋长，随之山呼万岁。此后，李世民每对西域颁发诏书，都不忘记署上“天可汗”。心情好的人总是宽容大量，天可汗历数了被俘的东突厥颉利可汗的五条罪状，又赫免了他。这位野蛮人一时激动得痛哭流涕。他被安排到太仆馆，吃好喝好，此生从此休了。那是多么好的年头啊！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太上皇李渊在凌烟阁设筵，款待他那出色的儿子，同时还有高官、贵戚，晚风透着花香，月色清朗，半醉半醒之间，李渊亲自弹起琵琶，世民随声起舞，人生得意，莫过于此。

大唐盛世，文治武功，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也是公元纪年第一个一千年世界文明的顶点。如果说中国由来已久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幻梦还曾有一度接近现实，那只能是唐



唐猎骑胡俑。

贞观之治时的中国。那时候，世界走向中国，四邻蛮夷，归服贡献，万里之外，商贾远来。“天可汗”命令凉州都督李大亮在碛口（今哈密市东）设驿，招待远来的贡使，李大亮上疏说：“要归服远方的异族，必须先安抚近地的邻夷，世界是一颗树，中国是树根，四方蛮夷是树叶……”

大道如青天。李白仗游长安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广州、扬州、洛阳、长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天竺人、波斯人、大食人、僧伽罗人、爪哇人、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高丽人、日本人，在城里都有自己的居住区，他们在中国贸易、定居，数不清的波斯船、大食船、昆仑船，装载着没药、珍宝、丝绸锦缎，停在城外珠江的江面上，暖风湿润，夹着两岸荔树、柑橘树、黄花、玉兰的清香与沉醉的人烟味儿。运河从南到北，帆樯连绵不断，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为繁华，公子王孙与落魄文人去那里花钱，胡姬夷商则去那里挣钱，歌台舞榭，十年一觉，扬州旧梦。南方城市充满生气，但总不够富贵雍容，洛阳长安，宫殿深院、兵营市集，有千年的历史。番商从南海来，大多住广州，从中亚来，则到长安或洛阳。洛阳有南市，长安有东西两市。珠翠珠宝、珍禽异兽、蛮

花胡草，应有尽有。康国、吐蕃的龙马、皮毛，大食的驼鸟、没药，回鹘的骆驼、毡毯，天竺的孔雀、菩提树、红白莲花，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吐火罗的狮子、老虎，大秦的珊瑚、琥珀、水晶、玻璃，波斯树脂、麦加香膏、梵夹、蛮笈、



唐猎骑胡俑。

高丽纸，各种来自远国绝域的商品，杂陈市面。长安是世界之都，胡僧胡姬、胡乐胡声，街头可以看到波斯的流亡公子，大食的商人、回鹘的高利贷者、日本的留学生、龟兹的乐人舞伎、非洲或爪哇的昆仑奴、突厥的俘虏。皇帝崇黄老，但也宽宏大量，道无常名，圣无常体，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袄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和平相处。

公元635年阿罗本到长安，正值大唐皇朝盛极一时。在那个开放的时代，景教在中国获得的不仅是尊崇，更重要的是宽容。唐高祖尊立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盛行一时。民间多信佛教，此外袄教自波斯传入，敬火为天神，又称拜火教，摩尼教从袄教分出，加入部分佛教景教教义与仪式，另立派别，来华的波斯人、回纥人，大多是袄教、摩尼教徒。袄教、摩尼的寺庙，也成为胡人留居中国的栖身之地。我们不知道当时唐朝百姓究竟有多少信奉景教，很可能景教信众，也主要在流寓中土的胡人中。



唐骑骆驼胡俑。

华夏文明是一个相对隔绝的世界。亚历山大东征停止在兴都库什山，秦国统一的大业开始。秦汉建立了中华帝国的基本制度与规模，并完成其古典时代。雷海宗先生将中国四千年历史分为两大周，分界线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①此前的中国是古典的中国，在血统与文化上都是纯粹华夏民族的；此后北方胡族不断入侵，淝水之战苻坚失败，南迁的华夏文明不但没有灭绝，反而在二百年内同化了胡人。隋唐帝国在汉胡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将中国文明推向新的高峰。唐朝是一个世界帝国，血统上胡汉混血，文化上梵华合一。国都长安是世界中心，一个开放的、生机勃勃的、高度城市化与审美化的世界中心。阿罗本在一个最恰当的时代将景教带到一个最恰当的地方，从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景教“宜行天下”到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二百年间，景教在中国享有了一段黄金时代。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何时何地去世，可能在高宗当朝的某一年，可能就在长安义宁坊的大秦寺。不管怎样，他是幸运的；在尘世间的最后日子，他一定感到欣慰。高宗李治继承唐太宗的宗教宽容政策，优待景教，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诏令各州设置景教寺庙。大唐天



唐牵马胡俑。

^① 《中国文化的两周》，见《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著，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0—202页。



下，“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广大的世界类似家乡，对于一位传教士，上帝在哪里，家乡就在那里；福音流布到哪里，那里就光明一片。在汉语里称“景教”，取的正是“光明”之意。

从罗马故地到东土大唐，阿罗本走到尘世土地的尽头、生命的尽头。12个世纪以前，犹太先知以赛亚曾预言，到那时，“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9章，12.13）美好的预言有望实现了，在秦国的土地上，如今生息着许多上帝的信徒。

三 大唐景教三起三落

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阿罗本将基督教带入中土，此后200年，福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长，三起三落。唐太宗下诏传教，景教传播出现第一次高潮。随后就是武则天圣历年间洛阳的佛教徒闹事，景教危机，但很快复兴。玄宗登基，长安的士大夫又开始诋毁景教，景教经历了又一次起落。“安史之乱”前后60年，是景教最繁荣的时候。然后就是德宗建中年间士大夫再次攻击景教，虽然平安渡过此关，但好景已经不长。会昌五年武宗灭佛，殃及景教。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的第一次浪潮，终于结束了。

景教在大唐200年，三度兴衰起落。首先是武则天圣历年间，以用壮和尚为首的一批佛教徒，在洛阳攻击并试图驱逐景教，几乎酿成危机。有幸的是，一位名叫阿罗憾的番将，信奉景教，曾经随高宗东征高丽，西伐突厥，战功赫赫，如今又召集番客胡商，适时在洛阳城外为武则天修了一座颂德天枢：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后欢心，自然谁也动摇不了景教的地位。更何况当时唐朝军队多番将，其中不乏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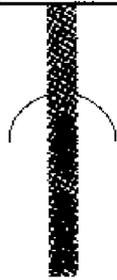
奉景教的。

景教进入中原，依靠的往往不是信仰的力量，而是世俗的力量。大唐皇朝要稳定西域、利用番将，景教有了进入中土并在中土传播的机会。阿罗憾是著名的番将，出生入死，可能还是著名的建筑师，《新唐书·则天皇后传》记载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为柱式建筑，其“八面”柱式造型，完全是希腊建筑风格。阿罗憾的军功与技术，挽救了阿罗本开辟的福音事业。睿宗即位那年（公元710年），他显赫的一生结束了，据说他的名字题在麒麟阁，肖像也列到云台阁的武将群像中。然而，对于景教，这只是系列灾难的开始。

第二次危机在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年）出现，威胁来自信奉儒家的士大夫。好在玄宗依旧开通，有惊无险，又恰逢及烈主教到广州，“广造奇器异巧”，通过广州市舶使周庆立，晋献朝廷。得皇上后妃宠幸，景教再次幸免于难。在中国，皇帝总是比上帝更有力量。不论是阿罗本、阿罗憾，还是及烈和后来到来的佶和，总是先讨得皇帝欢心，才有机会使上帝深入人心。而且，他们讨得皇帝欢心的办法，往往不是教义福音，而是某种“奇器异巧”。及烈主教在广州如何传教，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结交当地官吏，广造奇器巧异。《新唐书》与《册府元龟》都有记载，有一位名叫柳泽的殿中侍御史，弹劾市舶使



大唐军队中，许多是胡兵蕃将。



周庆立，雕镂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物，以谲怪为异宝，求媚圣意，紊乱圣谋，摇荡上心，诸如此类等等。^①至于所造所献之“奇器巧异”是什么，人们只能猜测，可能是记时鸣钟，因为《旧唐书》记载过拂菻都城的记时鸣钟，也可能千年之后，利玛窦神父到广州，献的也是自鸣钟，人们可以自由联想。^②

景教两度危机，两度复兴。及烈主教来华后的几十年，景教在中国传教，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玄宗皇帝诏令他的兄弟亲临景教寺设立神坛，又派大将军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写真画像及弓箭等遗物，安置到寺内供奉，还送了一百匹丝绸的贺礼。天颜在此，谁人胆敢造次？其实，大唐皇帝也未必真正认同景教，平衡各派宗教文化势力，只是一种统治策略。对于一个胡汉混血、梵华合一的皇朝来说，这种平衡尤其重要。胡人从商从军，汉人多从农从文。胡人信奉所谓“三夷教”：袄教、摩尼教、景教；汉人则信佛崇道，讲究诗书礼仪。任何一方势力压倒另一方，对架构其上的皇权来说，都是危险的，“安史之乱”就是一个教训。

及烈主教是阿罗本的同乡，曾两度来华。第一次在开元三年，乘船从海路来到广州。第二次在18年后，和波斯的人贡使臣一道，可能

① 《新唐书》卷112《柳泽传》载玄宗开元中“市舶使周庆立者，呈现奇器为柳泽所劾”。《册府元龟》卷546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必矣。窃见庆立等雕镂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物，以谲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汨乱彝典……今庆立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

② 朱谦之指出：“景教僧及烈和市舶使周庆立所设计的‘奇器异巧’，一定是达到当时机械科学的最高峰。恰如利玛窦之上自鸣钟、日晷、地图一样，是珍奇物品，景教徒献上宫廷作为结纳权贵的手段，是会使唐皇帝惊心动魄的。所以后来及烈竟得到宫廷之宠，给景教恢复了名誉。”同时他还提到，《旧唐书》卷51《后妃传》记载：“扬（扬州）、益（益州）、岭表（广州、交州）各地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擢居高位”，认为“这显然是市舶使周庆立的异曲同工，也许和波斯商人或景教僧之制造有关联。”见《中国景教》，朱谦之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2—73页。

是作为翻译或向导。^①伊斯兰扩张，萨珊波斯为大食所灭，伊斯兰军团已经进逼中亚，及烈主教与波斯的人贡使臣一道来朝，可能是求援的。一个世纪以前，阿罗本离乡的时候，叙利亚还是东方基督教的天下，四大哈里发发起的伊斯兰扩张时代还没有到来，宗教信仰方面虽有你死我活的论争，也都是在一个基督的名义之下。如今不同了，先知穆罕默德发动的圣战，已经彻底改变了旧世界的格局。哈里发欧麦尔的大将哈立德全歼希拉克略皇帝的军队，西奥多拉斯将军战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落入贝都因骑士之手，号称“拜占廷粮仓”的埃及也陷落了。几乎在向西扩张的同时，欧麦尔的将军瓦噶斯出征伊拉克。波斯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陷落，波斯国王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在伊朗高原东奔西走15年，终于被木鹿附近的一个磨坊主杀死。他的儿子卑路斯带着一些遗臣逃到唐朝的长安，最后客死中国。伊斯兰军团继续向东方挺进，不久将在怛逻斯战役中遭遇大唐帝国。

及烈主教两度来华，似乎都不是专程传教的，总有商务或政务在身。但不管怎样，他的到来似乎跟景教中兴相关，至少



丝绸之路上的大食商人。

^① 《册府元龟》卷971记：“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蜜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又卷975：“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蜜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另一说，相隔18年分别从海路与陆路来中国的及烈，同名不同人。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著，中华书局，1988年版，上，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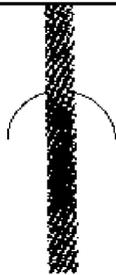


“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这样记载的，说他“共振玄纲，俱维绝纽”。景教在中土繁荣的时候，也是景教在东方传教的黄金季节。当时在木鹿、哈烈、撒马尔罕等地，景教均设有大主教区。天宝三年，又一名景教大德高僧佶和，来到中土。阿罗憾曾经作为军人、建筑师出现，及烈作为技师或使臣出现，而佶和则首先作为历法师或星相学家出现。所谓“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玄宗皇帝宠信佶和，诏令他和罗含、普论等17位教士，在庆兴宫为玄宗献祭祈祷，并为景教寺题名。那时候人称景教为“波斯经教”，景教寺庙为“波斯寺”，而景教传教士为“波斯僧”。如果不是萨珊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人多改信伊斯兰教，人们甚至想不起将它与波斯的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相区别。波斯寺改称“大秦寺”。景教当局，为了避免和回教及波斯的祆教相混，请求玄宗下诏将波斯景教寺改名为大秦景教寺。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玄宗诏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①

贞观九年阿罗本将景教带到大唐都城，景教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年了。两次危难，两度昌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似乎更有气象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歌颂玄宗皇帝，说他的恩宠比南山高，比东海深：“宠贲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这是景教在中国最有福的时节，即使不久到来的“安史之乱”，也没有威胁到景教的福音事业。

“安史之乱”起于番将，安禄山有粟特和突厥血统，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胡种”。但平定叛乱，唐朝依旧倚重番将，与郭子仪一同平叛的大将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有回纥血统。作为番将胡商的信仰，景教依旧得到皇帝的关照。据说郭子仪帐下，还有位著名的景教徒伊斯。他来自小王舍城（即巴里黑 Balkh），和而好惠，闻道勤行；术高

^① 《唐会要》卷49。



三代，艺博十全，很可能带来不少景教徒勤王，参与过收复两京的战役。^①也可能是为了感谢他勤王之功，为了安顿他那些信奉景教的兵将，肃宗皇帝诏令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教寺。

景教在东土大唐传教，从贞观十二年景教“宜行天下”到会昌五年武宗灭佛，二百年历史以“安史之乱”前后为界，可以分为两段。前一百年逐渐繁荣，后一百年逐渐衰落。肃宗皇帝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教寺，代宗皇帝每逢圣诞之日，赏赐天香、分发御食，德宗皇帝即位，颁布“九种治理天下的大法”，维新景教。好不风光！那是公元780年的事，第二年，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之年。当时身兼景教“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的叙利亚人景净，在长安立碑，介绍景教教义，讲述景教历史，如果不是这块碑的刻立与出土，景教在大唐传播的历史，就可能完全被埋没。

从贞观十二年到会昌五年这两个多世纪，景教几度繁盛，又几度危急。佛教僧侣与儒学士子，多有容不得景教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初立不久，士大夫再起攻讦，幸得德宗皇帝庇护，才使景教再次免遭厄运。皇帝不喜欢任何一个教派独大，人们说皇权下的宗教宽容，那是因为皇权本身不宽容。景净是位博学的僧侣，负责景教中国教区的教务，翻译过叙利亚文的福音书、保罗书信、诗篇以及祈祷书。方豪认为，“现存景教经典中，可能大部分都出于景净之手。”景净很可能是当时宗教界的名流，甚至参与过佛经的《六波罗密经》翻译。圆照法师编定《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此事，还颇不以为然，认为他对佛经一知半解，有欺世盗名之嫌。

在一个遥远而广阔的帝国维持一种外族的宗教，实在不容易。景

^① 张星娘指出：“伊斯兰时不仅一人，其徒必然甚多。为每日祈祷之用，故肃宗于灵武（即今宁夏城）等五郡有重立景教之必要也……《通鉴》叙香积寺之战，官军方面有侦者谋者。大概即伊斯等之职务也。其所带来之景教徒必参加收复两京之役也。”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娘编注，第五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0—302页。



教不仅依赖皇家，甚至也依赖儒家、佛家、道家。唐朝礼遇三教，李老在前，释门居上，儒家为治国之本，自然不在话下，景教传教士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我们在景教经典中，经常会发现一些佛家术语或儒家词汇。耶稣、上帝、礼拜、教士、教堂被称为“世尊”、“阿罗诃”、“佛事”、“僧”、“寺”，景教碑中讲“家殷景福”、“惟道非圣不弘”之类，又是儒家口吻。

利玛窦等人一千年后试行的“适应”传教策略，一千年前阿罗本、景净就尝试过了。

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去东方，收获灵魂。景教传教士从东罗马帝国出发，横跨亚洲大陆，繁华与枯寂、战争与贸易，天空辽阔、旷野苍茫，那是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旅行，艰苦而又豪迈；它考验着人，考验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能力，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从各种苦难艰辛中获得的真理。

波斯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东方景教发展的基地，从库斯鲁一世（531—579在位）到库斯鲁二世（590、591—628在位）时代，萨珊王朝的主要朝臣都是来自叙利亚的景教徒。若不是伊斯兰军团所向披靡的扩张，也可能整个两河流域一直到河西走廊，大多是景教的天下。大唐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国力强盛，版图辽阔，经济发达，文化开放，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商旅不绝，长安东市西市，五方杂处。当然，世界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态度，更是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体现。在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可以与盛世大唐争雄，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与唐朝的强盛媲美。盛唐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开放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化审美化的世界中心，整个世界向往与模仿的中心。

景教传教士从拜占庭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到大唐中国，不仅是从一



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也像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古老的叙利亚，比今天叙利亚国要大得多，还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土耳其南部与伊拉克北部的广阔地域。这里从希腊化时代，就是欧亚大陆西方文明的一个中心，有世界上最高明的医术与最精明的商人，有圣城耶路撒冷与著名的商港安提阿。令人遗憾的是，这里始终缺乏某种政治、宗教、文化的统一性。政治动乱、宗教纷争，使古老的叙利亚地区灾难不断。富庶的城市衰败了，农田果园凋零，智慧勇敢的叙利亚人开始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他们的城市化背景、多元宗教训练与知识技能准备，使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很成功。

他们向西迁移，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基本上控制了欧洲的地中海的航运与贸易，公元七世纪的罗马教皇中，有三位是叙利亚血统，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塔苏斯的西奥多尔（668—690在位），也是讲希腊语的叙利亚人。他们向东迁徙，前后几十年间基本上控制了萨珊王朝的朝政。库斯鲁二世的爱妃舍润是景教徒，财政大臣克维胡的亚孜德也是景教徒。从阿罗本开始，叙利亚景教传教士又将景教带到东土大唐，在朝廷里，在军帐下，在胡市中，在从长安到广州的广阔帝国的土地上，都有叙利亚景教僧侣的足迹。

从古老衰落的叙利亚到新兴繁荣的大唐帝国，他们不仅为天国的上帝找到了新的信众，也为尘世的故乡赢得了荣誉。大唐传说中的大秦国，人民长大平正，风物教化，城居车行、田作衣绣，无不文明，甚至“有类中国”。对于一个同时有世界主义开放与帝国主义偏狭的华夏文化来说，给出这种评价的确不易。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通常人们总以为华夏人文教化，浩浩荡荡，四夷荒远，有奇珍异宝，无教化文明。中国古籍中有关“大秦”“有类中国”的评价，多少应与叙利亚景教传教士相关。

远自古老叙利亚的景教传教士，可能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修养最有能力的人。他们在大唐中国施展他们高超的医术、建筑术、机械

技术。《旧唐书》卷95《诸王传》记载曾为玄宗的长兄疗疾的神医僧崇一，很可能就是景教徒，^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景教“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王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来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世外的事业，要用世间的方式做。哈里发麾下的伊斯兰军团推翻了萨珊王朝之后，波斯的景教事业失去了依靠，及烈两度来中国，还有佶和、伊斯、景净，他们的努力，都试图在新的国土上建立景教乐园，使地中海的福音能够在东土生根。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虔诚热情，为了一项漫长艰辛的事业，在委屈细微处，有所开创。

景教流行中华210年间，几度危机不灭，又几度繁荣，得益于大唐皇朝的世界主义文化风格。然而，大唐盛世毕竟很短暂，“安史之乱”使大唐由盛及衰，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也随之而去。会昌五年武宗灭佛，有经济原因：“僧尼耗蠹天下”；也有文化上的本土化与保守化的原因：“不杂中华之风”。那是个严酷的时节，武宗下令废佛，同时罢萨宝府、禁毁袄教、景教、摩尼教祠寺，并且“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景教流行大唐中国210年，盛极一时，会昌排佛之后，转瞬之间



丝绸之路上的胡僧。

^① 《基督教入华史略》，陈垣著，《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灰飞湮灭，至晚唐五代，几乎完全歇绝。景教带来的福音，在中土难以生根。梦里方知身是客，即使是在昌盛的时代，它也只是外族人的宗教，只有依靠皇室的庇护，甚至不惜混同儒家释门道教，才能勉强生存。武宗灭佛，没有大伤释门，殃及景教，却成了灭顶之灾。从此景教灭绝中土，重新回到西域漠北。基督教传入中国，早期三次浪潮，第一次就这样兴起、这样衰落了。兴亡如梦，过后竟了无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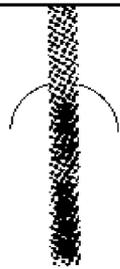
唐朝是一个世界帝国，宋朝是一个本土帝国。公元987年，阿拉伯人阿布·法拉奇在巴格达见到纳奇兰的一位景教僧侣，后者刚从中国回来，他说中国的景教徒或死于非命，或迁移他方，所有的景教教堂都被焚毁，在中国他只见到过一个景教徒，没有人信教，更没有人传教，看到福音果实凋零，他只好伤心地返回了。^①宋仁宗熹七年，也就是公元1062年，苏轼游长安旧地，仍见到大秦寺，^②寺塔还在，东坡五言律诗《游南山大秦寺》中有“忽逢孤塔回”句。而百年后金朝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杨云翼游长安，苏轼见到的那座大秦寺，已经倒塌了，只有空荡荡的寺基与白塔留在那里，遣人诗兴：

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
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
暗谷行云度，苍烟独鸟还。
唤回尘土梦，聊此弄澄湾。

——杨云翼《大秦寺诗》

^① 见《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英)阿·克·穆尔著，郝振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

^② 见《苏东坡诗集注》卷二，“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周、至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山。”



公元755年是个分界点。在世界格局内，怛逻斯战役大唐败于大食，阿拔斯王朝在下一个世纪将以巴格达为首都的伊斯兰文明变成世界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安史之乱”不仅唐朝由盛及衰，历朝持久的中华帝国也由盛及衰。如果说欧洲地缘政治地缘文化的基本对立范畴是西方与东方，希腊与波斯、罗马与安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中国的地缘政治地缘文化的基本对立范畴则是南方与北方、汉族与胡族、华夏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北方（包括西北与东北）胡族入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问题。旧的入侵者被汉化了，草原深处又酝酿出新的入侵者杀奔而来。五胡乱华之后，隋唐帝国已是汉胡合一的帝国。唐朝在种族上具有世界主义观念，夷狄与中夏不殊，德治下可如一家。不仅军队中多用蕃将蕃卒，政府中亦多蕃臣蕃吏。“安史之乱”是唐种族开放主义的一大教训，安禄山、史思明系出“杂胡”，而平乱诸将，除郭子仪外，也全是胡族。^①特有的开放导致内乱，唐朝尽管由此在观念上转向保守，但胡族外患，已难以抵御。先西北再东北，回纥吐蕃衰竭了，契丹兴起。李唐在藩镇割据中覆亡，赵宋收拾起五代十国的残局，却终究无法收复河西燕云之地。宋朝艰难，备受西夏辽金迫压，最后亡于蒙古铁蹄。五胡乱华之后近千年，中国又一次覆亡于胡族入侵，这次更彻底，不仅北方中原，还包括南方，苻坚没有完成的事业，忽必烈完成了。

基督教传入中国，早期三次浪潮，第一次就这样兴起、这样衰落了。第二次浪潮出现，要到四个世纪以后。当中国出现了另一个世界帝国，当几位圣方济各会修士，再次将从更为遥远的西方，将上帝的福音带来。

^① 参见《国史大纲》，钱穆著，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40—457页；第27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态度”。

第二次浪潮：圣方济各会修士们的努力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

——《约翰福音》

一 去东方，九死一生

就要启程去东方。

他梦见自己是一只鸟，在末世的黑暗中飞，身下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原。草被血镀成暗红色，星星点点的废墟瓦砾间闪着磷光。圣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出使鞑靼。

那是1245年4月，苦艾草在无边的原野上颤抖，风中还夹着蒙古劫难后的血腥。柏朗嘉



圣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



宾已经65岁了。他身体肥胖，经常感到虚弱。他说他“不知道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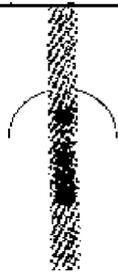
柏朗嘉宾从里昂出发，经波兰、乌克兰草原继续东行，一年以后到达伏尔加河畔拔都幕帐，再由拔都派人护送前往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刺和林。柏朗嘉宾走过的北纬50度的这条草原之路，正是希罗多德《历史》中斯基泰商队的黄金之路，也是拖勒密听说的马其顿商人前往赛里斯国的商路。

1246年8月24日，柏朗嘉宾到达哈刺和林，参加贵由大汗的登基典礼，奏上教皇的信函。大汗也复了信。在哈刺和林，柏朗嘉宾度过晚秋与初冬。那年11月13日，他踏上了返乡的路。整个一年以后，这位胖教士衰老的身影才又出现在里昂。

告别的时候，这位年老的教士是准备下地狱的。中世纪关于东方魔鬼、鞑靼地狱、歌革与玛各的所有传说，在柏朗嘉宾这样一位虔诚的教士心里，都是比现实更真实的信仰中的真理。信仰可以使人坚强、无畏，得以忍受巨大的痛苦。但人也是血肉凡胎，尘想俗念多有脱不尽的时候。行前多少个不眠之夜里，地狱的幻想一定不断地浮现出来，若不是暗中的祈祷可以让他心灵宁静并充满光明，谁能帮助他？那是多么真实的景象！但丁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不会不熟悉。德国宾根的一位女修士圣希尔德加德（1099—1179）的地狱幻想许多人都见过：

我看到一口又深又大的井，里面尽是沸滚的沥青和硫磺，环伺在井边的是螫人的蝎子和黄蜂。它们吓唬井中鬼魂，但不伤害他们。这些鬼魂曾犯下了妄杀之罪。

在一池清水旁边，我看到一堆熊熊烈火，有的吸入火焰又喷吐火焰；同时，凶恶的精灵还向他们投掷烧红的石块。这些鬼魂从水中倒影中目睹自己受刑的惨状，更加痛苦不堪。这些都是泯灭人性或杀死亲婴者的灵魂。



我还看到一大片沼泽之地，浓烟黑雾笼罩其上。在沼泽中蠕动着成群小虫。在此受罚的是那些在人世纵情作乐之人的鬼魂。^①

柏朗嘉宾深入鞑靼，准备亲历地狱。苦难确实是意想不到的：“尽管我们曾担心会被鞑靼人或其他民族的人所杀戮，或终身为他们的俘虏，或者是会遇到饥饿、干渴、寒冷、暑热，受虐待和过度的劳累会使我们难以忍受。所有这一切果然大量地降临到了我们头上，除了死亡和永远被囚禁之外，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②

然而，不管怎样，还是平安地回来了。他惟一能够证明的是：那里虽然荒蛮，但也至少是人间。既不是魔鬼之地，也不是地狱。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

1241年的欧洲像鸵鸟把头埋在沙里，等待鞑靼的打击。那年春天，拔都与速不台指挥的三路蒙古大军直逼多瑙河，基督教欧洲危在旦夕。可这些魔鬼在最关键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离去了。因为冬天到来的时候，窝阔台大汗去世，各路大将返回蒙古。欧洲人不明白，困惑绝望地等待他们再来。成吉思汗的感叹在基督徒听来纯粹就是魔鬼的誓言，让人心胆俱裂：“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鞑靼人征服世界、涂炭欧洲是不可避免的末日。没有人怀疑。直到蒙古人走了两年以后，教皇英诺森四世还在号召他的日耳曼兄弟高举十字架去“对抗撒旦的使者，地狱的牧师”。

无知是最大的恐惧。蒙古人惊醒了基督教的千年大梦。仓皇之间，

^① 《发现者》，（美）丹尼尔·小·布尔斯廷著，严赓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② 有关《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的引文，均见《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引恕不另注。

欧洲人却在他们自信的那些幼稚的T-O型地图上找不到这些魔鬼的住地。“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无知也将导致最大的惩罚：“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再一次躲藏在哪里。上帝知道，由于我们的罪恶，他是从哪里把他们接来惩罚我们的。”^①

无知与恐惧是蒙古世纪欧洲人走向东方的动机。1245年，教皇召开里昂会议，商议如何“找到一种对付鞑靼人、其他反宗教分子，及迫害基督百姓的补救办法”。此时，欧洲仍感到大难临头的惊恐与不自



教皇像，13世纪雕刻。

^①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THE CHRONICHE OF NOVGOROD” BY CAMDEN SOCIEFY, 1914, P64,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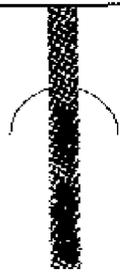


信。会议的决议中说：“这样看来，鞑靼人是基督名字的死敌，基督徒仍然有遭到他们攻击的危险——因为没有把基督徒完全征服，如他们按照消灭基督徒的愿望那样做，他们将肯定返回来，而在波兰、俄罗斯、匈牙利及其他国家所见到的恐怖，将重新出现。”教皇号召基督徒们准备壕沟、墙垣、堡垒，武装起来，以各种方式抵御进犯。会议在1245年6月举行，此时柏朗嘉宾的出使也是整体防御步骤的一部分。教皇给鞑靼国王和百姓带去一封信，劝“他们畏惧上帝的愤怒，不要进攻基督的国土”。口气是求和的。柏朗嘉宾1245年4月16日从里昂启程，这时离蒙古撤军已近四年。柏朗嘉宾是个本分刻板的老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也念念不忘渲染蒙古进犯的危险。所以当他回到里昂写奉使行记时，他重点介绍的是蒙古的地形气候，风土人情和他们的军事装备，战略战术等。他是政治使节、军事间谍，惟独不是传教士。

遗憾的是，柏朗嘉宾历经千辛万险写出的游记，似乎影响并不大。蒙古人并没有进犯欧洲。他们可怕的一面没有展示出来，可亲的一面却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这是柏朗嘉宾笔下的贵由大汗：

“这位皇帝大约有40至45岁，或者更年长一些，中等身材，聪明过人。遇事善于深思熟虑，习惯上举止严肃矜重。任何人没有见过他放肆地狂笑或者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轻举妄动，正如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们向我们所叙说的那样。他宫中的一些基督教徒对我们说他们确信他将会受洗皈依而成为一位基督教徒，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明显的征兆，即他把一些神职人员留在自己身旁，而且还向他们提供了俸禄；在他的大幕帐之前一直设有一个基督教的小教堂，无论那里聚集有多少鞑靼人或其他人，他们仍如同在其他基督教徒中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中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其他首领则从不这样做。”

奉使蒙古前后，柏朗嘉宾的观念有了一定的变化。两年束装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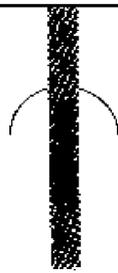


去时，他是准备下地狱的。尽管沿途也吃过很多苦，但大多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他从乞瓦（Kiev 基辅）到伏尔加河畔的拔都幕帐，最后被护送到哈刺和林，再返回欧洲。沿途所见所闻的蒙古人，如果不那么好，至少也不会像他从欧洲人的想象中的那么坏。在哈刺和林的时候，贵由大汗有意派使节随柏朗嘉宾回访教皇。柏朗嘉宾婉言拒绝了，他的理由讲得非常诚恳坦率：

“我们认为由于许多原因，他们不再前来。第一，我们害怕他们见到我们之间的内讧和战争，将会鼓励他们向我们发起进攻。第二，我们惟恐他们刺探我们国家的活动，第三项原因是我们担心他们会被处死，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常常表现得易怒和傲慢。事实上，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仆人，后来去德国拜见由红衣主教担任的教皇特使，穿着鞑靼服装应约前往，结果，几乎被德国人用石块击毙，只得被迫脱下这身衣服。然而，对于那些杀害他们的使节而又没有报仇的人，鞑靼人习惯上是从来不会与他们讲和的。第四项原因是，我们害怕他们将从我们身边被强行劫走，如同过去曾对一位萨拉森王子所作的那样，如果他还没死的话，至今仍被关在监狱里。第五，他们回访没有任何益处，因为他们没有为其它公务而奉命或领衔出使，而仅仅是向教皇陛下和其他国王们传送皇帝的信函。所以，我们认为可能由此而导致某些灾祸。这就是我们认为他们不适宜前来的原因。”

如果将他的第三、四、五条原因和柏朗嘉宾自己在蒙古的经历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即使是在一个西方人的眼里，基督徒也有可能比蒙古人更偏狭野蛮。

蒙古人是魔鬼，还是可敬的异教徒，或基督教世界的天然盟友？蒙古世界展现在西方面前，有恐惧，是否还有希望？毕竟，蒙古骑士在欧洲人面前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那里有无数的生灵，在虔诚的基督徒看来，是无数等待福音救赎的生灵。



二 席卷世界的草原风暴

1203年，秋高马肥的季节，一个叫铁木真的蒙古也速该部酋长的长子，在土喇河与克鲁伦河发源地间的折折儿运都山，打败了强大的突厥克烈部。三年以后，又是牧场的黄金季节。铁木真已基本上征服了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他们的酋长们正聚集在鄂嫩河发源地，召开“忽邻勒塔”（宗王大会）。从匈奴时代起，古老的蒙古草原已见识过许多次这样的大会。但这一次不同。萨满巫师阔阔真宣布：长生天腾格里（蒙古崇拜的大神，蒙语中“腾格里”意为“天”。）告诉他，铁木真将成为人世间惟一的可汗，“成吉思汗”，世界的统治者^①。

草原沸腾。欢呼与军号声从草原响起，惊飞的宿鸟在寂静的蓝天上划出骄傲而恐怖的曲线。草原骑士集结在九尾白旄纛（成吉思汗的军旗）下，从贝加尔湖畔、肯特山脚，他们将呈扇形出击：向左征服中国，向前征服突厥斯坦与伊朗，向右征服俄罗斯草原。

他们将用围猎羚羊、鹿群、野马与老虎的方式，捕猎在文明中沉浸已久的娇嫩的民族。首先征服的是西夏王国，成吉思汗乘胜挥师向大金帝国。1215年攻陷北京，烧杀抢掠持续了一个月，当运送战利品的最后一组车队离去的时候，他们身后的城市已成为废墟。一系列的屠杀与毁灭，这只是一个开始。

从东向西，草原风暴所向披靡，中亚的哈喇契丹帝国（西辽）陷落。1219年夏，成吉思汗的部队已集结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他们将征服信仰伊斯兰教的花刺子模帝国，其领地包括乌浒河外地区、呼罗珊、阿富汗与伊拉克—阿只迷。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布置在锡尔河防线与乌浒河外各堡垒的雇佣兵不堪一击。1220年2月，成吉思汗的部队进入繁华的中亚商城布哈拉。城市被抢掠一空，灭绝性的屠杀开始，最

^① 成吉思汗 (Jenghiz Khan), 意为“世界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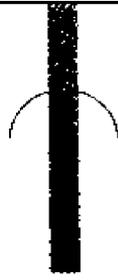
后是一场大火。3月，古城撒马尔罕沦陷，除了少数技师外，所有的居民都被杀了，其中包括投降者与妇女儿童。花刺子模帝国的首都玉龙杰赤的劫难，只是或早或晚。一年以后，蒙古猎手屠杀了所有来不及逃走的城民，掘开阿姆河，湍急的河水瞬间淹没了花刺子模帝国的都城。国王摩诃末逃到里海中的一个荒岛上，1220年底在那里悲惨地死去。蒙古骑兵仍在横扫花刺子模富饶的城市，伊拉克—阿只迷的雷依城，阿富汗的巴里黑，呼罗珊的马鲁、你沙不儿，然后就是巴米安、哥疾宁、赫拉特……所有这些城市都被毁灭，血腥风暴后的城市遗址上，鲜血滋润的青草茂盛地生长。

这一次草原部落将征服世界。从中亚逼进西亚，蒙古兵团放过了巴格达坐以待毙的哈里发教廷，越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进入高加索北方草原。基辅大公率领俄罗斯军队在第聂伯河抵抗了几天后投降了，按照野蛮人的惯例，基辅大公被杀。1227年，成吉思汗在甘肃西北逝世。按照这位世界统治者的遗嘱，全城百姓作为祭品被杀，四十位如花少女与许多珍宝，陪着这位戎马一生的英雄入葬。成吉思汗是世界君主也是世界屠夫。

成吉思汗死了，蒙古恐怖还在蔓延。窝阔台大汗时期，华北的金朝覆灭，长达四十七年的征服南宋的战事已经开始。札阑丁在蒙古人



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士。



离去之后，又在伊朗西部复兴古花刺子模帝国。1230年底那个冬季，蒙古兵团卷土重来。基尔曼、伊拉克—阿只迷、阿塞拜疆、尼昔宾、伊斯法罕、大不里士，整个西亚的灾难降临了。十年前发生在中亚的血腥屠杀如今复演在西亚。1258年2月，首都巴格达陷落，屠杀与破坏延续了十七天，塞尔柱苏丹凯哈武思二世将自己的肖像绘在一双鞋底上献给旭烈兀，希望伟大的汗王能将他高贵的双脚踩在他这个贱人头上。旭烈兀继续西征肥沃的新月地带。古老的叙利亚顷刻之间被蹂躏，每一座城市先后都经历了一场充分戏剧化的野蛮屠杀。蒙古士兵将酋长哈密勒的肉割下来，切成小块——塞到他嘴里，他在品尝自己的血肉中死去，头颅被蒙古士兵挑在长矛上，游行大马士革。

草原深处刮起的野蛮飓风几乎摧毁了欧亚大陆的农耕文明世界。成吉思汗从中亚一个很小的蒙古部落起家，在短短的二十年内就统一了蒙古各部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到1227年逝世时，他已建立起一个东起日本海，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一代天骄之后，蒙古骑士继续扫荡中亚、东亚、南亚、中东、东欧。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挥师西北，穿越高加索，横扫南俄、伏尔加河流域与乌克兰，1238年春，围困了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1241年4月，拔都打败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乘胜进军波兰、匈牙利，大败德意志骑士团后跨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此时蒙古骑兵的马蹄已经踏在亚得里亚海滨。

半个世纪血光一闪，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毁灭了，对于淹没在恐惧与苦难中的农夫、商贩，它可能分外漫长；但对于恢弘无情的历史，它又那么短暂。血腥屠杀终于创造了广泛的和平，1276年，忽必烈占领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三年以后，最后一个宋朝皇帝淹死在中国南海的碧波里。从中国海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区，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统一成一个帝国。在威尼斯与刺桐港之间，马可·波罗一家可以拿着大汗的金牌通行无阻。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马可·波罗一家与前往中国的商队。

蒙古帝国彻底打通了东西方世界，它以残酷的方式创造的旧大陆的“世界和平”，首先为西方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奔赴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从西到东；他们贩运小亚细亚的织物、亚美尼亚的银器、巴格达的珍珠、波斯的宝石、唐古忒的麝香、蛮子的丝绸、孟加拉的姜、爪哇的胡椒、印度的香料，从东到西。中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庄维尔在《圣路易传》中说：“大汗给人民以和平”^①。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几次这类强权或征服的和平。大流士的和平、亚历山大的和平、大唐和平或大食和平，但任何一次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广的范围。

去东方，穿越的广大世界中，旅行者可以走草原之路，从多瑙河畔到哈刺和林。这条穿越金帐汗国与白帐汗国的路并不太荒蛮，乞瓦、

^① 参见《欧洲与中国》，(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版，第五章：“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



大汗监督用金银兑换纸币，14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插图。

萨莱、斡脱罗尔、阿历麻里、别失八里，都是有一定规模的贸易集镇或城市，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城是金帐汗国的首都，伊本·白图泰在那里还见过不少中国商品。洲际贸易实际上是区域滚动的，大多数商人从意大利出发，过地中海到阿迦或叙利亚的某个港口，或者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到苏达克，然后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穿越西亚、中亚。旅途经历的地区与国家，有许多古老的商业城镇，像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或大不里士、伊斯法罕、撒马尔罕、布哈拉……这些城市在蒙古浩劫后迅速复兴。马可·波罗说“布哈拉是波斯最美丽的城市”，撒马尔罕、巴里黑、巴达哈尚、和田、哈密都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世界征服者的历史》描述布哈拉“各种财富堆积如山，各类人才荟萃，各门学科昌兴”^①。

穿越西亚的丝绸之路的商机要多于草原之路，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提供你想要的东西，到下一个城市又很容易卖到好价钱。商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与联系，选择草原之路或经过西亚、中亚的丝绸之路，也

^①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Vol 1, P108.

可以选择海路从地中海到红海到印度洋、南中国海。从地中海到印度河口的航线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开通了，从印度南海岸经过马六甲到广州或泉州的航线，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亚历山大里亚、亚丁、忽里模子、坎贝、古吉拉特、爪哇，从威尼斯到泉州沿途有无数个大商港，各种货物应有尽有。13世纪中叶，东方史学家阿不合乞说：“在成吉思汗统治下，所有在伊朗与都兰（即突厥斯坦）之间的地区是那样的平静，以至于人们能够顶着黄金一盘而从大地东端走到西端，他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小点暴力。”^①意大利人裴哥罗梯在一部《通商指南》中详细描述了从地中海到南中国的商路。他说从顿河口岸塔纳到契丹的草原商路，“商人们可骑马、骑驴，或乘其他牲畜”。如果说“从塔纳到萨莱这一段路有些危险，但若有六十个人结队同行，那就可以像呆在家里样安全”。另一处几乎重复了阿不合乞的说法：“据曾经去过契丹的商人讲，从塔纳至契丹的路途，不论白天黑夜，都十分安全……”^②



马可·波罗觐见大汗。14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插图。

① 《草原帝国》，勒尼·格音塞著，魏英那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② 为佛罗伦萨城巴尔底公司(Company of the Bardi)的一位名叫裴哥罗梯(F·B·Pegolotti)的经理所作。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娘编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一册，第310—318页。



欧洲人有福了。十字军东征将他们引到西亚，蒙古和平又将他们引到东亚。渐行渐远，家乡越来越亲切，世界也越来越精彩。从欧洲到中国，陆上与海上，所有的路都通了。商人们看到世界不同地区可能变成同一个市场，传教士们看到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可能拥有同一种信仰，而所有敏感的人都可能在现实中看到幻想。

三 东方世界真让人捉摸不透

柏朗嘉宾返回欧洲的那一年，欧洲正在闹哄哄地准备又一次十字军东征。蒙古人来了又去，鞑靼暴行在他们的信仰中以魔鬼的形象消化了。既然是上帝的鞭子，就没有什么可以怨怼的。倒是那些撒拉逊人让神经质的基督徒耿耿于怀。他们听说蒙古骑士在亚洲蹂躏伊斯兰帝国，烧毁他们的城市，掳走他们的妻妾，把那些淫荡的苏丹拖在马后。他们高兴了，简直欣喜若狂。实际上蒙古征服的最初传闻在欧洲引起的反应是幸灾乐祸。温彻斯特主教对英王亨利三世说：“让这些狗互相厮咬，彻底毁灭，到那时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性的基督教将在他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在全世界将只要一种教会，一个基督。”^①

这一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出的第二个使团出使蒙古。他们的使命是争取大汗皈依基督教，并与罗马教廷结盟，共同打击穆斯林。使团中有多明我会修士阿塞林、图尔内人西蒙等三位多米尼各会修士。他们的运气更坏，差点把命丧在蒙古营地。这些狂妄无知、土里土气的修士，到了波斯就只记得教皇不记得使命了。他们指责蒙古将军拜住杀人太多，要他向罗马教皇投降。拜住耐着性子没杀他们，是因为贵由大汗的钦差宴吉只带在一旁替他们说情。宴吉只带是位景教徒。

^①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8页。

阿塞林一行回罗马复命，带着一封态度傲慢的信和两位回访使节。两位蒙古使者中有一位景教徒！四百年前武宗灭法，一度繁荣中土的景教，流落到西域漠北。辽、金时期，乃蛮部、克烈部、汪古部



蒙元世纪在广阔的蒙古帝国旅行，都要持有这样的路牌。

中，都有许多景教徒。蒙古兵团征服中亚、西亚，景教徒因为反抗穆斯林的压迫，支持蒙古人。他们在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巴格达、大马士革这样的城市里欢迎蒙古骑兵的到来，又跟随蒙古大军，从西亚到东亚，当官、从军、经商或做工匠。蒙古人送了他们一个可爱的名字：也里可温，意思是“有福缘的人”。圣方济各会修士将天主教带到元朝，信奉天主教的人，也被蒙古人称为“也里可温”，成了“有福缘的人”。

教皇在罗马接见了他们。同时，大汗的钦差宴吉只带也派出两位景教徒前往塞浦路斯谒见法王路易九世，告诉他“大地的王”汗向他的“儿子”法兰克国王慷慨地许诺，他将保护所有的基督徒，并与他们一道消灭撒拉逊人。这话听起来那么别扭。路易九世又恼又喜。不管怎样，当那两位信口开河的使者恭维他“国王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西亚”时，他高兴得真要笑出来。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的事了，不久前他被穆斯林俘虏，他的家族付了好大一笔赎金。他正在地中海那个美丽的小岛上休养。宴吉只带使者的到来，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大汗将保护拉丁、希腊、亚美尼亚的聂斯脱利、雅各等派的一切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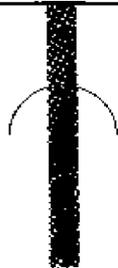
并协助他们进攻耶路撒冷，收复圣地。如果这是真的，基督教世界该如何反应呢？

宴吉只带那位名叫沙不丁·摩里法特·大卫的使者，是个夸夸其谈的江湖中人。我们在以后还会碰到他。他给好大喜功的路易王编造了许多正中下怀的故事。诸如罗马教皇在蒙古人中赫赫有名；大汗的母亲是虔诚善良的基督徒，三年前的主显节日，大汗本人和鞑靼大王公都受了洗，而宴吉只带一生长下来就是基督徒。这位好心轻浮的蒙古使者喋喋不休，站在一旁担任翻译的多米尼各会修士隆主麦人安德鲁，兴奋得两眼放光。

路易九世准备再派一个使团去。安德鲁有幸成为率团者。1249年2月中旬，冰雪刚刚融化，他和另外五位兄弟向蒙古大汗的营地进发。



蒙古旅行者。
狄察细密画。



他们带着丰厚的赠礼，国王与教廷的信，还有一座绣着圣经故事、状若教堂的营帐。一年以后，他们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南方的蒙古第一座斡耳朵。此时大汗贵由已经去世了。他的遗孀摄政斡兀立海迷失把他们当作贡使接见，并带给路易九世一封恐吓信。

信的内容让人哭笑不得，让人见识到一个头脑混乱但又虚荣傲慢的女人能写出的信会是什么样子。庄维尔《圣路易传》中记叙了复信的内容：“和平是美好的，因为当一个国家处于和平状态时，用四只脚走路的牲畜可以在和平环境中吃草，用两只脚走路的人可以在和平环境中耕田，从而获得好收成。这封信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警告，因为，如果你不同我们保持和平，你就不能获得和平。长老约翰起而反对我们，某某等国王也反对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已被我们杀死。因此，我们命令你，每年须进贡金银，其数量则以足可赢得我们的友谊为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将摧毁你和你的人民，如同我们对待上列诸人那样。”^①

这封信让路易九世失望。他感到无所适从。口若悬河的使者和蛮不讲理的王后，他该相信谁？1241年蒙古骑兵在多瑙河畔屠杀基督徒象屠杀草原上的羚羊。可蒙古人走后不久又听说他们中有许多是基督徒。1247年，柏朗嘉宾还没返回欧洲，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已派他弟弟山帕德元帅出使哈喇和林。山帕德在撒马尔罕寄给塞浦路斯国王——他的堂兄弟——一封信，信中说：贵由大汗的宫廷中有许多基督徒，大汗礼待并保护他们，免去他们的赋税。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也见过这封信。

好消息坏消息，让人左右为难。一种梦寐以求的东西时隐时现，慢慢真切。名叫安德鲁的隆主麦人是位乐观笃信的诗人，他头脑灵活，想

^① 《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象丰富。不知道在蒙古帝国给他当仆从、向导、翻译的都是些什么人，告诉了他些什么消息，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知道他回来的汇报是亲见亲历的，道听途说的，还是信仰中的想当然的虚构，反正他带回来了许多渲染得离奇的信息：东方的鞑靼人已逃离了那座把歌革与玛各围在其中的地狱大墙，成吉思汗在梦中得到过神的应许，将长老约翰的领地赐给他，他皈依了基督教！

失望与希望总是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就在最后准备放弃的黑暗中，如斗的烛光会突然闪现。一度被恐怖淹没，失魂落魄的西方人，此时不仅镇定下来，而且开始想入非非：如果不是敌人就可能是朋友；如果不是魔鬼就可能是天使。蒙古骑兵屠杀穆斯林，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基督徒最知心的同盟。难道他们真是上帝派来的？或者就是传说已



路易九世率
领十字军东征。



久的长老约翰？

长老约翰 (Pretre Jean) 的传说最早出现在 12 世纪欧洲，1165 年，一封奇怪的信传到罗马。信是由一位莫须有的长老约翰致曼奴埃尔一世教母的，信中长老约翰自称为“三个印度和从巴别塔到圣徒托玛斯墓之间辽阔地区的国王”。长老约翰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弗赖辛格的史著中，后来又出现在阿德蒙的编年史中。“长老约翰”的信以西方各种语言的抄本广泛流行，信仰的期望已从一种虚构变成不可动摇的事实，几乎所有出使东方的人，教士或商人，都无一例外地在东方寻找并“发现”长老约翰的事迹与国土。

长老约翰的信应和了西欧的有关在中亚和南亚存在有基督教徒的古老传说。圣·托玛斯以及由他所创建的印度基督教区的传说、阿尔弗莱德大帝于 883 年派向印度的英国主教西格尔穆斯的旅行，一时间似乎都成为确实无疑的事实。蒙古世纪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去东方的冒险家，从柏朗嘉宾到哥伦布，多有寻找长老约翰的动机。他们相信东方确有一位基督徒君主，同时又是宗教首领，即长老约翰。1140 年左右哈刺契丹汗国创建，继而又有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出现，蒙古帝国同情基督教，东方有许多信奉十字架的景教徒，这一连串发现，都使欧洲的基督教徒想象长老约翰的国土就在中亚，甚至就是信奉景教的克烈部。当然，真正到过东方的人，谁也没有在蒙古帝国的土地上见过长老约翰或长老约翰的国土。所以到马可·波罗逝世那些年里，西方人传说中的长老约翰的国土又移到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1329 年 8 月 21 日被教皇敕封为印度主教的儒尔丹认为，长老约翰就是阿比西尼亚皇帝；曾经在元朝到过中国的教皇特使马黎诺利，也称阿比西尼亚为“长老约翰之地”。

实际上，捕风捉影的长老约翰传说，如果在历史中还有些许根据，惟一可能的就是东方景教。辽、金时景教在中亚、蒙古活动，元初大都就至少有三万景教徒，契丹、汪古、克烈部和西北的唐兀地等，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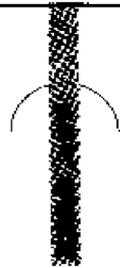


设有景教大主教区。1275年前后，大都的景教僧侣列班·扫马，从房山“十字寺”出发，去耶露撒冷朝圣，并且受命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出使欧洲，最远到巴黎。他的徒弟马古思，父亲就是汪古部的景教副主教，而他本人后来竟奇迹般地成为全世界景教的首脑——宗主教马·雅伯拉哈三世，驻跸巴格达^①。东方的景教发展，可能是长老约翰传说的影子来源。甚至更不着边际的，还有关于蒙古人信奉或者说是庇护基督教的传说。景教徒们把征服哈里发的蒙古君主当作是基督教的赞助者，他们相信，使一些东方君主皈依基督教，已经为期不远了。西方基督徒将与长老约翰广阔土地上的教友共同收复全世界，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苦苦向往的东西容易在现实中“找到”证据。这就使西方最终相信东方确有一位基督徒君主，同时又是宗教首领，即长老约翰。蒙古世纪基督教会派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士作为使节出使东方，都试图把中亚的某位所谓的基督教君主考证成长老约翰；连马可·波罗（很可能还有其他人，但已被人们忘怀了）那样的商人也热心寻找长老约翰。

然而，幻想终归是幻想。西方人一直盼望东方出现一位既信仰基督教、又是宗教首领的君主。他们最终也没能如愿，东方就是东方，跟西方一相情愿幻想的永远也不一样。失望甚至恼羞成怒的时候，他们就禁不住地抱怨：野蛮民族真让人捉摸不透。

不断的出使换来的是不断的失望。这时候教皇和国王们至少已得到蒙古大汗的三封信。第一封是贵由的，这位终日让自己浸泡在酒精中的短命大汗态度蛮横，“如果你的使者返抵你处，送上他自己的报告，你，大教皇，和所有的君主们一道，应立即亲自前来为我们服役。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以为你是

^① 有关列班·扫马与马古斯西行，参见笔者《列班·扫马西行研究》，《国际汉学》第三辑，200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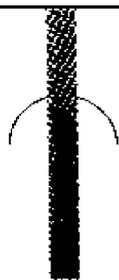


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柏朗嘉宾带回的这封“恐吓信”着实让高贵的教皇考验了自己的忍耐力与涵养。教皇也是讲实力的，他知道蒙古人的厉害。安德鲁带回了路易王的那封信，让路易王难以与之一般见识。如今鲁布鲁克回来了，转呈上来的蒙哥大汗的信，依旧盛气凌人。如果欧洲凭着山高海阔路途遥远，不以降从谋得和平，“那么我们将知道如何办。长生神他知道：谁使难变易，使远成近。”野蛮民族都是些天生的诗人，讲话形象丰富，而且经常率真任性，比如蒙哥曾对鲁布鲁克大骂贵由的遗孀海迷失是“最坏的巫婆”，“……涉及到一个大国的幸福和安宁，以及战争的事，这个比狗还贱的妇人能懂什么？”另外，“有个叫大卫的人，好像是作为蒙古的使者去见你，但他是个骗子。”

到底谁是骗子？各种消息，好的坏的，闹昏了头。野蛮人真让人捉摸不透。成吉思汗家族有许多景教徒与同情基督教的野蛮人。他们疯狂杀戮穆斯林，这种暴行让心胸狭窄的基督徒无限欣慰。1257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集体屠杀延续了十七天。景教徒感到振奋。亚美尼亚史学家查拉克斯·德·坎查克写道：“这个城建筑于515年前。它一直在维持着帝国，像一个吃不饱的吸血虫，它吞并了全世界。这时，它归还了它所夺取的一切。它受到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惩罚，它的不义行为是恶贯满盈了。穆斯林们的暴虐延续了647年。”五百多年来，生活在亚洲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这样出过恶气。

的确有许多好消息：忽必烈大汗亲吻十字架，克烈部信奉基督教，汪古部全是景教徒，波斯伊尔汗国随处可见马车上载着教堂式的帐幕，从大马士革到刺桐，旅行家看到许多基督教堂。巴格达陷落，景教徒全被赦免，两年以后，征讨叙利亚的蒙古兵团里，就出现许多东方基督徒，他们感觉自己是在进行一次十字军远征。大马士革被攻破，蒙古大军入城，基督徒们走上街头，高举十字架，唱着圣歌，像欢迎



天使一样欢迎“哥革和玛各”的队伍。在基督徒心里，此时的蒙古恐怖已变成蒙古解放或蒙古和平。

野蛮民族真是让人捉摸不透。13—14世纪的欧洲人关于东方的印象是混乱一团，天堂与地狱都在那边，长老约翰的国土与鞑靼人的帝国也在那边，希望在那边，失望在那边，恐怖与向往全在那边。蒙古人“使远成近”，世界被打通了。奔走在连接东西方的尸骨废墟嶙嶙，天荒地老的古道上，最频繁、最勇敢的都是那些对尘世无所想念的教士。精神的力量是无边的：“上帝派遣鞑靼人进入东方世界杀人而且也被杀时，他在西方也派遣了多明我和圣方济各会等忠实和有福的信徒们去启发、教导和建立宗教信仰。”

四 世间将只有一个家，一个牧师

在路易九世的王宫里，柏朗嘉宾讲述了自己的东方游历，惊险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其中不少细节是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听众中有位法国佛兰德斯鲁布鲁克村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名叫威廉。如今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有何感想，或在日记里记下什么，反正五年以后，这位鲁布鲁克的威廉又踏上出使东方的路。并写出了与柏朗嘉宾同样著名的行记。

既然传说与实证都表明东方确实有许多基督徒。那么传播福音的事业就大有希望、而且刻不容缓。不管鲁布鲁克出使时路易王交代他些什么，至少他本人自觉的使命是非常明确的；他要去东方为上帝收获灵魂。“宣讲上帝的德行，并教导人们遵照上帝的意志来生活。”^①

最初去东方的柏朗嘉宾教士是军事间谍兼外交使节，然后是阿塞

^① 有关《鲁布鲁克东行纪》的引文，均见《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引恕不另注。

林一行和安德鲁一行，他们的使命是政治外交，目的在于谋求建立共同抵抗伊斯兰教的军事联盟。到鲁布鲁克的威廉这里，又加上了的传教的内容。蒙古世纪最初前往东方的教士使团的使命，至今已有三次变化。



圣方济各会修士
鲁布鲁克。

鲁布鲁克的使命不同了。他还想教化那些迷失在荒蛮草原与戈壁沙漠间的野蛮民族，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他要去东方，为上帝收获灵魂。

鲁布鲁克出发时，传教似乎是跟东方有关系的最有前途的事业了。柏朗嘉宾的报道曾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些温和而富有人情味的契丹人，更让他们难以忘怀：“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字母，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同时也有使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经常在其中进行祈祷。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一尊神，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他们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①

终于有希望了。基督徒心底里那种普世宗教念头又浮现出来。1253年5月7日，鲁布鲁克一行四人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他们感到振奋，盲目偏激的幻想神圣而又美好：“希腊人将归顺罗马教廷，鞑靼人

^① 《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48—49页。



大都将信奉圣教，撒拉逊人将被毁灭，世间将只有一个家，只有一个牧师。”（《第三部著作》培根）说这段话的罗杰斯·培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热情详细地介绍了鲁布鲁克的东行。

13世纪中叶，东去传教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从东欧穿过波兰与野蛮人的边境，再由伏尔加河流域去中亚，到达蒙古首都哈刺和林。两千年前亚里斯特亚士跟随斯基泰商队去伊塞顿^①，走过的是这条路，一千多年前，马其顿丝绸商人马埃斯的贸易经理泰尼亚诺斯去赛里斯国，很长一段走的也是这条路。一条路被遗忘了一千年，柏朗嘉宾走过的时候，历史才又重新记起。柏朗嘉宾走的是这条北路，又称草原之路。另一条路是南路，穿过小亚细亚向东南，是著名的丝绸之路。阿塞林、安德鲁走的都是南行的丝绸之路。拔都的儿子，驻扎俄罗斯东南钦察草原的蒙古大首领撒里答是个基督徒。鲁布鲁克选择北路，大概是希望先得到这位蒙古教友的照应。鲁布鲁克还曾幻想仰仗撒里答，在钦察组织一个教团随他去哈刺和林。可是，等他踏上蒙古帝国的土地，发现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样：“当我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确实的，我好像正在进入另一个世界。”

鲁布鲁克在另一个世界经历的一切，都和八年前柏朗嘉宾一样。先到拔都大营，再由拔都遣使送到蒙古大汗的宫廷。鲁布鲁克自己并没有说清楚他东行的使命，但笔者相信，即使有教廷与王宫的派遣，他个人的兴趣也在传教。到拔都大营的时候，鲁布鲁克大概就表示过留下来传教的意愿。否则那位拔都的官员不会凭白无故地向他解释：“国王陛下愿意你们留在这里，但没有蒙哥大汗的许可，他不能这样做。因此，你和你的译员必须去见蒙哥汗。”后来终于到了蒙古首都

^① 有关公元前六或七世纪希腊人亚里斯特亚士跟随斯基泰商队去伊塞顿的旅行，见（英）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一章。赫德逊认为，史书中所说的“伊塞顿”即古代罗布泊地区，亚里斯特亚士可能是记载最早穿越欧亚大陆到今日中国地界到欧洲人。



哈刺和林，见到蒙哥大汗。在与大汗的接触中，鲁布鲁克的目的表现得很明确，他说他“愿在那里长期居留”，“我没有代表任何人讲话，我只传播上帝的话，如果他愿意听。”

这位修士一定是位大胆虔诚而富于想象力的自由冒险家。没有什么人派他出使，是他心中的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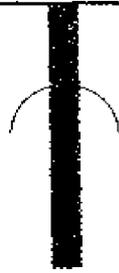
“蒙哥汗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地方来。”

“我教的职责是向一切人宣讲福音。所以当我听说蒙古人的名声时，我期望到他们那里去。我怀着这个愿望时，刚好听说撒里答是个基督徒，因此我就去找他。法兰西君王送给他一封友好的信，其中说明我们是何等人，并且请求他允许我们留在蒙古人中。后来他（撒里答）把我们送去见拔都，拔都把我们送往蒙哥汗那里，所以我请求他，而且一定要再请求他，允许我们留下。”

很遗憾，这位虔诚的教士一再请求，也没有打动蒙哥大汗。按理说是不会的，一个能够兼容萨满教、景教、伊斯兰教以及五花八门一些原始教派的大汗，是个宗教宽容主义者，为什么不能留下一个老实人鲁布鲁克？我怀疑是那些传话的书记官从中做梗，把大汗和鲁布鲁克两头都蒙骗了。他们可能是穆斯林或景教徒。后来在北京陷害高维奴，几乎把他提前送去见上帝的，就是他基督同门的景教徒。宗教是不宽容的。蒙哥大汗的回答很无情但也很讲礼节。使节传话说：“你在这儿已经停留很久了。（汗）希望你返回自己的家乡……”

鲁布鲁克壮志未酬。无法想象他返回欧洲时的心情。1255年，当他赶到塞浦路斯时，路易王已回法国了。他被大主教留在巴勒斯坦讲授神学。温火熬人，鲁布鲁克无可奈何，坐在阿迦修道院里写他的东行记。几年以后我们才得知他到了巴黎。一定见过路易王，在他许多好奇的听众里，还有罗杰斯·培根。

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是些幸运的人。他们去了，又回来了，而且通过游记与书信使自己名垂青史。除他们之外，还有许多可怜的人，他



们去了，但没有回来，或者回来了，也没有只言片语留下，他们用生命赌注的业绩，被淹没在势利的历史中。与柏朗嘉宾一同出使的葡萄牙人劳伦斯修士就没有回来，只有上帝知道他的尸骨抛在哪里。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西方人怎么也无法理解东方人为什么会拒绝他们，为什么不为圣徒的精神所感动。几乎所有去过东方的人，都注意到蒙古皇帝在宗教上的宽容与蒙古人信仰的开放态度。在大汗的宫廷里，萨满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景教徒、基督教徒等各个教派的人士可以和平共处，自由论辩。这种宽容让信仰专制的欧洲人感到惊讶，同时也看到希望。宽容就意味着不被禁止，传教就有希望。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宽容同时还意味另一方面，那就是信仰的自由选择，可以选择信仰一种宗教，也可以选择信仰一种宗教，任何强迫都是违反宽容精神的。所以大汗温和体谅地谢绝了鲁布鲁克迫切的要求。

基督徒不能理解，既然宽容，为什么不能接受基督教呢？异教徒也不能理解，既然宽容，你又为什么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宗教呢？这是东西方的误解。总有那么一个时候，误解深化了，双方都被激怒。

蒙哥大汗的母亲是景教徒，丞相李鲁合也是景教徒。汗廷里的掌教是道士李志常，国师是喇嘛那摩。蒙哥曾对鲁布鲁克说：“各种宗教犹如手上的五指。”但他又告诉佛教徒：“佛教是手掌，其他宗教是手指。”

鲁布鲁克最后一次与蒙哥大汗对话：

鲁布鲁克：“陛下，我们不是好战的人。我们希望那些要统治世界的人，按照上帝的愿望极公正地进行统治。我们的职责是要教导人们按上帝的意愿生活。我们为此到这儿来，如你允许，我们愿在这里居留。既然你要我们回去，那就必须离开。我要返回，并且我将遵从你的命令尽我所能携带你的信函。我愿向陛下请求，既然我将携带你的信函，那么允许我也可以返回你处，这主要因为你的可怜的在李罗



的奴隶，和我讲同一种语言，没有牧师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宣讲教义，所以我宁愿与他们在一起。”

大汗：“如果你的主子把你派遣回来，（你将受到欢迎）。”

鲁布鲁克：“陛下，我不知道我主子的意思，但我得到他们的允许，可以去任何我愿去的地方，如那里需要宣讲上帝的旨意。我认为这些地方很需要宣讲，因此不管主子是否向你遣回使臣，请允许我回来。”

大汗听了他的话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沉默不语，他或许被这位远道教士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可他实在对基督教不感兴趣。这里面有很多误会。他赐了鲁布鲁克酒喝，然后幽幽地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准备好食物，那你可以健康地到达你的国家。”

东西方以后几个世纪在传教事务中的矛盾，这段对话都已暗示出来了。西方基督教出于普世主义信念，百折不挠地要归化东方异教徒，他们天真又强权地以为，既然上帝是唯一的真理，信仰上帝是最大的幸福，那么你们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或许好心，但不宽容。而东方人却不可理解，我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生活，信仰各自的神，你们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自由呢？这是东西方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误会。一方坚持不懈甚至不择手段地要将自己的思想与信仰强加给另一方，而另一方又一再拒绝以至恼怒。宽容的极处就是冒犯。误会逐渐加深，当有历史上许多的偶然机缘触发时，冲突就悲剧性地出现了。或许他们都是些真诚善良的人，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误会，才相互折磨，陷害，以至于被无数误会、冤孽纠缠不清，把最初那些单纯、真诚的东西都忘了。

“腾格里”是伟大的，所有的神都值得敬畏。

五 野蛮人的家乡是世界的桥梁

野蛮人的家乡是世界的桥梁。

欧亚大陆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它拥有地球



近40%的陆地，90%的人口，古代五大文明从西向东依次排开，从地中海到太平洋，中亚的高山将其断然分成东西两个世界。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世界是相互隔绝的。由绿洲城市与村落串起的穿越沙漠草原的丝绸之路，阻绝的时候多，通达的时候少。中亚的高山是一个分割文明与地理的界限，还有另一条界限，将欧亚大陆的南北分开，将定居的农耕文明与游牧的草原文明分开。东西是相互隔绝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南北也是相互隔绝的两个不同的世界。

欧亚大陆北纬40度是一个文明的分界线。北纬40度以南是建立在河谷、平原、盆地、绿洲间的农耕文明。北纬40度以北，则是被沙漠蚕食、由森林点缀的欧亚大草原和在这片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不断迁徙、兴衰更迭的草原文明。

北纬40度线将欧亚大陆分成南北两个世界。古代世界的五大文明都出现在北纬40度以南，都属于定居的农耕文明。农耕民族在河套地带建设自己的家园，世代在田野里耕作。他们安土重迁，聚居在村落与城市，为了安全与保障最低限度生存的秩序，他们把自己的自由与命运抵押给暴虐无情的君主，发明了一整套跪着生存的习惯。他们是些文明人，聪明而细心，讲究礼节与教养，他们个人从来不想去侵略别人，除非被某个帝王驱赶着，把他们兄弟的尸体挂在征途中的树干上^①。他们满足、自尊、封闭、驯服，他们有自己的文明尺度，在他们眼里，草原民族都是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既令人轻蔑，又令人恐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北纬40度以南都是农耕文明各自分立的帝国，北纬40度以北都是流动的草原游牧部落。农耕文明的文明与野蛮的尺度，包含着某种

^① 波斯皇帝大流士远征希腊途中，曾把一位热情款待过他的吕底亚贵族的儿子劈成两半挂在路边示众。因为这位老贵族有五个儿子都在军中服役，他请求皇帝留一个儿子在他身边。大流士大怒：“你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是我的叔仆，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奉献给我，包括你的妻子在内。”



偏见。那些像野狼一样奔驰在广阔草原的游牧部落，有着另一种文明，一种具有彻底的开放性与残酷性的文明。游牧部落是草原与季节的儿子。他们没有故乡，也没有历史。草青马肥的夏秋，他们生活得像幸福放荡的王子。冬季的严寒来了，饥饿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搜捕这些在荒草大漠间挣扎的人。他们不断地迁徙、劫掠与贸易，从黄河到多瑙河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原野，都是他们的帝国。

世界文明史早期从多瑙河到兴安岭之间欧亚草原上那些流动的野蛮部落，主要属于雅利安血统的斯基泰人和蒙古利亚血统的匈奴人。公元前8世纪至4世纪间，游散在阿尔泰山与黑海之间的斯基泰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他们游牧，也从事贸易与艺术创造。他们在北纬50度的草原之路上贩运毛皮与黄金，他们创造的以金饰品著称的动物图案艺术，融汇了古希腊艺术、阿契美尼德艺术、匈奴艺术与中国艺术的风格。匈奴人与斯基泰人一样，有自己的文明。他们腰带上挂着的金牌子刻有马、熊、老虎等动物的图案，马鞍上的铜钩、长矛柄头上，也雕有凸现的牝鹿的形象。匈奴人不仅是嗜血的骑士，他们创造了鄂尔多斯艺术，这种艺术的黄金、青铜器工艺，既有斯基泰式的草原风格，又有华夏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

西方历史中著名的斯基泰民族与中国史书反复出现的匈奴人，同是中亚草原上的游牧兄弟。他们穿着皮衣、长裤，在马背上度过一生，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过着放浪的日子。从一个涸水点到另一个涸水点，从一片牧场到另一片牧场，春去秋来，寒暑交替，他们追逐草地、阳光、雨水，他们降生，享受短暂的爱情与酒，在死亡来临之前辛勤地迁徙、劳作，野蛮地杀戮、抢劫。幸福积累着，灾难也慢慢积累，有朝一日暴风雨来了，无辜的生命像尘土一样被狂乱地卷起再无情地抛下，最后被冲刷得毫无踪迹。他们认为战死是光荣，病死是耻辱。他们的酋长们总是杀掉自己最亲近的人殉葬。希罗多德说斯基泰人喜欢杀死自己的敌人，用他们的脑壳做酒碗，镶上金边。汉武帝也曾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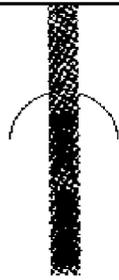
匈奴的老上单于拿月氏王的脑壳作酒杯。斯基泰人的黄金王国衰落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六百年，草原是匈奴人的天下。东方的汉帝国塞外远征，溃败的匈奴人又出现于罗马帝国边境。草原部落不断的迁徙与战争，最早沟通了东西最遥远的农耕文明。

文明世界里谁也不知道神秘的草原深处酝酿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匈奴王国衰落了，突厥人兴起。东突厥帝国的领土从阿尔泰山向东延伸到外小兴安岭，西突厥帝国则从阿尔泰山向西抵达里海东岸。突厥人又衰落了，继起的草原势力西有回纥、沙陀，东有契丹、女真。他们出现在中国边境的时候，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则出现在东罗马帝国边境，塞尔柱克部落也开始西迁，他们的头人将成为统治伊斯兰世界的苏丹。

阿尔泰山是欧亚大草原神秘的中心，那些最初发明马鞍、马镫、骑术与最先开始穿长裤的游牧民族，突厥语族人、蒙古语族人、通古斯语族人，几乎都起源于盛产黄金与宝石的阿尔泰山区；横贯欧亚的万里草原，也从这里呈扇形向北延伸，构成连接东西两个世界的广阔的通道。中亚连绵的高山将农耕文明分成东西两个世界，同时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分成南北两个世界。在这个划分欧亚大陆的T字形格局中，阿尔泰山恰好处于横线与竖线的交叉点上。那是欧亚大陆地理与文明的中心。也是蒙古帝国的中心与它征服世界的起点。

高山是屏障，草原是路，无边无际的路。奔驰在布达佩斯与长安之间广阔的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不仅沟通了草原世界，也沟通了北纬40度以南东西两极的农耕文明。大汉皇帝从安息使节那里获得的玻璃饰物，可能曾经属于某个死去的罗马士兵。罗马贵妇的丝裙，也可能是单于手下在中国甘肃某个和平的村庄的劫获物。历史对它的经受者缺少温情。在草原通道上，正是匈奴、斯基泰的子孙将中国的丝绸传到希腊，将罗马的彩花玻璃带到中国。

草原是无边无际的路，几千年来在广阔的亚欧大草原上不断迁徙、



劫掠与贸易的游牧部落，是这条通道上勇敢而又凶残的主人，他们沟通了东西方古代文明两个最为遥远的世界。游牧民族除了战争与劫掠外，也在不同农耕文明之间，从事中介性贸易。游牧民族天生就是商业民族，流动性赋予他们商人的特长，在欧亚大陆北方无边无际的草原沙漠和穿越草原、戈壁、沙漠、绿洲的古老漫长的商路上，最初不是希腊罗马人，也不是秦朝汉朝人，而是那些野蛮的游牧部落，将西欧与东亚两种农耕文明联接起来。迁徙、贸易或劫掠，都是文化交流的方式。历史上很多时候，文化传播既不浪漫，甚至残酷、野蛮。这些古老草原的骑士们残酷地杀戮、劫掠，也和平地迁徙、贸易。他们一个部落可以是一支军队，劫掠草原尽头的村落、集市；一个部落也可能就是一支商队，往返于黑海与黄河间。战争与劫掠停止的时候，贸易开始。那是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残暴而又豪迈。它考验着人，考验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能力，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与各种苦难艰辛留下的真理。它的冷酷与热情，同样令人神往。

农耕文明是一个世界，草原文明是另一个世界。二者不断的冲突与融合，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宏大的史诗。游牧部落野狼一样谋生，逐水草迁徙，随时都会出现在农耕文明的边缘，纵马践踏麦田，夷平村庄、烧毁城市、屠杀人民，将所有的财物抢劫一空，让自己的王罕当上中原的天子、波斯的万王之王、巴格达或开罗的苏丹、罗马的皇帝。他们是定居文明最危险的敌人。农耕文明建立的帝国，往往同时具有扩张性与保守性，一边通过武力与教化拼命扩大自己的疆土，一边封锁住自己的边境。帝国强大的时候，远征军会将可怕的野蛮人赶到漠北草原深处，虚弱的时候就修筑长城或莱茵防线^①。农耕文明的帝国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世界之外，就是把世界包括在帝国之中。用一道墙分隔开文明与野蛮的世界，既体现着他们的信心、创造力与想象，也表

^① 古罗马帝国修筑在北方莱茵河一线的防御野蛮人入侵的工事，类似中国的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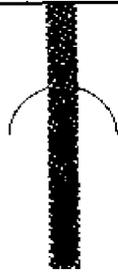


现出他们的恐怖、保守心理与某种令人绝望的僵硬。斯基泰人、匈奴人、日耳曼人、突厥人、蒙古人不时在他们自己的英雄率领下，无情摧毁这些文明障碍，使封闭的帝国在毁灭中敞开自己，使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在痛苦中接触对方、了解对方，甚至混同于对方。

农耕民族分隔世界，游牧民族串通世界。这是旧大陆文明的规律，也是欧亚大陆南北的区别。在国家历史上，我们谴责这些残暴的入侵者，在全球文明中，我们或许应该感谢这些伟大的野蛮人，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提拉^①或成吉思汗们，他们的暴行可能突然间把各自封闭的国家变成向世界开放的通道与桥梁。

公元13世纪，蒙古人再次使自己的家乡成为世界的桥梁。在世界文明的历史上，它第一次彻底打通了欧亚旧大陆东西与南北的界限，在欧洲与中国两个相互隔绝的世界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大汗的金牌使马可·波罗们在北京与巴黎之间畅通无阻。从西方角度看的“蒙古和平”，从中国角度看是“蒙古征服”。同一历史事件从民族国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观察，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义。蒙古入主，在中华帝国二千多年的历史，是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唐强宋富，将中国古代文明推向高峰，接下去是两次彻底的异族统治（蒙元与满清），中国文明从此衰落。“蒙古和平”对西方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它开放了欧亚大陆的交通，暂时抑制了伊斯兰文明的发展，进而诱发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马可·波罗那一代的欧洲人有福了，他们生活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欧亚旧大陆范围内的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甚至世界宗教，瞬间都有了可能，又瞬间消失。那是人们世世代代生活中少有的大时代，灾难与机会、痛苦与幸福，都是那么富于戏剧性；在平庸的后人眼里，他们的旅行与冒险、传教与贸易，把历史变成传奇。

^① 阿提拉(Attila, 约406—453)一再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帝国国王。约433—453年在位。



六 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鲁布鲁克没有再回东方去。不管怎样，他以为这种盲目轻率、出于短期政治利益的出使是没有意义的。权力使人愚昧，愚昧的人又使权力堕落。权威或决策者，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总喜欢心血来潮地做出决断。这就给执行者带来了许多有苦难言的遗憾。这是人性的弱点在历史中留下的证据。鲁布鲁克《东行记》的结尾感慨颇多。他说“我以为再把教友派到鞑靼去，像我去或者像布道修士那样去是不合适的”。他希望教皇能郑重其事地派出一位主教，提供充足的旅资，而且至少要几个好翻译。

教皇和圣路易都没理睬鲁布鲁克的肺腑之言，他们有许多阴谋要施行，有许多利益要瓜分，要争权夺势，要打撒拉逊人，要组织十字军，要滥发赦罪券，他们要处理眼前的是是非非。权力使人愚昧。

十多年以后，波罗兄弟传大汗的话给教皇，请求派100名德行兼备的教士去中国，不知是真是假，教皇置若罔闻。再过二十年，高维奴到北京，也像是个流浪汉，条件丝毫不比鲁布鲁克优越，甚至可能更差。他靠自己的宗教热情在异族他乡挣扎出最初的模样后，教皇的主教委任才姗姗来迟。

历史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事业，都是由一些真诚勇敢的小人物自发完成的。他们用自己单薄的精神燃起生命之火，将世界照得光明，让人们在暗夜里也能看清脚下的路，看清前面的努力的方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九：23）鲁布鲁克过世不久，他就有了出色的继承人，这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也更有实效。他将天主教带到中国，借着蒙古王朝的庇护，做了第一次传教的努力。他是一位在精神上与利玛窦一样可敬的人，尽管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叫约翰·孟德·高维奴。

蒙古世纪去中国传教，从一开始就是件令人失望的事业。



圣方济各会修士约
翰·孟德·高维奴。

1294年，阿罗本到长安的六百六十年后，初春的某天傍晚，一路风尘的高维奴，终于来到华北平原上的这座湖水、飞檐与高塔的皇城——汗八里。他发现，“从来没有使徒或使徒的弟子来过这里”。^①

在波斯语中，汗八里指元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孟德·高维奴是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士。五年以前，他从罗马出发，受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前往大汗的国家传教。从大不里士到霍尔木兹，穿过阿拉伯海到南印度。经过五年的漫长旅行，终于到达元大都。“从来没有使徒或使徒的弟子来过这里。”孟德·高维奴在1305年写给教廷的信中说。汗八里没有传教士、没有正统的基督徒，聂斯脱里派教徒（即景教徒）的行为根本不像基督徒，而且排斥、迫害他。

孟德·高维奴是基督教入华传教第二次浪潮的先驱。传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一个人，在陌生的土地、陌生的人群中传教，是一项令人感动的事业。我们可以在高维奴的传教经历中，仔细体味信仰战胜

^① 孟德·高维奴从中国发回欧洲教会的信现存的两封，见《出使蒙古记》，第262—269页。出自这两封信的引文不另注。

孤独的力量：

“现在，我在此次旅行之中，孤独一人，没有一位神父相助，已有十一年之久，直至一年多以前，才有科隆省的一位日耳曼人教友阿诺德（Anold）来到我这里。”（《第二封信》1305年1月）



据说“对基督教徒非常宽厚”的忽必烈大汗。

“仁爱的修道会

要求我们，相互远离的人，尤其是为了基督的戒律远行的人，当他们不能相互见面时，至少应该常通书信，相互安慰。我想，你们可能十分奇怪，我长期居住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信。但是，我也同样地奇怪，直至今年为止，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教友或友人寄来的信件或良好的祝愿。因此，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个人记得我了，特别是由于我听说，关于我去世的谣言已经传到了你们那里。”（《第三封信》1306年2月）

高维奴深得大汗的宠信，大汗“对基督教徒非常宽厚”，但使大汗皈依基督教，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对偶像教的迷信太深了”！自上而下推行的传教事业，起点上就遇到了致命的障碍。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他在汗八里建了一座教堂、一座钟楼，买下40名男童，为他们施洗礼，如今他们已能在教堂唱圣诗了。他还派人去刺桐（今日泉州）设立传教点。那里有教堂，主教，教友。他为大约六千人施行了洗礼，还使汪古部的阔里吉思王皈依了天主教。阔里吉思王在东胜建了一座壮丽的天主教堂，高维奴遗憾他无法离开汗八里去二十天路程远的东胜看看，阔里吉思王不久就去世了。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①上帝的奇迹正一点一点地借助他的信徒在尘世的努力与牺牲表现出来。现世的光阴里，他忍受了那么多痛苦，传教艰难、痛苦与孤独，他在信中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头发已经白了，这是由于劳苦和忧虑，而不是由于年高，因为我现在不过才五十八岁。”

“似乎没有人记得我了。”高维奴写信给教皇，希望教廷能给他派几位助手来。他要求这些人必须是些真正献身于传教、不求个人声名的人，因为旅途太危险、传教太艰难。1305年高维奴写给教皇的信，一年多以后到罗马。这时教廷才想起这位离去多年的修士，或许大家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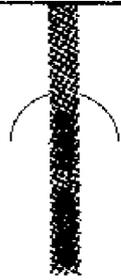
“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高维奴的两封信由商人带回了西方。他执著的热情与勇气感动了教皇。教皇慷慨任命他为驻北京的中国总主教，同时委派七位副主教去协助工作。高维奴成功了。然而他付出了代价是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他现世的家乡。他要死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主教的位置上。1313年七位副主教中只有三位到达了北京。另四位在漫长艰苦的旅行中殉教了。^②

高维奴从幸存者手上默默地接过教皇的任命书时，他到汗八里已经二十个年头。授职典礼上他一点也不激动，千山之外，沧海茫茫。他被锁在一项令人绝望的使命中，异教徒们继续“堕落”，出于各种动机接受洗礼的人，也总是三心二意。盖一两座壮丽的教堂算得了什么，如果深厚的钟声在教徒的心里没有震撼力的话？阔里吉思王去世以后，汪古部的天主教徒纷纷又都回到景教寺。

祈祷吧！遥远的异乡的日日夜夜就这样度过。世俗中人也许只能理解空虚，无法体会到他们那种等待圣灵降临与祝福的心是多么充盈。

① 《路加福音》九：23。

②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曾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他在印度塔纳听说的四位僧侣殉教的故事，不知是否跟他们有关。见《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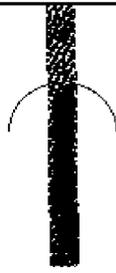
基督教传教士从多瑙河畔追赶蒙古骑兵的足迹，一直到中国。他们看到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机会，那么广阔的疆土，那么富足众多的人民，如果把他们都带到基督的灵光中，世界该是多么圆满。可是万分遗憾，这一切仍太遥远。

草原帝国的宗教态度是天真自由的。1323—1332年在泉州担任主教的佩鲁贾人安德鲁在致家乡的修道院的一封信中说：“在这个广大的帝国中，确实居住着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和信仰各种教派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自由生活。”^①

大汗的国土上信仰自由，这是基督教传播的机会，也是传教的障碍。绝对的宗教自由从本质上拒绝信仰。孟德·高维奴1294年到达中国，在元朝首都汗八里的最初那些年里，连一位对他忏悔的人都没有。1307年他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的大主教。1328年他在北京去世时，据说在中国的拉丁基督教教团，已有上千人。这个高潮即使没有夸张，也是昙花一现的奇迹。1326年，刺桐主教安德鲁在泉州城外半里路的一座“华丽舒适”的天主教堂里给家乡佩鲁贾的教友写信，周围是一片秀美的林木。他说“在大洋之滨，有一座大城，波斯语称之为刺桐。”城里有一座教堂，“华丽宏大”，是一位亚美尼亚贵妇捐助的；城外还有一座教堂，可供20位教友住宿。

蒙古世纪的后五十年，基督教进入中国。在这五十年中，基督教的传教范围也大多在非华族人士中。汗八里是外族人的天下，高维奴只懂鞑靼语。另一个传教点泉州，是当时的通商口岸，也是外族人较多的地方。当时所有来中国的旅人都说“行在”（或译京师，即今杭州）是世界上最大最美最富足的城市，汗八里的主教为什么不在那里设传教点？大概是因为那里主要是汉人的天下。对中国而言，蒙古世纪的传教很少触及真正的中国人。而且，即使在中国土地上的外族人中，基

^① 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见《出使蒙古记》，第273—275页。



督教的声音也是微弱的。他们去东方收获灵魂，但成果太微薄。刺桐主教佩里格林教友说：“确实，收获物是巨大的，但从事收获的劳工是很少的，而且他们没有镰刀。”

收获没有镰刀。蒙古世纪的传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遗憾。准备去大举收获灵魂的人，满心欢喜地来到地里，却发现自己没有镰刀。实际上就连这种惋惜也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传教士和当时的欧洲旅行者都生活在极少数的鞑靼人中。他们不懂汉语，不认识中国人。可是，中国是中国人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进入中国不会被中国同化，除非他们很快就离开，像蒙古人那样。欧洲传教士从多瑙河畔追赶蒙古的足迹，一直赶到中国。他们传教事业微乎其微的成功案例，还是蒙古人、色目人或其他民族人。那些徐徐而行、幽幽而思的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了解的还太少，甚至根本不了解。马可波罗曾经注意到：“所有蛮子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撒拉逊人或基督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

基督徒不了解中国。他们千山万水、九死一生来到中国，可他们并没有生活在中国，也没有让福音扎根在中国。中国是世俗精神最强大的地方。只有世俗的眼光才能真正地发现中国。物华天宝，信仰宽容，从一开始就窒息了传教士的雄心与想象。基督教建立在深厚的苦难上，中国没有接受基督教的精神基础，也不了解这种崇高的、甚至带有些自虐色彩的宗教。汉唐时代的悲壮与豪迈已被塞外的黄沙掩埋，留在诗文中的记忆如今只能为才子们遣怀。谦和聪慧的中国人，喜欢好好地经营现世生命，把自己的一生过得快快活活的，热热闹闹。他们很多世代居住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不想太过遥远的东西，不想漫漫长夜无尽的祈祷，也不想千山之外沧海自由。如此脆弱的生命，需要多大的世界？



七 欧亚大陆一体化与“蒙古和平”

从西方角度看的“蒙古和平”，从中国角度看是“蒙古征服”。然而，这只是民族、国家本位的观点，如果从全球本位或世界一体化本位看，所谓“蒙古旋风”则显示出另一番意义。它上承1500年间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冲动，下启全球文明的历程，是全球文明一体化历史中关键的一步。

以前许多个世纪，欧亚大陆就是人类文明的核心，甚至世界概念也等同于欧亚大陆。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北冰洋到印度洋间这片大陆广袤的土地上，公元前40世纪开始，陆续出现了五大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华夏文明）与爱琴海文明（古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尽管地处非洲，但它在人类历史上与苏伊士地岬以东的亚洲和地中海的联系要远远多于与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的联系。这些诞生于水边的文明，各自繁荣，相互影响，从成长到衰落，从中心到边缘，渐渐清晰了，又渐渐远去。

大河文明最早出现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来自北方高山与南方沙漠的民族，先后在这片肥沃的河谷从事农耕、贸易、征战，修筑城市与道路，创立文字与法典，从矿石中冶炼铜，在石头上雕刻神像与诗。他们把自己的家园建成人类最初的乐园，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历史从这里开始，公元前5000年。

两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达到鼎盛，此时古埃及第一王朝已经建立。或者是因为尼罗河东岸的金矿招来了巴比伦的商人，或者是因为黎巴嫩的木材吸引了法老的建筑师，总之通过苏伊士地岬或红海，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圆柱形印章、陶轮、战车与权杖、冶铜与雕刻技术，传到埃及。埃及文明的繁荣是考古发掘难以复现的，金字塔只是一个方面，埃及人说，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因为只有金字塔

留下来了。

埃及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图书馆，狮身人面像完成的时候，印度河文明正在高峰（前2500年）。关于这个被淤泥淹没的文明我们知道的很少，发掘者马歇尔爵士惊讶4500年前的印度人居住在城里好几层高的楼上，佩带的首饰精美，像是现代伦敦珠宝行里出售的。两河流域公元前2300年的废墟中发现的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与波斯湾巴林岛出土的印度河流域产品，说明在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曾有过交往，如果穿越伊朗高原的陆路不通，波斯湾的海路畅通。

泛滥的河水与雅利安武士摧毁印度河文明的时候，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已到商朝。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建筑用砖——太阳晒干的砖与火窑烧出的砖，埃及人用不朽的石头，中国人用速朽的木头，所有这些文明都用象形文字，只有华夏文明把它保留到今天。殷商文明的器物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两河流域的源头，但又难以证明其迁移传播的过程，横贯中亚的高山沙漠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可逾越的。

欧亚大陆东头的华夏文明相对独立也相对完整，西头的爱琴海文明看上去却是两河流域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延伸，克里特岛是理想的中转站，商人、水手将西亚、北非的文明成果移植到希腊半岛与意大利。

几十个世纪的迁徙、贸易、战争与掠夺，各自中心的文明相互影响、融合，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至少在公元前5



象征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

世纪已经联成一片，大流士一世要求希腊进贡土地与水，希腊拒绝了，于是波斯帝国的“不朽者”与希腊城邦的勇士，面对面地站在阵地上。

来自里海沿岸、伊朗高原的武士们，用战车、长矛、弓箭，向西征服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向东征服了印度河流域。波斯帝国20个行省，统治着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高加索山脉到波斯湾的广阔土地，大流士的“古代皇家大道”串通了三个大河文明，海上航线从开罗过红海一直到孟加拉湾。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亚洲就是波斯帝国，雅典或斯巴达不过是波斯帝国边缘上的小城邦。

亚历山大东征是个难以想象的奇迹。大流士的后代走投无路自杀，亚历山大成了“万王之王”。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下、印度河三角洲，他以为他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亚历山大东征将欧亚大陆与埃及的四种文明最终连成一体，只有华夏文明除外。“希腊化时代”是波斯的希腊化，也是希腊的波斯化，而最有意义的是，印度河畔建起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Sogdiana），雅典出现了印度织



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大流士时代王宫的遗址。

物。马其顿帝国将印度文明带入希腊文明，也将希腊文明带入印度文明。那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物资与技术、语言与艺术、人与贵金属，在地中海与印度河间的广阔地区流通。一种混杂着希腊语与波斯语的名叫“Koine”的语言与波斯金币一道，



亚历山大大帝塑像。

在雅典与索格狄亚纳（即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大夏）通用，阿富汗的索格狄亚纳城举行希腊式的竞技比赛上演悲剧，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庆祝酒神节，雅典学园里有印度僧侣布道。只有华夏文明，在这个“世界”之外。

从波斯帝国到马其顿帝国，古代世界西部的四大文明已完成了最初的“一体化”。亚历山大远征终止在兴都库什山。在连绵隆起的大山以东，是另一个世界——华夏文明扩张的世界。“希腊化时代”的融会与交通，希腊化或波斯化世界与中国的隔绝，形成了一种新的、以中亚大山为界的旧大陆文明的地缘秩序。

文明是地理的产物。如果你想将太大的欧亚大陆分成两部分，最自然的分界应该是横亘中亚的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草原与一系列最高的山脉，这是欧亚大陆最辽阔也最壮丽、最沉静也最神秘的核心。在辉煌隆起的亚欧大陆上，连绵不断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阿尔泰山、阴山、大小兴安岭，像一道由雪峰与高山森林树立的天然长城，将华夏文明与其他四大文明隔开。所有这些大山都是东西走向或东南向西北走向的。它们巍峨崛起、连成一线，山西山北是一个世界，山东山南是另一个世界，只有那些险隘的山口、围绕大洲

的海，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当人类的主要交通工具仍是马匹、骆驼与帆船时，草原与大海是路，高山则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自然地理的界限也就成为文明的界限。

亚历山大从印度河撤军，他面对的不仅是印度军队的象阵，还有北方的沙漠、东方的高山、南方的大洋。东征不可能继续，不管是在现实还是在观念中。将中国与“世界”隔开的大山与戈壁草原是不可逾越的，何况在古希腊人的头脑里，亚洲就是波斯帝国，这里已是世界的尽头。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华夏文明故土上的列国也在进行争霸与争盟，战争的规模与野蛮程度丝毫不亚于西方。一百年后，秦始皇的东征终于统一了“天下”。

六王毕，四海一，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就是一个世界，欧亚大陆上的东方世界。亚历山大以为自己征服了“世界”，中国在“世界”之外。中华帝国有野心的君主们也想征服“天下”，而西方也在“天下”之外。中亚那天幕般的大山屏障隔绝了两个世界。

公元前四世纪，欧亚大陆与埃及的四种文明已经联成一体。他们



只有这些“地下军团”的战士，仍在静静地纪念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的壮举。



在人种上同属于高加索人种，在语言上同属于印欧语系。只有华夏文明除外。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华夏文明开始向东南扩张，远及日本与南洋，在人种、语种上也具有同一性，西方文明除外。横贯中亚的大山从孟加拉湾一直绵延到鞑靼海峡，既是一个地理分界，也是一个文明分界。它将欧亚大陆分成东西两个世界，而且自然的界限与人文的界限恰好是重合的。

中亚大山以西是一个相对一体化的西方世界，中亚大山以东是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东方世界。西方世界四大文明在人种、语言、信仰、迁徙、贸易与战争上相互联系，从印度河到地中海的“世界一体化”，至亚历山大东征已基本完成，余下的南印度，在罗马帝国时代也由商船沟通了。罗马帝国继承了马其顿帝国的西部，政治上波斯化，文化上希腊化；安息帝国继承了马其顿帝国的东部，与罗马帝国对峙，双方的战争与贸易是惯常的交流方式。罗马帝国衰亡，伊斯兰帝国兴起，伊斯兰化世界恰好覆盖了一千年前的希腊化世界。中世纪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在地中海的冲突，是因为他们有同一个圣地（耶路撒冷），他们的教义有些相同。华夏文明将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连成一体，在人种、语言、信仰、文化与政治结构、历史交往上，对内的共同性与对外的差异性都同样有效。直到19世纪，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汉字都是通用的书面语言，儒学都是一种共同的文化。

在东西两个世界之间，中亚是陆上文明走廊，东南亚是海上文明走廊。高山与高山之间险隘的山口与海岛与海岛之间的海峡，是东西两个世界交通与交流的要道，也是东西两种文明互渗的过渡带。亚历山大与秦始皇的征服都没有抵达对方，那是知识与能力的局限。百年之后，沿着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山脉之间的那条大峡谷，张骞出使西域。或许在大夏（索格狄亚纳）、康居，他也听说过褪了色的亚历山大传奇。汉军征讨大宛，在上药杀河流域，大将军李广的营盘就驻扎在



张骞通西域（壁画摹本），敦煌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北壁，绘于公元8世纪初。

亚历山大希腊联军 227 年前的战场。丝绸之路上丝绸流入西方，佛教传入中国。贪欲缩小地球。或许为了丝绸，罗马商人走通南海道，绕东南亚来到汉朝，假冒安敦王的使者。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东西交通的主要渠道是中亚陆路；公元第二个一千年，则在东南亚海道。

地理也是文明的产物。如果以大海划分大洲，欧亚大陆就是一个洲。如果要将这个太大的大洲一分为二，自然的界限与文明的界限都应该是中亚的这道高山屏障。如果在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下以地中海、黑海、高加索山脉与乌拉尔山脉为界限，将欧亚大陆的西北角或一个半岛划出一个欧洲，那么在这片大陆上，阿拉伯、印度、中国、俄罗斯，甚至东南亚，都可以成为一个洲。目前通行的欧洲与亚洲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构成的，既不科学也不适用。狭小的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大陆（地理上的洲），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在文化与自然上都没有成为一个洲的根据。广阔的亚洲也没有地理与文化对内的同一性与对外的差异性。东亚与西亚之间的人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共同点不但不多于西亚与欧洲，反而少于西亚与欧洲。

常识往往掩盖了真理。与欧亚大陆的洲际概念同样具有迷惑性的常识性概念是西方与东方。亚洲的概念与东方的概念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西方（主要指西北欧）使用的东方可能指地中海以东的地方，也



可能从东欧开始就都算东方。不管怎样，东方至少有三重意义，一是欧洲之东方，二是西方之东方，三是欧亚大陆之东方。欧洲之东方指东欧，西方之东方指近东或西亚与印度，只有欧亚大陆之东方，才指华夏文明区。全球意义上的世界之东方在地理概念上是不准确的，极东就是西，极西就是东，这一点在哥伦布时代就很清楚。欧亚大陆东方与西方的分界，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明上，中亚的大山依旧是合理的依据。

罗马、安息、贵霜、秦汉，纪元前后四大帝国分割了欧亚大陆，其中三大帝国建立在希腊化世界的旧址上，中国独立在外。忧郁的三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帝国汉与罗马，几乎同时陷入困境。旧世界中部崛起，从两河流域到阿富汗，出现了庞大的萨珊波斯帝国。刚刚开始越过大山沟通中西世界的丝绸之路，消失在萨珊波斯帝国境内。华夏文明在大唐帝国复兴，版图超出中亚大山以西。伟大的贞观之治降临时，荒蛮的阿拉伯半岛上，响起神启的声音。圣战号召下阿拉伯骑士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的世界帝国，四百年间覆盖了整个希腊化地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巴格达，那里是“世界之都”。

“伊斯兰和平”是继希腊化时代又一次欧亚大陆一体化运动。拜占庭帝国的海军覆灭，基督教文明退回到地中海以西；萨珊波斯的王子流亡长安之后一百年，黑衣大食^①的呼罗珊总督打败唐将高仙芝^②，华夏文明又退回到大山以东。伊斯兰帝国地跨欧亚非大陆，《古兰经》从伊比利亚半岛一直念到河西走廊。如果说陆地的中亚与海上的东南亚、骑士与商人、沙漠中的骆驼与海上的三角帆帆船，将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连接起来，西方文明则被阻隔在世界之外。公元3世纪到13世纪，西方陷入中世纪与世隔绝的黑暗，古代文明被教皇驯化的北方蛮

① 中国以“大食”称阿拉伯人，源于波斯语(Tazi)。白衣大食指倭马亚王朝，因其旗帜尚白，黑衣大食指阿拔斯王朝，因其旗帜尚黑。

② 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



族遗忘了，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世界消失在新月旗帜下，世界对基督徒关闭着，直到更野蛮的蒙古骑兵来，豁然为他们打开。

八 去东方，难有收获的旅行

最初在草原帝国大道上东行的欧洲人，是些准备去地狱探险的勇敢的教士。可是渐行渐远，直到契丹，无意间却在这条路的尽头，他们发现了人间天堂。这是一个世俗喜剧，与但丁《神曲》（《神曲》的原意为《神圣的喜剧》）的经历相同。探险者从自己的家乡出发，战战兢兢地踏上地狱的历程，目睹并经受了种种恐惧与苦难之后，光明在某一个早晨突然出现在前方，就象波罗一家或高维奴站在华北平原上望见汗八里金碧辉煌的宫殿。

原想下地狱的人无意间却到达天堂，历史的诡计隐藏在几代人经历的一个并不轻松、但结局让人兴奋的玩笑中。人们渐渐已经忘记了那些野蛮的鞑靼人。他们进入了高墙（长城）围起的帝国，这里大得像另一个星球，过去他们一直以为这里就是关闭歌革与玛各的地方。现在才知道那种封闭的、偏狭的想象与世界的偏差该是多么大。契丹不论从何种角度上看，都是当时欧洲人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的世俗的天堂，“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繁荣、文明、秩序、宽容，如果还有一些遗憾的话，那就是这个天堂属于异教徒。

虔诚的高维奴在他寄自北京的第一封信的最后写道：“据我见闻所及，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或君主能与大汗陛下比拟的。”（高维奴出使一共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从印度发出的。第二封信与第三封信都是从中国北京发出的，所以他的第二封信又是他从中国发的第一封信。）泉州主教安德鲁也说：“我不想谈这位伟大皇帝的富有、庄严和光荣，帝国国土之广，其城市之多而且大，帝国治理秩序之清（国内无人敢拔刀侵犯他人），

因为如果一一描述，这封信就太长了，而且听到的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即使是我，虽然亲身在这里，听到这些事情，也很难相信。”^①

刺桐主教佩里格林教友说：“确实，收获物是巨大的，但从事收获的劳工是很少的，而且他们没有镰刀。”蒙古世纪西方基督教去中国传教，起先是满怀希望，然后是失望。孟德·高维奴主教带去了新的希望，以后的成效让人将信将疑，而最终留下的，也是遗憾。准备去东方大举收获灵魂的人，幻想太美好、过程太艰难、成果太微薄。

蒙古世纪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范围也大多在非华族的“色目人”^②中。汗八里是色目人的天下，高维奴只懂鞑鞑语。另一个传教点泉州，是当时的通商口岸，也是色目人多的地方。当时所有来中国的旅人都说“行在”是世界上最大最美最富足的城市，汗八里的主教不在那里设传教点，大概因为前朝首都，色目人少，汉人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是外国人，也生活在外国人中间。他们将外来的景教教众当作他们争夺的对象，还有随蒙古人一同到来的阿兰雇佣兵，即使在这些“外



《马可·波罗游记》写本中的汗八里地图。

① 《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3—274页。

② 元代称本族诸姓为蒙古，称外族诸姓为色目，包括钦察人、唐古特人、回回人等；称高丽、女真、契丹及中国北部之人为汉人；称中国南部之人为南人。其待遇蒙古最优，色目次之，汉人南人更次之。

国人”中，比起佛教、萨满教、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的声音也是最微弱的。外族政权可以优待这些外族传教士与他们的宗教，本土政权复兴后，他们将被连根拔起。

孟德·高维奴和他的传教团在中国的福音事业最有起色的时候，他的同乡鄂多立克修士，也到了中国。鄂多立克修士的家族是意大利弗里乌黎省的波登隆埃县的贵族。1286年，出生在该县诺瓦村一幢二层的小楼房里，旁边是美丽的葡萄园与桑树林。19世纪末，裕尔还见过那幢房子，或许周围的田园风光还真让他感动。鄂多立克早年就服务于教会，生活清苦，一度为了躲避教职的提升，还退隐到荒野。早在去东方旅行之前，他那圣徒般的生活就为他赢得了不小的名气。不知为什么，1316到1318这两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动了去东方旅行的念头。

鄂多立克也是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士，1318年，他从威尼斯登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特雷比松，从那里一路向东南，到大不里士、忽里模子、马巴尔、苏门达腊、爪哇，最后，在刺桐港登陆，住进了他的教友主持的泉州城里的天主教堂。我们实在无从知道他出使的使命是什么。教会中传说他在东方皈依了两万个撒拉逊人，并给他们施行了洗礼。似乎有些不着边际。

鄂多立克的



鄂多立克为亚洲人布道。鄂多立克墓大理石浅浮雕。

旅行似乎是纯粹的个人游历。他没有带任何世俗或教廷的信函，也没有谒见什么汗或大汗。他只是自由自在地游历，见闻、传教、生活，晚年在病榻上口述“东游录”时，他明说他是“为了赢得某种灵魂的收获，越过海洋访问异端诸国”的。

鄂多立克从海路到中国，将中国南部(马可·波罗说的蛮子省)称为“上印度”^①。“蛮子省有两个大城”^②，他所见到的辛迦兰^③大城“比威尼斯大三倍”，“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刺桐城“有波洛纳^④的两倍大”，物品繁荣，应有尽有。还在印度马巴尔的时候，鄂多立克就知道刺桐和刺桐城的两座天主教堂。从刺桐到福州，从福州到杭州，他说“行在”(即杭州)是“天堂之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

鄂多立克的旅行从南到北。所见所闻，都是些“大奇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多的人、最繁华的城市、最大的河流。鄂多立克从南京附近渡过长江，沿运河北上。他大概已经知道这条大江横贯的国土，江北叫契丹，江南叫蛮子。扬州、临清，从长江到黄河，鄂多立克的游历深入契丹。他见到一条名叫哈刺沐涟^⑤的河，也知道这条河“决堤时给该邦带来极大祸害”。鄂多立克是位细心的游行家，观察细致、博闻强记。到大汗京都汗八里，鄂多立克看到的是“全世界最美的宫殿”。皇城宫阙巍峨，大汗的朝会、狩猎更是壮观。鄂多立克在汗八里居住了三年半，那时高维奴大主教还在，鄂多立克就住在他的教堂里，甚至与他同修会的教友朝夕相处。但在他的《东游录》中，鄂多立克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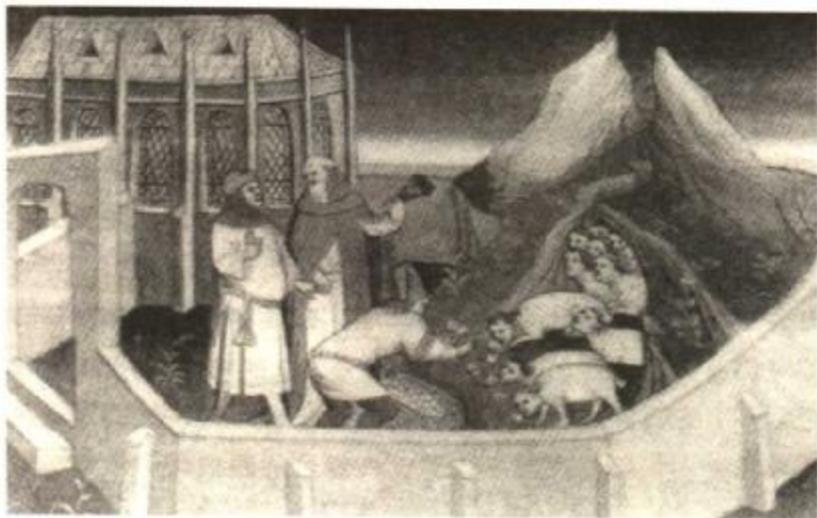
① 中世纪欧洲经常将伊斯兰世界以远的东亚与南亚笼统称为印度。

② 《鄂多立克东游录》的有关引文见《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0页。不另注。

③ Censcalan, 广州。

④ Bologna, 意大利北部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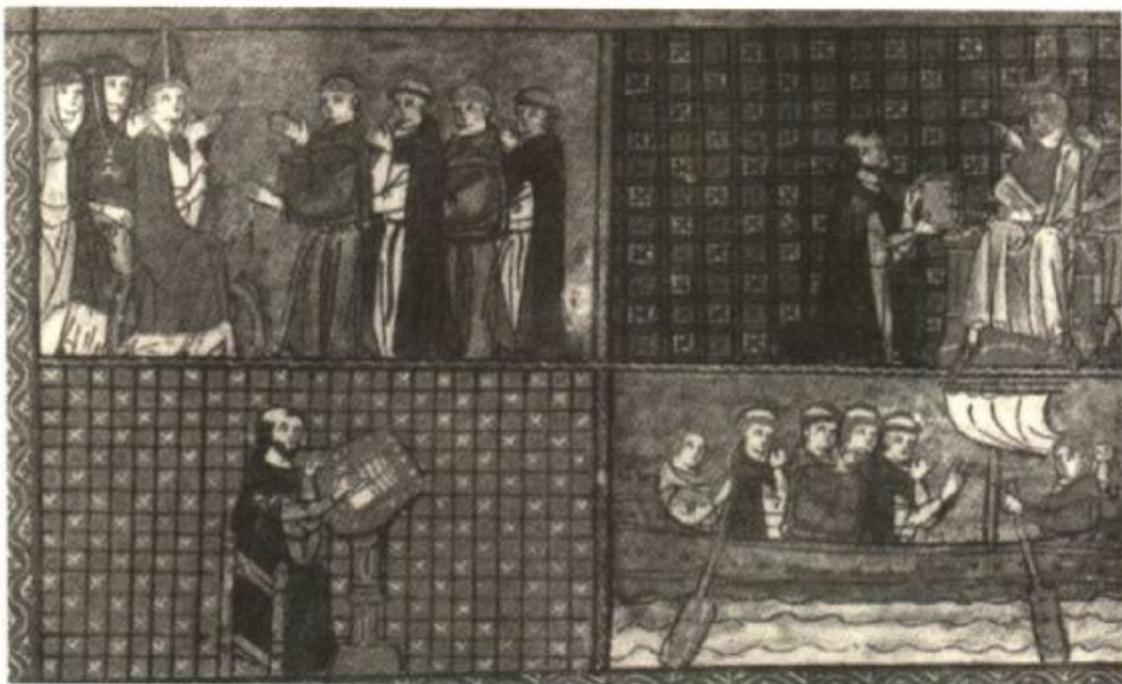
⑤ Caramoran, 蒙语黑色的河,指黄河。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细密画，行在城的人面兽。

少谈及汗八里的教务。唯一一次他与四位教友去城外路旁迎接从上都回来的大汗，四位小级僧侣守候在路边的树荫里，为大汗唱圣诗，献上十字架。躺着的大汗起身“脱掉头上戴的帽子，极尊敬和谦恭地亲吻十字架……”。

那个时代的冒险家很多。高维奴到北京时，马可·波罗已经返回威尼斯了，1293年春夏时节的某一天，他们二人可能在印度南部的某个城市碰到过。他们都是意大利人，他乡遇故人，一定很激动。高维奴在波斯的帖兀力思城，还遇到过意大利卢卡隆戈大商人彼得，后者一路伴随高维奴东行，并在汗八里购置地产送给高维奴建了一座教堂。高维奴在北京的最初十年里，还有位恶言恶语的伦巴第医生到来，他“散布了许多亵渎诽谤罗马教廷、小教会和西方国家的难以置信的流言蜚语”（高维奴第二封信），让高维奴感到困惑。1346年摩洛哥游行家伊本·拔图塔来到泉州，他也见过不少西方商人、教士。写作《通商指南》的意大利人裴哥罗梯自己虽未亲历中国，但在商界服务多年，一定认识许多从契丹回来的商人。而去过中国的鄂多立克，说他在威尼斯见过很多去过行在的人（《东游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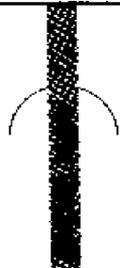


鄂多立克游历中国。

孟德·高维奴的死讯1333年才传到亚维农的教廷^①，教皇委任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为汗八里大主教，接任孟德·高维奴，尼古拉一行26人走草原之路前往契丹，最后听到他们的消息是1338年在新疆的伊犁。尼古拉并没有到汗八里，可能在下面一段旅程中出了意外。教皇的使者迟迟未到，元朝皇帝需要阿兰骑兵，信奉基督教的阿兰人需要主教。阿兰教徒上书教皇，元顺帝也将下谕旨，遣在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与阿兰教徒代表去教廷请主教。这一次教皇派出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人约翰·马黎诺里，1339年5月，约翰·马黎诺里在那不勒斯启程，他离开意大利的最后一站恰好是半个世纪前列班·扫马踏上意大利土地的第一站。

迄今为止已有三位伟大的“约翰”受遣去远东了。他们是约翰·

^① 亚维农，法国南部城市，又译阿维尼翁，1305—1377年教皇居留此地，教廷亦迁至此。



柏朗嘉宾、约翰·孟德·高维奴、约翰·马黎诺里，他们都是使徒约翰的出色的后代。马黎诺里1342年秋到达元大都，向元顺帝献上一匹高大的战马^①。他在汗八里住了三年，在繁华中看到奢侈，在强大中看到腐败，或许是他预感到大汗皇朝的末日，才不愿意像第二个约翰那样留在那里。他在回到欧洲撰写的《世界史》中记述这段经历时说大汗挽留他，知他去意已定，才不得不放行：“皇帝见我决意不愿久留，遂准许我返回教皇处，并给我三年的盘费和礼物。皇帝希望教皇派我或者另一有权之红衣主教迅速返回，充当主教，因所有东方人，不管他们是否为基督教徒，皆最崇拜主教。来者应属方济各会，因为东方人只认可该会教士……”^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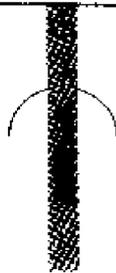
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1353年到达亚维农觐见教皇的时候，距离鲁布鲁克出使，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前的圣方济各会修士恳求大汗允许他们留在东方传教，一个世纪后，同样是圣方济各会修士，恳求大汗允许他们返回西方。一个世纪的传教事业，坎坷磨难，最后是世界变了，还是教士们变了？1348年，意大利画家安布洛佐·洛伦采蒂逝世，他在《圣方济各会修士在休达殉难》一画中曾画过三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其中两个蒙古儿童正在向传教士扔石块。

九 条条大路通中国

蒙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意义，就是它以野蛮的方式冲破了旧大陆自然与文明的界限，使人类五大文明连成一体，完成了希腊化

^① 中国记载见《元史》卷40，《顺帝本纪》：至正二年，“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②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7页。



时代以来又一次世界一体化运动。这次强大而残酷的开放运动，不仅给旧世界的商贸带来难得的机会，也给传教带来难得的机会。

蒙元世纪从欧洲到中国，至少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北陆路，在北纬45度到50度之间横贯东西的北方草原之路，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就是走的这条路到中国北方边境；另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陆路（丝绸之路），它穿越西亚、中亚伊斯兰世界，到达中国西域；一条是海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这两条道路经常交叉使用，孟德·高维奴与鄂多立克，都先后走过后两条道路。

这三条道路，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过一位名叫亚里斯特亚士的希腊人，二千年前曾从顿河口的某个集市出发，随斯基泰商队沿着草原“黄金之路”到达希波里波利安人的家乡，据说那可能就是周王朝的中国^①。当年根据气候判断的伸向北方的这条黄金之路，实际上是一直在北纬50度左右横贯欧亚大陆干草原地带的东西贸易之路，也就是柏朗嘉宾、鲁布鲁克走过的草原之路。

南陆路就是最著名的那条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李广利征大宛，陈汤远袭郅支，实际上已走完横跨欧亚大陆从长安到罗马的一半路程。军事征服、政治通使、商贸交往，在纪元前后就开启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串通起旧世界东西两大文明。那些在山麓沙漠间星罗棋布的小小的绿洲国家，成为洲际交通的驿站，中亚那些半农耕、半游牧的民族，则成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搬运工。他们贩运物产也贩运文化，一篇古回鹘文献写到：“……他们无休止地进行贸易，他们是获利者……他们从东走向西，从西走向东，把你所要的东西给你带来，他们有上万件宝贝，世界上的珍品……如果没有这些商人，没有他们在世

^① 参见《欧洲与中国》第一章“朔风以外”，（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版，第1—26页。

界各地旅行，那么你何时能穿上黑色貂皮？如果中国的商队折断了队旗，那么那一万件珍宝将从何而来？……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商人，跟随他们一起干吧！把



穿越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公元5-6世纪的陶俑。

大门敞开吧！为获得那些东西而努力奋斗吧！如果你使它们保持价廉，那么你的美名就将传遍四方，请你相信吧！”^①

丝绸之路与其说是一条路，不如说是文明交通的区域。众多繁复的路，在亚洲腹地汇成一个广阔的贸易市场与文化交流的舞台，沟通了华夏与地中海两大文明^②。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清楚地知道，有两条路可以通赛里斯（丝绸之国，即中国）：一条路是陆路，一条路是海

① 转引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② 丝绸之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地区。草原沙漠，路径广阔，高山隘口亦可以选择，跨过中亚从东向西，实际上有若干条线路。另外，由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政治的变故，当年商旅走过的路线已很难准确描述。没有一条路不分支交叉，许多市集都四通八达，从中原九州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庞大的交通网。为了研究的方便，学者们经常将丝绸之路分为几段，四段或三段。赫德逊根据区域政治集团将丝绸之路分为四段：

“1. 从甘肃到帕米尔，这一地带最方便莫过于称为喀什噶里亚(Kashgaria)，是现代新疆的一部分，位于天山分水岭以南，包括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以东的沙漠区；

2. 从帕米尔到木鹿沃洲，即大夏或粟特，这要看它是遵循巴里赫还是撒马尔罕路线而定；

3. 从木鹿到塞流西亚，包括塞流西亚在内；

4. 从塞流西亚略为偏西的一点到幼发拉底河上宙格马的罗马边界。”（《欧洲与中国》第51-52页。）



路。亚历山大东征将欧洲与印度河流域连成一体，古罗马时代的商人与水手又通过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将欧洲与南印度连接成一体，并续上从印度南海岸经过马六甲或从孟加拉湾经过缅甸到中国的路。

《魏书》称“益州永昌郡海道通大秦”。《后汉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有大秦王安敦的使者自日南徼外来献，《梁书》记载，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7年），有大秦商人秦纶来，他们走的都是海路。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古希腊人就见到从印度远来的孔雀，罗马

中国学者的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把重点放在西域。他们将丝绸之路分为东段、中段、西段。

东段起自长安，终于玉门关。这一段越陇山、渡黄河、过河西走廊。由于渡过黄河的地点不同，这一段前半部分又分为四条路汇入河西：

- (1)回中道：长安—→陇关—→六盘山—→在靖远地区渡河—→武威
- (2)陇关道：长安—→陇关—→在金城（今兰州）渡河—→武威
- (3)永靖道：长安—→陇关—→在永靖渡河—→西宁—→大斗拔谷—→武威
- (4)灵武路：长安—→陇关—→在灵武渡河—→武威

丝绸之路的东段过一山（陇山）一河（黄河），四条道之分的关键在何处渡过黄河。这四条道之间也有串行的时候，清嘉庆人洪亮吉《伊犁日记》中就记载了第五条串行之道。河西是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天然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南山（祁连山）北山（合黎山、龙首山等）之间最宽处200公里，其间丝绸之路由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城串起，道路单一。

中段指从敦煌到葱岭这一段经过的整个西域地区，道路在山脉、沙漠与戈壁、绿洲间穿行，共有南、中、北三道。

- (1)南道：阳关—→白龙堆沙漠南缘—→鄯善（楼兰）—→且末—→于阗（和田）—→葱岭
- (2)中道：玉门关—→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吐鲁番（高昌、交河古城）—→焉耆—→龟兹—→葱岭
- (3)北道：玉门关—→贺延碛沙漠北缘—→伊吾—→蒲类—→北庭（别什八里）—→轮台县—→在霍河过伊犁河—→碎叶城

宋元间乌姑孙、邛处机、耶律楚材等还走过一条更北的路线，它东出居庸关到和林，越杭爱山、阿尔泰山汇北道于别什八里（北庭）向西，人称草原路。

西段的路线更为复杂，东西南北，四通八达。中国学者对这一段的研究较为勉强，分为南中北三道。

南道：葱岭—→越兴都库什山—→伐济纳巴德（阿富汗）—→白沙瓦（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从印度河到阿拉伯湾接水路；

中道：大宛（费尔干纳）—→康国（撒马尔罕）—→昭武诸国—→安息（波斯）—→地中海（罗马）

北道：碎叶—→坦罗斯—→威海北—→渡亦克河（厄姆巴河）、得河（乌拉尔河）、阿得拉河（伏尔加河）—→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远征军一度占领了阿拉伯人得意的亚丁湾，罗马商人乘春季顺风驶过红海（厄立特里亚海），从亚丁湾进入阿拉伯海，赶在夏季到来之前到印度洋乘季风航行。他们绕过科摩林角，到达马六甲海峡，再向北航行到支那半岛甚至中国南海岸。为了财富，为了罗马餐桌上的香料和妇女身上透明轻柔、华彩亮丽的丝绸服装，商人们勇敢地穿越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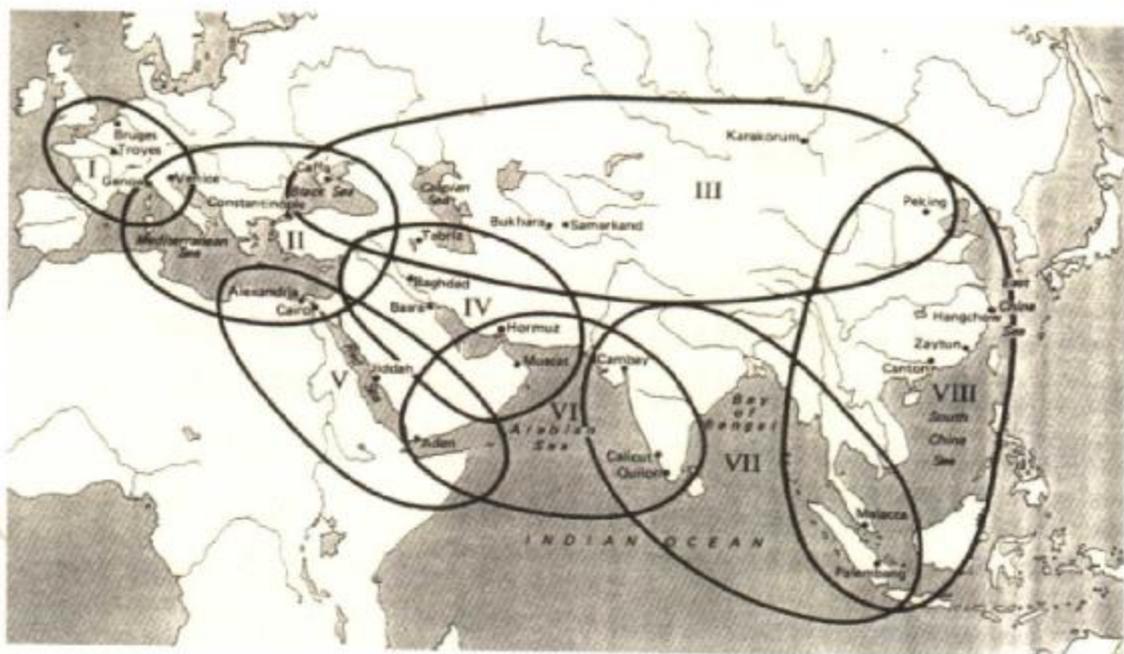
三条历史悠久的道路，贯穿起当时世界三大文明体和八个亚文明区域。13世纪的世界，如果按文明类型划分区域，至少可以有三大文明共同体：西方文明、中东文明、远东文明。每一大文明空间都具有某种语言、习俗、宗教、贸易与政治体制的共同性，但同一种文明类型中又有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中心边缘的结构，所以在三大文明区域中，又可以分出八大亚文明体系：

1. 当年查理曼帝国旧版图上拉丁基督教的西欧，以罗马、亚维农为宗教中心、巴黎为文化政治中心、威尼斯、热那亚为贸易中心、布鲁吉斯、根特为手工业中心，在文化、政治、经济上都相对一体化基督教文明；

2. 古罗马帝国旧版图上的地中海沿岸，这是个文化与贸易汇通的文明区域，以地中海为内湖，以威尼斯、热那亚、君士坦丁堡、苏达克、阿迦、亚历山大里亚为环星城市的区域，它在贸易上的共同性要远远大于文化上的共同性，是一个文化冲突贸易合作的边缘区域，渗入其他几大亚文明体系的边界；

3. 以伊拉克、波斯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核心地区，这个地区是前五百年世界最繁华的地区，有耶路撒冷、安条克、巴格达、大不里士、巴士拉、忽里模子等重要宗教、贸易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孔道；

4. 从亚历山大里亚直到亚丁港的红海沿岸地区，主要是海上贸易与交通的要道，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信仰共同的伊斯兰教，贸易品多为香料与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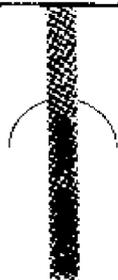
阿布·鲁格绘制的八大亚文明体系。

5. 从亚丁湾进入阿拉伯海区域，这个亚文明体系像地中海地区那样，贸易上的共同性大于文化上的同质性，这个地区的重要城市是一系列呈半月形的大商港，从亚丁、祖法儿、忽里模子、坎贝到卡里卡特、科钦、锡兰岛；

6. 整个印度次大陆直到印度尼西亚岛屿的广阔大陆与海域海岛，是一个在文化与经济上都具有相对共同性的亚文明体系，是传统的季风贸易区；

7. 从东南亚海域海岛到华北平原，是华夏文明区，半边内陆半边海洋，半边农耕半边贸易，在政治文化经济上也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是蒙古世纪里世界最富裕最先进的地区，与西欧处于旧世界最为遥远的对峙的两极；

8. 华夏文明的北方终点开始的草原文明从北京延伸到君士坦丁堡，是这八大亚文明体系中地域最为辽阔的与城市最为稀少的，在北京、哈刺和林、萨拉、撒马尔罕、布哈拉、大不里士、君士坦丁堡之



间，是无边无际的草原之路^①。

十 剩下的好时光不多了

蒙古帝国开放了旧世界，大旅行的时代里，去中国的欧洲人，有为上帝的事业去收获灵魂的，有为玛门的事业去收获财富的，还有纯粹“为了赢得某种灵魂的收获，越过海洋访问异端诸国”的旅行家。生活在大时代，水天辽阔一生，是历史肯给予个人的难得的幸运。

从1245年到1370年，很多欧洲人到了远东，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百多位有名有姓的西方人抵达中国。他们去经商、传教、或者可能纯粹是旅行，原野中的废墟与道路尽头的新城，晨光中的硝烟与暮色里的炊烟，送迎着那些挟着尘土与黄金的商人、背着行囊与圣经的传教士。丝绸之路、胡椒之路、象牙之路，契丹、印度，穿过荒芜的沙漠和同样荒芜的海洋，穿过无数危险也穿过死亡，商人、传教士、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们，被向往与渴望鼓励着，被旷野的风和风一样关于东方财富与基督徒的传说引领着上路，把钻石与香料、感伤的书信带回故乡，把尸骨抛在荒野，把一生的狂放冒险，变成一段虚幻的故事。

鄂多立克死于1331年，那时正是欧洲人去中国的高峰。因为剩下的好时光已经不多了。马黎诺里1345年离开中国，似乎预感到大汗皇朝的末日。短短的一百年间，最后的失望就取代了最初的希望。当年鲁布鲁克恳求大汗允许他留在东方传教，如今马黎诺里恳求大汗允许他们返回西方。大旅行的时代即将结束了，东方的福音事业令人绝望。

草原帝国的命运像一出疯狂的悲剧。高潮与衰落几乎是同时到来的。1260年，蒙古大将乞惕不花在巴勒斯坦遭遇埃及苏丹国马木鲁克

^① See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by Janet L. Abu-Lugh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1 "Studying a System in Formation".



王朝的部队。一贯所向披靡的乞惕不花战败被生擒，被杀前他说：“当我的死亡的消息传到旭烈兀汗的耳朵时，他的愤怒会像动荡的海洋似地沸腾起来。从阿塞拜疆到埃及的门户，所有的地方将受到蒙古马的践踏。”无奈这最后的豪言壮语变成破碎的空气，英雄的期望落空了。此后再也没有汗王的军队越过大马士革。汗王之间开始内战，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已顾不上征服世界，他们要先征服他们一同从草原杀出来的兄弟。如今，他们已变成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土、军队、臣民、宗教信仰的汗王，他们将按文明人的爱好与自己的兄弟作战。

庞大的蒙古帝国几乎在统一的时候就开始了分裂。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悲剧重演了。这么辽阔的土地上，不可能只有一个国王。世界帝国是野心构筑的神话。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位，征服在继续。以后出现在大汗王位上的两位继承者，不是能力不够，就是运气不好。贵由是个醉鬼，蒙哥有英雄气，但又短命。蒙哥在四川逝世，忽必烈继承大汗，他留在蒙古草原的弟弟阿里不哥首先发难。蒙古帝国破碎了，除忽必烈的元朝中国之外，高加索山分开了两个汗国，别尔哥的俄罗斯金帐汗国与旭烈兀的波斯伊儿汗国。战争在蒙古兄弟间进行。别尔哥与旭烈兀的部队在里海两岸厮杀，72岁的大汗忽必烈坐在四只大象驮载的木塔上，指挥讨伐乃颜的战斗，乃颜是他的堂兄弟，成吉思汗的侄孙。这些曾经穿兽皮、喝羊血的野蛮兄弟已经变了，他们首先是文明世界的中国天子、伊斯兰苏丹，然后才是草原血缘联系起来的兄弟。

蒙古帝国急速崩溃。辽阔的土地上不可能只有一个汗王。野蛮英雄一旦进入文明世界，就被同化了。他们像文明人那样和平，也像文明人那样战争。他们学会被征服的当地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仰与仪式，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观念，而不是牧场与羊群去流血。旭烈兀在巴格达屠杀哈里发和伊斯兰教民，已信奉真主安拉的金帐汗王别尔哥大动肝火。以后兄弟反目，这是一个重要原因。1295年，伊儿汗国



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合赞汗下令摧毁首都大不里士的佛寺佛塔，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的教堂。佛陀基督的塑像、画像被抬到街上，当众毁谤后，一把火烧了。热情高涨的群众呼叫着前去抢劫富有的异教徒的家。在马腊格，来自中国的景教宗主教马·雅伯拉哈三世，被吊在树上鞭挞，许多景教徒背叛了，景教僧侣们还了俗，或者念起《古兰经》。

蒙古帝国正在变成伊斯兰苏丹国、汗帝国。汗王正学会像苏丹、天子那样统治他的王国。蒙古征服初期，伊斯兰世界遭到毁灭性打击，蒙古和平的后期，在整个亚洲，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规模复兴。除了元朝与蒙古草原佛教化外，西亚、中亚整个蒙古汗国，都在13世纪后半叶迅速伊斯兰化了。这一次的伊斯兰大潮比公元七世纪更为深广。地中海曾经变成伊斯兰湖，而今印度洋也变成伊斯兰湖了。

蒙古帝国的分裂实际上是被亚洲大陆旧有文明格局分割的结果。那些穿着兽皮的草原上苍色的狼与惨白色的鹿的儿孙们，已经变成信奉佛教中国人或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阿拉伯人，过去划分汉天子与穆斯林苏丹的疆界，如今又在蒙古帝国内划分出相互攻战不下的汗国。文明传统像一个魔术般的模子，野蛮人征服了这些国家，继而又为这些国家的文明传统所征服。他们被重新塑造，堕落得懦弱、愚蠢、骄奢淫逸，像个无聊且无耻的文明人，很快连他们的勇猛粗犷的祖先与继续留在草原上的蒙古兄弟，也认不出他们了。这正是成吉思汗所担忧而且早已预料到的：“在我们之后，我们种族的人们将穿上镀金的衣服，食上既肥而又甜的肴馔，骑上良好的骏马，拥抱最美丽的女人，他们忘记对我们所应该的……”

不幸言中。朱元璋的汉军攻入北京时，妥欢帖睦尔皇帝仓皇出逃。他极度伤心，很快就死了。他把自己在人间最后的日子都浸泡在悲伤的泪水里：“我的岱都大城（北京——引者注）是各种颜色华丽装饰成的，上都是我的愉快的和清凉的夏季别墅，这些黄色的平原是我的列

祖们寻乐和休憩所在，我做了何种坏事以至丧失了我的帝国！”蒙古大汗正堕落成一个喋喋不休、多愁善感的老妇人，他的列祖会感到耻辱，不仅为了亡国，还因为他那种无能的哀诉。曾经是草原上的狼，苍天上的雄鹰……

大旅行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的第二次浪潮，也将结束了。这是个令人激动也令人遗憾的时代。孟德·高维奴作为教廷委任的第一任汗八里大主教，在中国传教二十五年。其间有科隆人阿诺德、佩鲁贾人安德鲁以及热拉尔、佩雷格兰等修士前往中国传教，安德鲁曾出任泉州主教。高维奴去世时，他身边已有三十多名修士。尼古拉大主教不知去向，马黎诺里1342年到达北京。1358年，又有4位芳济各会修士传教到中国。1370年，索邦神学院教授吉约姆·德·普拉托被教廷委任为汗八里大主教，自欧洲出发后便无音讯。1371年，姗姗来迟的教廷大使带着十多位修士，自海道抵达中国，他们发现自己来晚了。大汗已亡命草原，明朝洪武皇帝可能对他们讲：“元兴沙漠，入主中原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准右布衣，起义救民，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林，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赉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告。”^①

大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和平的中亚通道也被心胸狭窄、好战斗勇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狂暴地撕碎了。横穿欧亚大陆的时代一去不返。当姗姗来迟的第一位教廷大使带着十多位修士自海路抵达中国，西方人正陶醉于关于大汗无边的神话时，“南方蛮族”已收复了契丹旧地，并且痛心疾首地关上了国门。那一年，洪武皇帝朱元璋下诏，“片板不

^① 《明史》卷三二六《拂林传》。

得人海”。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高维奴、马黎诺里那几代人近一个世纪的传奇的经历，最后只留在几本半是虚构、半是纪实、半可信、半可疑的游记中。

去东方，收获灵魂，圣方济各会兄弟们一个世纪的努力，试图将福音植入中土，最后竟随江山易帜雨打风吹去。最后一位派往中国的“汗八里大主教”下落不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像，意大利画家本诺佐·格佐利（1421-1497）作。中世纪晚期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方济各会的修士。基督教入华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景教僧侣的功德，第二次主要是圣方济各会修士的努力，第三次则是耶稣会士“适应”式传教方式的成果。

明，而第一任大主教在汗八里盖的两座“壮丽的大教堂”，在历史中连遗迹都没有留下。三百年后利玛窦神父到来，这座都城叫北京，仍是福音的旷野。



第三次浪潮：耶稣会神父们的适应

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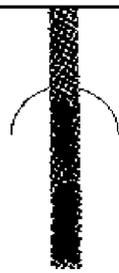
——《马可福音》

一 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

1541年春，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沙勿略，从里斯本的特茹河口出发，乘悬挂着葡萄牙王室旗帜的大帆船，去东方传教。

那年他35岁，也像《神曲》中的但丁，走到人生的中途。在每一个清醒的人的一生中，这一年，人生的中途，都很重要。从这一年开始，你就要对你一生的命运负责了。在此之前，你可以从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此后，你则要换到死的角度。因为只有墓碑才能解释生命，既然生命有限，死亡是注定的，什么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有价值、什么能使我们在这个熙熙攘攘的转瞬皆空的世界上，留下生活过、幸福与痛苦过的痕迹？从人生的中途就应该让死亡决定我们事业与生活的取舍。那年沙勿略开始了漫长的海上漂泊。他35岁，既然生命的归宿只有一点，那么天涯何处不是故乡？

海上航行，汪洋无边无际，无论是风暴还是宁静，都让人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那段日子里，与沙勿略同船前去果阿赴任的葡属印度



新总督马丁·阿丰索·德·苏萨，不断向他描绘印度传教的大好前景。沙勿略不知道东方天际这道彩虹是殉道的血光还是天使的翅膀。

船到果阿。上岸不久，身在其中的沙勿略就丝毫不敢乐观了。如果你在欧洲，你不可能了解东方。这里的一切都比想象得复杂。

印度人与印度这个国家既混乱又让人捉摸不透。下层百姓朝三暮四、利益所驱随便受洗又随便叛教。印度教时刻影响着他们神秘而又放荡的生活，伊斯兰教更是处处与基督徒为难。他们五花八门的民族语言难以掌握，玄奥的梵文又垄断在一小撮顽固的婆罗门手里，整个印度世界依旧沉浸在神秘莫测而又糜烂堕落的异教精神中。

更难以想象的是，连果阿的葡萄牙移民也显得愚昧无知。他们既不严格遵守基督教道德，又不认真自觉地传播福音；既不了解基督教，也不了解东方。他们注定不可能成为上帝的使者，能力与智力都有所欠缺。

在殖民者与本地人残酷的冲突中，沙勿略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收获灵魂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事业，需要献身的热情，也需要巧妙的方法。在东方，基督教面临的是几种比基督教更古老也更深邃的文化，它们的内聚力与排斥力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沙勿略在自己的布道辞中加入越来越多的当地土语，在捕鱼海岸，他将自己的教义问答手册翻译成泰米尔文。沙勿略开始探索一条东方化的、温和的传教方式。

1545年，沙勿略离开混乱的印度前往马六甲和香料群岛，此时他心情沉重。将近半个世纪的东方传教事业，成就微薄得可笑。金色的果阿将近五万居民中，只有七千基督徒，耶稣会士忘我地工作，每年至多也只有十几位动机难以说明的人在他们手中领洗。而这些人往往除了教名与服装像基督徒外，从里到外还是异教分子。在印度他们盖起了教堂、医院、学校，并从那里推进到香料群岛。然而，他们努力收效甚微，土人们若无其事地接受洗礼，目的是为了得到葡萄牙人的保护或某种物质优惠，而葡萄牙人的大炮火枪一响，所有的努力都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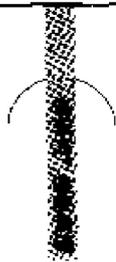
费了。东方人将信将疑的态度很快转化成敌意与仇恨，派去开拓新教区的传教士不断失踪在丛林里，或者被毒死在村落间。印度越来越黯淡，只有继续向东。在日本与中国，更统一或者说更有秩序的地方，或许有帮助。作为耶稣会东方巡视员的沙勿略去了香料群岛，在马六甲，他写信给果阿主教，请求增派更多的传教士来。

香料群岛的福音事业与印度一样昏暗。或许传教不是一种纯粹的灌输，而是精神对话，福音生长在“文明”的基础上。沙勿略对黑皮肤的东方人越来越失望。1549年春天，走马溪之役前后，沙勿略从爪哇去日本。在日本那些白皮肤的东方人中，他看到新的希望。然而，日本最终不过是个驿站，东方福音事业的关键还在中国。沙勿略发现，日本的偶像崇拜者总是“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要皈依日本人，必须先皈依他们迷信的中国人。

“中国在日本对面，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平稳定。葡萄牙商人告诉我，那里司法公正，人人平等，比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要优越。我在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见过中国人，我知道他们的肤色也是白的，像日本人那样，聪颖好学。在智识上中国人要高于日本人……就我在中国人中观察，他们那里居住着许多不同国家的人，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我所知，我猜想其中一定有犹太人、伊斯兰教徒。还没有什么证据能让我相信那里也有基督徒。”^①

1552年1月29日，沙勿略在印度科钦写信介绍他远东之行所获的中国信息。此时他刚从日本返回，为前往中国做准备。一直陷入传奇迷雾中的中华帝国正在清晰化，尽管这种清晰还不一定是真实准确的清晰，旧有的传奇正在新观察中获得细节的丰富。沙勿略知道：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政治统一，语言一致。而所有这些，都是传教

^①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Donald F. La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794.



的理想的条件。既然偶像崇拜的佛教能够漫延中国，为什么基督教的上帝不能给他忠心耿耿的使徒一个机会。先驱者永远是孤独走在前面的人，他们既像英雄，也像野兽。此时沙勿略的热情已经转移到更远的东方。沙勿略决定去中国冒险。他的现世时光已经不多了，生命的最后三年，他都在准备去中国。走进中国也就是进了天国。

传教与殉道的路都是漫长的。东方人民一时还听不懂他们许诺的像海风一样莫名其妙的福音。他们必须先了解东方，进入东方社会，生活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学会象白蚁那样工作。每向东一步，沙勿略都能感到一种更深邃的召唤。

1552年4月沙勿略最后一次告别果阿时，一心一意要去中国。他在写信给圣依纳爵^①：“我希望今年前往中国，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在中国又可以在日本为我主上帝作出很大的效劳。当日本人看到为中国人接受的上帝之教法时，他们便很快抛弃对自己教派的信仰。”

传播福音的激情让他一刻也不能等待。抵达马六甲后，马六甲的葡萄牙总督弗朗西斯科·阿尔瓦列斯百般阻挠他。或许他是好意，他知道此时任何人去中国都是危险的，凶多吉少。而且还会彻底破坏朱纨剿海后正在缓和的葡中贸易关系。恼怒的沙勿略通告教会，开除马六甲总督弗朗西斯科·阿尔瓦列斯和他那伙帮凶走卒的教籍，自己则租了一条破船驶向上川岛。他一厢情愿地相信：“为了拯救中国人，他的个人生命微不足道。”

沙勿略选了一个最阴暗的季节来到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上川岛是广州外洋的一个荒岛。1514年葡萄牙商人就来到这里，目前是一个贸易点，走马溪战役后，葡萄牙船流落这里。从马六甲租来的那条破船把沙勿略放到岛上就走了。当有位中国商人为200个金币答应把他偷

^① 西班牙纳瓦拉人(1491-1556)，耶稣会的创建者。

^② 转引自《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9页。

偷带到广州时，他清楚地知道，他随时都可能被扔进大海或某个不毛荒岛上，即使进了广州，也会被投入监狱。中国有许多禁令。沙勿略知道中国人不欢迎外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同胞在那里已堕落成杀人放火的强盗。

沙勿略患了热病，连续半个多月的高烧，使他越发真切地感受到，“灵魂的危险比身体的危险大得多”。

荒凉的上川岛，有滞留在那里的商船，来自马六甲的葡萄牙商人或来自北大年的中国商人。沙勿略每天去看望他们中不幸的病人，传播福音，寻找一切可能进入中国的机会。沙勿略在上川岛渡过他现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我们决定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至于我们此行的后果，我寄希望于我主上帝，他能增加我们的圣教信仰，无论敌人及其使者对我们的迫害有多大。因为一旦上帝支持我们，谁还能战胜我们呢？”^①他又一次病倒。在为一位升天的灵魂做完弥撒后，



沙勿略在上川岛的弥留之际。

^① 转引自《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9页。



人们发现他躺在海风肆虐的沙滩上。

1552年11月17日是个星期日，那天“幸福的沙勿略”身边只有一位新入教的中国基督徒。一周以来一直沉浸在昏迷的冥想与谵语妄言的祈祷中的沙勿略，在最后一阵痉挛爆发后，终于平息了，那双守望了多年的眼睛，在层层叠叠的碧波面前绝望地闭上了。海鸥凄厉地鸣叫，波涛拍击海岸。第三次将福音带入中国的人，上帝还没有选好。

二 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达·伽马对印度副王派来的使者说。此时，1489年5月22日，他毫不怀疑他期待已久的好运就在卡利卡特：香料找到了，还有圣多马传教的印度，有无数基督徒，甚至可能有长老约翰的国土。

去王宫拜见印度副王。五月底的南印度已经很热，他丝毫感觉不到欧洲式的紧身衣裤与宽大斗篷的难受。印度教的寺庙很快引起他的注意，会卡斯提利亚语的摩尔人告诉他，女神叫Mari Amma，他听成圣母玛丽亚。Mari Amma，圣母玛丽亚，这是印度的天主教堂。另一个发现，愿望突然间又变成现实；或者说，愿望取代了现实。

远航不仅是为了香料，还有基督教。15世纪最后的十年里，哥伦布向西，达·伽马向东，他们史诗般航行的动力，都是从十字军时代继承下来的关于财富与信仰的理想。他们是香料十字军，走运的堂吉珂德。

伊比利亚时代的欧洲扩张中，宗教热情丝毫不亚于世俗的热情。传教士与商人、水手、冒险家乘坐同一条船出发，却比他们拥有更坚毅、更强大的精神信念。广阔的东方，如果有基督徒，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如果没有，就要让那些埋没异教黑暗中的生灵变成基督徒。1498年，三一会教士彼得罗·德·科维汉在卡利卡特与达·伽马一同

登岸，还有八名神甫和八名圣方济各会修士。

最初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那些旅行家夸夸其谈的东方故事会在中世纪尽头的岁月里，焕发出强大的激情与创造力。15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从特茹河口，从帕洛斯港，每年春天启航的船队，都寄寓着伊比利亚半岛甚至整个欧洲的欲望与幻想。朝霞、落日、远去的帆影、漫山遍野的鲜花、大海深处、高山深处、苍天深处，都有神秘诱人的传说，关于天堂与地狱，关于



达·伽马。

于恐怖与希望，关于所有未知的地方。寻找传奇般大汗的国土，寻找长老约翰与圣多默的圣徒，哥伦布向西；达·伽马向东，他们史诗般行进的动力，是从十字军时代继承下来的关于财富与信仰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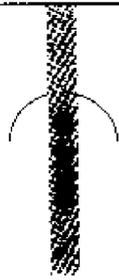
早期欧洲扩张具有明显的十字军特征。那些葡萄牙、西班牙的冒险家既象圣徒又象魔鬼。阿布克尔克占领马六甲，急忙派使节前去罗马朝见教皇，献给教皇的东方礼品和一头大象使觐见仪式具有诱人的异国情调，那头大象在印度人奇妙的口令下向教皇下跪！葡萄牙国王被赋予“保教权”。欧洲国家的教士纷纷来到里斯本，准备搭乘每年奏请启航的葡萄牙船前往东方，1512年，方济各会令修士在柯钦建起了印度第一座基督教堂，果阿则成为基督教东方传教的中心。每年都有从欧洲运来的教士在这里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奔赴亚洲各地。在伊比利亚扩张历史上，教会与殖民政府始终是紧密结合的。传教是征服与殖民的手段。

东方传教的时代与东方贸易的时代一同到来。15个世纪以前基督精神顺着西奈山向东西两坡传播：向西，在圣保罗之后，已经建立了一个个虔诚、狂热的基督教王国；而向东，就象溪水流入沙漠。16世纪不仅将一个无限广阔的东方世界展现在欧洲面前，也把一个无限广阔的异教世界展现在基督教面前。此时，从教皇、国王到修士、冒险家，似乎都感到一个使徒保罗的时代再次降临了，它将成就许多伟大的殉教者，也会使那些东方帝国，莫卧尔王朝、中华帝国、日本，像13个世纪之前的罗马，在无数次流血与迫害之后，终于皈依基督教。

最初的传教事业陶醉在一种浪漫无知的乐观中。他们相信从海岸深入亚洲内陆，将会出现许多前所不知的基督教王国、密密匝匝的圣多马基督教信徒。他们将像圣徒一样欢迎这些来自真理与爱的故乡的人们。兴奋不已的传教士在印度南部海岸为那些稀里糊涂的下层百姓施洗礼，送他们礼物、修建教堂与医院，在捕鱼海岸一次皈依了上千名土人，广阔的印度将成为15世纪以前的罗马。此时的果阿已建起了主教教堂与圣信学院，东西方的修士在这里接受传教训练。1582年，利玛窦神父离开这里前往中国时，圣信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一份演讲稿要翻译成16种语言。牺牲与希望同时激励着那些狂热而虔诚的信徒，他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他们的教堂将盖在东方三大君主的王宫



果阿的主
教教堂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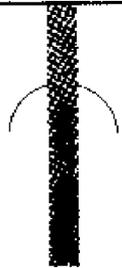
里，为阿格拉的大莫卧尔王阿克巴尔、为丰臣秀吉和中国北京的万历皇帝施行洗礼。

然而，事实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乐观。东方有那么多游荡在“异教黑暗”中的生灵，而每年从里斯本、塞维利亚绕着地球前来的西方人不过一两千，像几粒石子撒在漫长海岸的沙滩上。更何况这些人中，许多是财迷心窍的骗子、负债累累的赌徒、想入非非的冒险家、囚犯、游手好闲的泼皮无赖。他们既不能理解福音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东方。他们盲目浅薄、偏激冲动。他们寻找基督徒的动机很可能是为了世俗利益或政治同盟。

葡萄牙舰队出现在东方海岸才半个世纪，就把这里的一切都搅得乌七八糟。神秘的印度变得越来越危险，那些木讷冥思的东方人，随时都可能在阴谋的挑唆或残酷的压迫下变成野蛮的杀手。从东非海岸到香料群岛，敌意在漫延，不断有一些可怕的事件，成全那些敢于深入陌生的东方并干预他们生活的传教士的殉教志向。惨烈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让东方基督教的绿洲果阿也不时感到恐慌。为什么幸福的施舍者反面受谋害？这是殉教的牺牲本身所无法解释的。任何强迫都是痛苦，强迫的幸福也是痛苦。东方人听不懂那种更为亲切也更为世俗的神祇，谁能强迫他们？更何况这些传教士都是从炮舰上走下来，时常跟海盗们凑在一起，明明白白的杀人纵火犯的同乡。谁会相信他们？最初的传教士中，也有不少人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抱怨那些世俗冒险家或暴徒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可是，传教士们又离不开他们，只有这些可怕的家伙，才能把福音使者带到东方。圣徒坐在魔鬼的船上。

那个时代的传教士，大多是狂热而危险的堂吉诃德，他们有虔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与坚韧的毅力，但他们缺乏理性，他们既不了解他们自己，也不了解对象与环境。

福音进入东方并不是进入一片精神旷野，东方所有的神祇与智慧都会考验这个狂悖的闯入者，并在必要的时候将它排斥出去。《吠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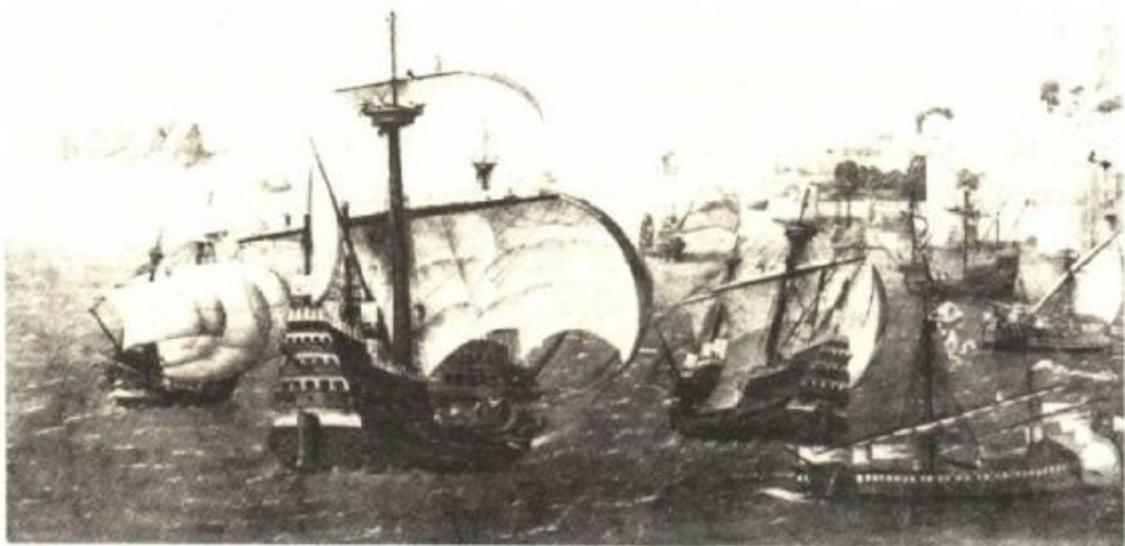
是深奥的，佛法也是深奥的，更何况那些深植在东方风土中的花妖木魅、神神鬼鬼？

东方人即使接受洗礼，信了教，也是靠不住的。一则他们很可能动机不纯，为了一些俗世利益，如捕鱼种田、贸易航海可以减税，他们勉强让那些神父们为他们举行那种不可思议的泼水仪式(洗礼)，过后就若无其事了。他们依旧过着“东方式的糜烂”的生活，“不知羞耻”地朝拜某些动物或某个传说得神乎其神的圣地，毫无顾忌地庆祝异教节日、发疯般地跳那些淫荡得不堪入目的舞蹈，没日没夜地赌博。

传教士无可奈何。说教没有作用的时候，传教士就借助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武力，上帝的暴力经常如此卑劣而残酷，葡萄牙士兵在传教士的带领下摧毁清真寺，屠杀印度教崇拜的神牛，往天真的村落里的饮用水中放毒。印度人发现这些远来的西方人都是些恶作剧的魔术师，可以一会儿让你流泪，一会儿让你流血。残暴引起的更大的敌意，冲突与破坏接连不断，葡萄牙人的稻田一夜之间被灌满了海水，传教士被吊死在茂密的丛林里。他们面对着一个广袤而不可捉摸的东方，那里敌意象野草一样疯长。

三 将财富运回家乡，将福音送到世界

沙勿略去了中国。先驱者的身后，聚集着越来越多的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告别自己的家园、亲友，准备在遥远的、荒蛮的、充满敌意的异教世界孤独地传教，他们将在自我流放中过早地衰老、死去，他们生命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寻找一次壮烈殉教的机会。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勇敢与坚毅、狂热的冲动与持久的信念、偏激与仁慈汇成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或许时间已使他们的事业变得荒唐可笑，甚至是某种无谓的罪恶。但不管怎样，他们的人格是可敬的、崇高的，是理想化的英雄典范。人类生命真正的活力与创造力也就体现在这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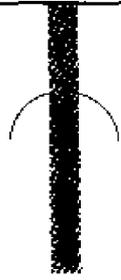
16世纪初横行印度洋的葡萄牙舰队。1521年的绘画作品。

切伟大的事业，也就完成在这里。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主导的伊比利亚扩张，开启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也启动了古老的基督教新一轮的普世基督教化运动。“旧的葡萄牙殖民帝国，基本是控制海洋、从事海上活动的商业帝国，不论它主要是与东方的香料、西非的奴隶，还是巴西的糖、烟草和黄金有关。然而，这一海上帝国具有军事的和基督教的特色。”^①

从特茹河口驶入大洋的每一艘船上，都架着大炮，挂着十字军旗。航海冒险的意义在于将异教世界的财富运回基督教家乡，再将基督教送到异教世界。基督徒获得牛排上的胡椒与钱袋里的金币，异教徒则获得头脑中的光明。为了上帝与国王，达·伽马告诉古里王他是来寻找基督徒与香料的，并把印度教的寺庙错认为圣托马斯的信徒修建的基督教堂。哥伦布寻找新航路前往大汗的国土，是为了黄金，也为了

^① 《现代世界体系》，(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卷，第4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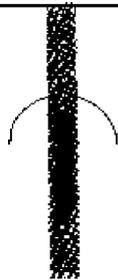
充足的黄金可以组织十字军东征。晚年失意的哥伦布，的确在组织一次十字军，准备东征耶路撒冷。从鲁布鲁克、马可·波罗到佩罗·达·科维良、阿方索·德·派瓦，^①从亨利王子到第奥古·达·伽马，都试图在东方找到长老约翰的国土，与东方的基督徒联盟对付伊斯兰教。

对于伊比利亚人来说，过去一段历史上十字军东征还不是去占领耶路撒冷，而是收复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驱逐伊斯兰教徒摩尔人。伊比利亚人历时二百多年之久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使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更正统、传教精神更狂热。在许多葡萄牙人心中，从尊贵的国王到囚犯水手，航海是以上帝名义发动的神圣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欧洲的扩张始于公元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不过是其转换方向的继续。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扩张已使地中海方向的东征根本不可能。绕道大西洋寻找长老约翰的国家夹攻穆斯林世界，收复圣地，就成了迫不得已的出路。不料竟因祸得福，十字军失去了地中海，却获得了世界大洋。

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思想与狂热的扩张精神。“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基督教传教事业早在保罗时代就奠定了。罗马帝国的迫害、蛮族入侵、伊斯兰教扩张，不断的压制不是消灭了这种传教狂热，而是使它越发强烈。

第一个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欧洲蛮族世界基本上基督教化了。第二个千禧年开始，传教的矛头指向东方，当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走向东方时，意大利中部小城的圣方济各创立了圣方济各修会（1209年）。圣方济各修会对基督教的革命主要体现在复兴早期基督教的纯洁性与传教精神。那些带有骑士精神的刻苦的修士，不仅要还将基督教还给穷人，还要将基督教传给异教徒。

^① 1487年与狄亚斯同时受命走陆路寻找印度通道，派瓦得热病死于开罗，科维良终老埃塞俄比亚，三十年后葡萄牙使者在阿比西尼亚王宫见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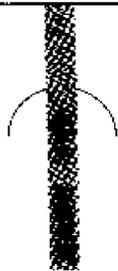


圣方济各准备孤身前往尼罗河畔的达米埃塔，劝说城里的苏丹改信基督教。蒙古人打通亚欧大陆，到远东的著名旅行家中，除了马可·波罗外，几乎都是圣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孟德·高维奴、鄂多立克他们到世界各地去，试图将福音传达给每一个人，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信息，带回基督教家乡。他们都有游记、书信或异国史志传世。除了《马可·波罗游记》和马里诺·萨努托的《艰苦的行程》外，“中世纪最后三百年所有关于基督教信徒扩张主义的地理文学大作全出自圣方济各会修士们的笔下”。^①

圣方济各会修士们的著作为中世纪晚期欧洲宗教与世俗的扩张武装了思想。13世纪末西班牙佚名方济各会修士的《了解世界上所有王国、领地和封地志》是一部以知识为基础的地理小说，它基本上准确地预言到葡萄牙发现世界的前景。方济各会修士加泰隆尼亚人拉伊蒙多·卢略（1234—1314年）一再著述主张攻打休达，环绕非洲航行到印度。人称他为“受神启的博士”。同时代的另一位方济各会修士若尔达诺·德塞在《奇观》一书中断言：只要一支小规模基督徒舰队进入印度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这片海域与沿岸地区。

传教不只是教会的事，它还必须借助世俗的势力。那些走向世界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既是商人、士兵，又是传教士、水手。当传教热情与世俗精神合为一体，宗教扩张与政治扩张统一行动时，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就到来了。《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不久，1307至1321年间，另一位威尼斯人马里尼·萨努托呼吁所有的基督徒，国王与商人，教士与士兵，团结起强大的十字军东征，打败穆斯林，将基督徒的舰队开到东方，控制印度洋。那将是基督教西方收获的季节：大量的黄金、香料、宝石、丝绸，大量的土地和那些土地上大量的异教徒的灵

^① 《葡萄牙的发现》，（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著，“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出版，第二卷，第103页。



魂。他将自己的扩张思想写成书《艰苦的行程》，一一寄给教皇和显赫的主教们，寄给那些国王。亨利王子在萨格里什组织航海的那些年里，这些著作都是他的精神食粮。

圣方济各会修士们武装了伊比利亚扩张的知识与信仰。而在伊比利亚扩张中真正在东方发挥福音的能量的，却是耶稣会的神父们。1534年，依纳爵·德·罗耀拉在巴黎蒙特马特山上与他的六位朋友宣誓：他们要远征耶路撒冷，象狂风那样扫清这个世界上的异教败絮。三年以后，他们没有去耶路撒冷，而是到了罗马，闷闷不乐的教皇保罗三世听到这批狂徒的消息后大为惊喜，他正为自以为是的路德信徒困扰得心烦意乱，在这几位青年身上，他看到十字军的热情与勇气。1540年，他们组织的耶稣会在教皇训令下成立。教皇是牧人，国王是狗，百姓是一群无知的羊，异教徒则是被魔鬼抓走的可怜虫。而耶稣会士，他们是教皇麾下最后的骑士。

1540年，耶稣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罗耀拉还在罗马等待教皇的最后训令，他的同乡，与他一同在巴黎蒙特马特山上发誓要去远征耶路撒冷的弗朗西斯·沙勿略，此时已到达里斯本，候船去东方传教。在西方，耶稣会一系列丧心病狂的宗教审判、愚蠢的暗杀与颠覆活动，很快使他们臭名昭著；而在东方，耶稣会士温和勤勉、带有浓厚理想主义与感伤主义色彩的传教活动，却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赢得了不朽的荣光。他们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宗教虔诚同时带到东方，在马六甲丛林、大阿克巴尔的莫卧儿王宫与北京的紫禁城，耶稣会士的博学与虔诚为东西方架设起一座梦游的桥梁。

所有这些成就，都应该感谢他们的先驱——“幸福的沙勿略”。在印度传教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带着福音去中国。孟德·高维奴的事业重新续起。

虔诚是必要的，勇气与信仰在任何时候都能创造奇迹。跟随沙勿略，越来越多的耶稣会士来到东方，他们很快就成为东方传教的主力。



沙勿略殉教的消息，三年以后才传到罗马。此时，克路士正在柬埔寨传教，准备去广州。1563年，三名耶稣会士陪着一支葡萄牙使团从果阿前往北京，被中国当局阴止在澳门。使团返回不久，两名耶稣会士：方济各·佩瑞斯与伊曼努尔·德克萨拉潜入广州，被当局发现后请求居留。广州布政司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教上帝之道的夫子。布政司又问他们会说中国话吗？他们说不会。那就很遗憾了。不会说中国话，“带着通事怎么向中国人宣教。”修士无言以对。

澳门为传教士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的立足点。神父们想方设法地从那里出发，又垂头丧气地回到那里。倒霉的巴瑞托在澳门恶言恶语地向耶稣会总部抱怨：“如果欧洲的王公们能够停止他们之间那些无聊的争吵，发动整个基督教王国，一定能迫使中国当局接受传教，让中国老百姓倾听福音，大批皈依，因为我们的道德与宗教对他们都是有益的。”^①这是一时恼怒下的胡说八道，他也知道。平静下来的时候，他还是温和派，他主张教皇派一个正式使团去北京觐见中国皇帝，请他恩准公开传教。而就传教士来说，他们必须学会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善于与中国的知识阶层打交道。巴瑞托不久在捕鱼海岸殉教，没有机会实践他的中国教务计划。

沙勿略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福音事业都没有什么进展。罗马教廷中已经有人对葡萄牙人的“保教”使命表示怀疑。1567年，西班牙耶稣会士J. B. 李贝拉来到澳门，几次越境企图失败之后，这位恼羞成怒的西班牙神父得出一个结论：福音只有用武力带入中国。三年后他被召回欧洲，四处奔赴宣传武力征服中国，很少有人响应。欧洲还没有精神准备，马可·波罗以来不断丰富中国神话使他们无法想像去征服一个强大的东方帝国。

最有希望的事业也是最艰难的事业。失望的情绪慢慢抑制了他们

^①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1, P297.



最初的兴奋，有人说，“不管使用不使用武力，进入中国都比登天还难。”沙勿略死后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福音依旧没有一点生机。此刻他们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撤出澳门，去亚洲的其他地方发展他们的福音事业；二、武力进犯，以世俗的暴力的方式获得传教的自由；三、寻找一种温和的新途径，设法博得中国知识阶层与上流社会的信任与好感，争取传教的机会。16世纪已经剩下最后四分之一，沙勿略真正的继承人还没有降临。

“我们决定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可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1577年，耶稣会东方巡视使范礼安神父来到澳门。在莫桑比克，他曾遇到过李贝拉神父，后者警告他：不要妄想中国。

四 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

“岩石呀，岩石，你何时打开，岩石呀？”那一天，范礼安神父站在澳门学院的窗前，望着茫茫苍苍的中国大陆，深有感慨地呼吁。^①在莫桑比克，范礼安神父遇到李贝拉，后者警告他：不要妄想中国。可到澳门后，他发现事实本来并不那么令人悲观，只是让头脑简单的伊比利亚人搞糟了。

伊比利亚人的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热情都会危害福音事业，他们缺乏耐心与方法，他们的胡作非为几乎使爱的福音变成魔鬼的面具或海妖的歌声。范礼安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东方国家，在中国传教可能使用的方法，不仅应该有别于基督教历史上所使用过的传教方法，而且与他们目前在亚洲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因为这一次，基督教面对的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传教将变成一种文化对话。基督教面临挑战，他们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归化中国，而是如何让中国

^① 《大中国志》，（葡）曾德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先接纳他们。

只有先“中国化”，然后才能使中国基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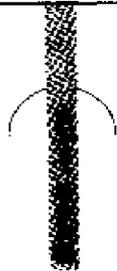
范礼安神父很快就发现伊比利亚的堂吉诃德们的危险性。范礼安来自意大利，或许他认为，只有意大利人，才能够理



范礼安神父像（1601）。

解中国，进入中国。他们与中国人一样，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后代，从古罗马时代继承的胸襟与气度能使他们相互理解，更何况他们的祖先曾有过多次交往，从安敦皇帝的时代到马可·波罗。范礼安有意识地请一些意大利籍的神父到中国传教，罗明坚、巴济范、利玛窦，最初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都是他的同乡。他们在信仰与人生使命上是上帝的使者，传教士，但在学识与文化修养上，却是地道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生长在文艺复兴的摇篮，欧洲中国神话的发源地，他们有另一种开放与浪漫，是伊比利亚乡村绅士或萨格里什水手想不到的。他们去中国，准备以中国的方式出现在那里，他们意识到自己将投入一种渊深博大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与涵化，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既是他们的成就与幸福，又导致他们的灾难。

或许因为他们是马可·波罗的后代，或许他们来自文艺复兴的故乡，或许他们有真正的人文主义涵养，他们更懂得中国的价值与文化的意义。如果不仅是为了香料，整个东方都没有比中华帝国更重要的地方。范礼安神父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论中国的奇迹》。从战乱野蛮的印度与东印度群岛来到中国，中华帝国的富足与和平，不管是亲



眼目睹还是道听途说，都令他印象深刻：

“中国可说是与东方其他王国都不一样，但它还要超过它们；这是整个东方最重要、最丰富的事物，它在若干方面，例如富饶、完善方面，都非常与欧洲相似，在许多地方犹有过之。”

他列举了中国的七大奇迹：

一、中国土地辽阔，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帝国，为抵御鞑靼人而建立在北方的长城令人难以置信。

二、中国人口众多。至少有六千万纳税丁口，150多个府，150多个州、1120多个县，不可思议。（葡萄牙人中谣传中国母亲每个月都要生孩子，一胎可以生五个）。

三、中国国强民富。食物“无穷无尽”，而且极其便宜。

四、中国物产丰富，处处可见贵金属与奇珍异宝，中国皇帝的岁入超过欧洲所有的国王和领主。

五、中国山川壮丽、城镇繁荣，真是“奇迹一般”。

六、中国人最为勤劳，那里没有一寸土地落荒，没有一个人不自食其力，无论城市与乡村都见不到乞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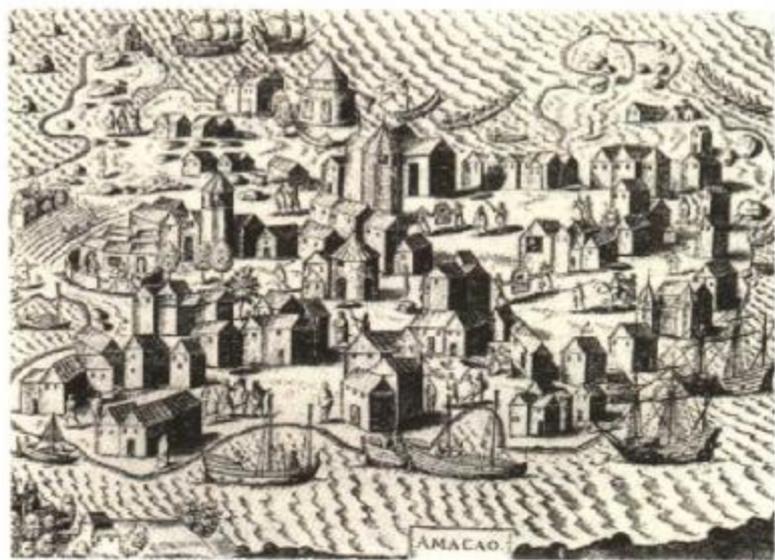
七、最后，“在已发现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和平、治理得最好的国家，这尤其使人惊奇，是因为那些异教徒并没有神圣真理的光芒教导他们如何治理的真正办法”。^①

只有用中国的方式才能进入中国。范礼安神父在沙勿略之后开始巡视东方的时候，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正面临着考验。印度显然已经希望渺茫了，大莫卧儿王阿克巴尔听不懂基督教玄乎其玄的教理与虚无飘渺的福音，尤其无法接受一夫一妻制。没有耐心的耶稣会士失望地回到果阿。中国的大门紧闭着，北京仍很遥远。

^① 参见《利马窦神父传》，（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5—67页。

东方是一片神秘的沼泽。当年由《圣经》、十字军传说与《马可·波罗游记》之类的旅行故事培养起来的探险家，谁也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广阔、如此深邃。那个看上去混乱昏庸、神志恍惚的印度，曾出现过玄奥的《吠陀》，这已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基督教文明是一种自恋自大的文明，更没想到的是，当他们深入东方时，却遇到了一个比他们更加自恋自大的华夏文明，那里竟对神圣的福音不屑一顾，不可思议的事太多了。传教士的身上除了对上帝的信仰外，还有欧洲式的自命不凡，这种感觉正面临着考验，因为他们发现，中华帝国还不是病态无知的自大，这种奇特的文明中的确有某种伟大的东西，至少从外观上是这样，他们出色的德行、开明的政治与对知识的崇拜，都使人想起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的图景。这是一次比地理大发现更重要更深入的文化大发现。

“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越是拒绝就越是神秘，就越有吸引力。此时，在那些虔诚勇敢、志在高远的传教士的心目中，异想天开的中国传教事业朦胧之中已具有了双重意义，将神圣的天国福音从西方带到中国，再将世俗的理想国福音从中国带回西方。这是一项真正的理



欧洲最早的澳门全景图(1598)。



想事业。

1577年10月，耶稣会东方巡视使范礼安神父来到澳门，重新继起沙勿略的事业。1579年7月，他前往日本巡视教务时，留下一封信给两月以后到达澳门的罗明坚神父，让他抓紧时间学习汉语。

中国是可以进入的，但必须以中国人的方式。

五年以后，1582年底，精通汉语的罗明坚神父，终于接到广州制台慷慨的许可，“在肇庆建堂久住”。他们喜出望外，迈出这一步几乎是个奇迹，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们曾竭力猜测制台抱着什么目的，才作出这样万难的叫我们喜出望外的事情（指这样接待他们——原注）。……我们认为说得过去的理由有：一、他在第一次接见就对罗明坚神父有好感，……除了一座铁制自鸣钟外，罗明坚还送给他几具沙漏计和若干眼镜，却看见神父……并不接受回仪：银两或其他都不要。……特别是神父在禀帖中说，既以待奉上帝和学习各种科学为业，他在国内即已知道中国人多么善良、性情温顺、爱好和平，许多礼仪和风俗习惯都优异于人，还实行许多种科学，又有大量合情合理的书籍以及正当生活的深渊（原文如此！——原注），因而他早想前来学习它，来通过生活在这样优秀的民族中间认识中国的伟大。这就是他为什么离开本国，不惜花上三年的工夫，远渡重洋，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中国的动机；不过，鉴于在澳门不可能达到此目的，他请示允许留在内地，生于此，死于此。这样，制台仿佛认为这种申请对于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常体面，接受这样的人，把他们从野人、禽兽一般变文明、讲理性，是一大善举；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葡萄牙人，认为他们野蛮、没有教育，不懂礼貌礼仪。……第二个理由（促使制台接受我们的）……是看见其他官员接待我们都非常体面，虽然他们并不习惯与外国人交往，……除非是非常小心戒备而且在公开场合。……三、制台的主簿特别客气，例如在允许利玛窦来的问题上，他回答时……口气表明澳

门所有的神父也可以批准……”^①

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巴范济在广州过了中国的第一个圣诞节。新年到来的时候，他们启程去肇庆。“愿中国的基督保佑”。他们剃光发须，穿上中国僧侣的长袍，一切都努力象中国人那样，罗明坚用怪声怪调的汉语对肇庆知府说：“我们是僧人，事奉天帝。来自天竺国，航海九年，向慕中国政治昌明，愿得一块清净土，建屋造堂，不问澳门商务，终生事奉天帝。彼等自有劝慕之钱，丝毫不会麻烦府台，敢祈府台允如所请，彼等将终生感恩戴德。”^②

这一次，远游的福音是否能够落户中国？

如果说圣托马斯从印度乘中国船到汗八里传教纯粹是异想天开。^③至少阿罗本神甫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将景教传入中国。唐武宗禁教，在中国昌兴二百年的景教竟突然绝迹。北宋年间曾到中国旅行传教的纳奇兰的景教徒回到巴格达哀叹，全中国只有他一个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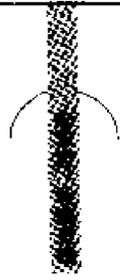


1586年威尼斯出版的传教士书简中的罗明坚神父寄自中国的书信。

① 《利玛窦神父传》，裴化行著，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1—82页。

②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③ 印度圣·托马基督教徒传说圣托马斯曾乘中国船到中国在一个名叫Camballe的小城登陆传教。这个传说不论是年代还是地理都对不上号。



这是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1294年，罗马天主教修士孟德·高维奴到北京传教，他发现“中国这些地区从未来过任何一个使徒或使徒的弟子。”元代天主教在北京、泉州等地都有主教堂，景教的活动就更为广泛，1368年元朝灭亡，这些教徒教士又跟着蒙古人亡命塞外或回返原籍。教皇此后半个世纪间派往中国的教士都下落不明。这是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1555年，也是二百年后，耶稣会士巴瑞托在澳门写道：“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罗明坚、巴范济神父在肇庆建堂，这是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次的命运将怎样？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在一个具有深远文化传统的民族面前，它将再次经受考验。背井离乡的传教士们可能领受到从大马士革到罗马的路上使徒保罗的崇高感，但是否能享有他后世的辉煌？奇迹是否能在历史中重现？罗明坚、利玛窦之后，许多杰出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龙华民、艾儒略、庞迪民、金民阁、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卜弥格、白晋、张诚、傅圣泽、戴进贤、郎世宁。传教点从肇庆、韶州发展到南昌、南京、北京……南明皇室逃到华南的时候，一次就有五十多名皇室成员领洗，满清入主中国后，汤若望、南怀仁又受宠于顺治、康熙皇帝，他们用他们的知识与德行创造了中西交流的一段蜜月神话，然而他们的贡献不可低估也不可夸大。就中国而言，他们对中国文化究竟有过什么影响或多大影响？他们那一心向化、顺势亲善的态度是进一步滋长了中国的自大狂症，还是让中国人懂得向别人学习的道理？对西方而言，靠美德的光彩、中国化的知行方式与西洋科技吸引中国，以隐喻的方式传播福音，是否能够真正感化中国、皈依中国？或许这种中国化的方式本身已削弱了基督教文化自身的冲击力？因此，当“礼仪之争”最终爆发，雍正百年禁教的时候，耶稣会士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能留下什么痕迹？

这片土壤，是否适应于福音生长？

五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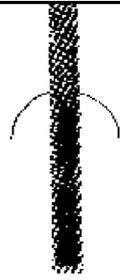
罗明坚一到肇庆，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尚在澳门的利玛窦，让他开春就携带年前从果阿带来的自鸣钟，前往广州给主簿大人拜寿。利玛窦正兴冲冲地准备出发，罗明坚、巴范济却灰溜溜地回到澳门。肇庆的官员调动，他们被赶出来了。

中国的官吏实在重要。决定一切的是人，而不是制度。什么是中国方式？最后还是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布施来的钱财使一个中国官吏为上帝打开了福音进入中国的大门。

罗明坚与利玛窦带着自鸣钟之类的礼物再次回到肇庆，是1583年10月。两年以后，肇庆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这个完全佛教化的名字是肇庆知府王泮送给他们的，他还送了一幅匾额让他们挂在中堂：题为“西来净土”。



利玛窦神父像（16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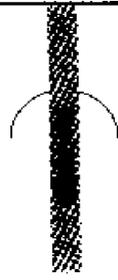


耶稣会士变成了“大西洋和尚”，他们穿起中国服装，带上自鸣钟、地球仪、三棱镜，给中国的官员、皇帝送礼。他们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读过四书五经。他们先剃光须发、把自己装扮成和尚，后来发现僧人的地位并不高尚，又蓄留须发，戴起儒士的方巾。对中国人说，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因为仰慕中国文化的光辉。他们给中国人介绍西方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帮助中国人制造科学仪器与火炮，结交中国的显官名士。他们学会中国的忍耐、平和、客套，在官员面前一动不动地下跪，在迫害与灾难面前不动声色。所有这些中国化的方式都是为了进入中国，将基督教传入中国。

偌大中国，郁郁千年文明，没有丝毫圣教福音荡涤过的痕迹。利玛窦发现，这里的山山水水，神神鬼鬼，都陷入异教的混浊中。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这句话在中国的真正的意义是让人无法想像的：一、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兼信三教，他们即尊孔祭祖，又炼丹修真、烧香拜佛；二、儒、释、道三教都兼有其他教宗的内容、仪式，一所寺院里，可能同时拜着师翁与菩萨。似乎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不可思议。

什么都信就可能什么都不信。这是宽容也是不真诚。传教士们在中国找不到那种狂热的虔诚的信徒，他们以为这是中国向福音开放的机会，可实际上，不会对异教虔诚的人同样也不会对基督教虔诚，中国人的性格中缺乏这些燃烧点。他们不习惯基督徒那种信仰、歇斯底里症。然而，他们的不诚信并不是因为成熟的理性，他们民族的教师孔夫子教导他们不信怪力乱神。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出现稀奇古怪的念头，狐仙毛怪、山妖水鬼，经常访问那些做恶的人或不幸的人，法术可以点石成金，炼丹可以使人长寿，念咒可以催人于难，无奇不有。什么都不信的也可能什么都信。

中国人见多识广的神态与他们的孤陋寡闻同样令人吃惊；他们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地傲慢，对于外来的东西，他们表现出来的冷漠与好



奇都难以置信，传教士们害怕他们那些漠然而又有些不屑的眼神；更害怕那许多因好奇而放大的瞳孔，那里隐藏着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危险。什么事都会发生，他们对此坚信不疑。越深入中国，他们就越深切地感受到那无可名状的威胁，因为他们渐渐明白了他们自己在中国人中的形象，一种危险的形象。

1583年夏天开始，利玛窦与罗明坚在肇庆传教。他们剃去须发，把自己扮成和尚。可仙花寺、“西来净土”并无法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长身高鼻、猫睛鹰嘴”，加上时时冒出的卷发赤须，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卖他们。肇庆是个内陆城市，听到过一些关于“佛郎机”人谣传，他们不仅剽劫行旅，而且掠食小儿。他们的水怪形象，早被那些先他们到中国海岸杀人放火的海盗商人涂抹得乱七八糟。谁也不能低估谣传的力量。仙花寺落成不久，就有不满的百姓往里扔石头。可怕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教士的仆人抓住一个向教堂扔石头的小儿，周围的百姓沸腾了。他们哭天抢地，他们的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要求官府惩治这些无恶不作的洋鬼子。利玛窦不理解，中国百姓为什么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动。

这是利玛窦进入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险情。他们小心翼翼，以各种小技巧讨好中国官员与百姓，但可怕的事情依旧不可避免地发生。他们一定以为是西方的魔鬼尾随到东方来操纵中国人与他们做对。不久官司再次出现，广州的一批有声望的老士绅状告他们是佛郎机奸细，他们将给帝国造成无法估量的危险，一方面刺探中国情报，另一方面教唆中国安份守己的百姓想入非非，像他们那些水怪同胞一样骑舟出洋，其患无穷。

利玛窦不得不向巡按御史再次声明自己慕化而来，遵纪守法，潜心读经那一套。这一次无济于事。新到任的广东巡抚决定驱逐他们，罪名是刺探情报，蛊惑百姓，摆弄些自鸣钟、三棱镜之类神神道道的东西，扰乱人心。



利玛窦将仙花寺的家当搬上船准备返回澳门，心情沮丧到极点。肇庆苦心经营六年，前功尽弃。不料奇迹就出现在最让人绝望的时候，一艘二桅帆船出现在江面上，通知他们速速返回。巡抚大人让他们去广东的其他任何地方，唯独不能留在肇庆，肇庆是布政司所在。利玛窦选择了韶州，临行前巡抚大人客气地送他一本书，书中讲的都是这位大人与中国水师剿海平寇的光辉业绩，神父不会不懂其中的深远意义。

1589年秋，利玛窦来到韶州。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奇怪的人物——瞿太素。^①他郑重其事地拜利玛窦为师学习数学，可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利玛窦很快就明白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他想学炼金术。他患了炼金术的狂热病，在炼金炉里把他父亲留给他的家产烧了个精光，如今带着家眷四处周游，靠他父辈的朋友、部下施舍过日子。他是一个败家子，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这两个词经常意义相同。《利玛窦札记》中说：“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密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有关神父们是用这种方法变出银子来的谣言和信念仍在流传着……”^②

谣传很离奇。在他周围那些中国人眼里，利玛窦夷面诡行，一定有什么妖术外道。大西洋国或佛郎机，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里，还很难说是一个现实的国家。玄奘西域求法，郑和七下西洋，一出中国就是妖魔鬼怪的世界，谁还说得清楚这些“泰西”和尚没有什么妖法，翻云覆雨，点石成金？

无知会使世界变得奇妙无穷，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有可能，而什么可能的事都可以在幻想中解释。世间魔道，无奇不有。中国人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些“番鬼”的道行。利玛窦发现：“中国有很多人热衷

^① 瞿汝夔，字太素，江苏常熟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当时的名士。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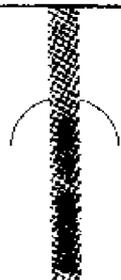


于炼金术，差不多使他们发了狂。他们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我们是这儿唯一的外国人，就有谣言说我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我们知道使用它的秘密。他们极力要证明这一点，便指出葡萄牙人为例，据说葡萄牙人用高价从中国买进大量水银运往日本，从日本他们满载银币返回他们本国。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神父们也干同样的事，因为他们发现神父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求施舍，不事生计，故此必然是他们有用这种神秘的草药变出来的大量银子。他们认为，很难相信有那样老实的人把银子从老远带到中国来，他们也不能梦想有人大方到不取报酬地去教导别人……”^①

利玛窦很清楚他们在中国扮演着什么角色。谁能理解“洋上帝”的言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他们皈依的中国教徒，在外面兜销炼金术，最后盗走三棱镜，准备当什么“宝物”在广州卖了。洋教士在中国遭遇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实际上都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传教士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国人也以中国的方式接受传教士。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泰西传教士夷面鸟语，诡服异行，很容易归入西域胡僧一类，更何况他们的装束也是如此。他们莫名其妙而来，不时出示一些奇幻的“宝物”，自鸣钟、三棱镜、天球仪、罗盘、日晷之类，都是些方外僧道的“法器”，不足为奇。他们深居简出，从不见他们外出化缘，却总是慷慨施舍，哪里来的银两？莫非真有点石成金之术？教堂落成了，络绎不绝前来参观的中国人，个个神情诡秘，狡猾的目光搜寻着每一个角落可能透露法术的蛛丝马迹。上帝的使者在中国人眼里，不过是妖道，可能有点石成金的法术，也可能是虚张声势的骗子。

利玛窦被驱逐出肇庆，海外奇谈似乎被证实了。传说制台把神父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01页。



召去，要他们交出变朱砂为白银的秘方，神父回禀天机不可泄露；制台一怒之下，把他们赶出肇庆。谣言像魔鬼，尾随利玛窦来到韶州，到处都是诡秘的神情，不期而遇，不堪忍受。那目光似乎在说：“你们不承认我们也知道。”传教士们盖起了新教堂，为了不太刺激，他们采取了中国的建筑式样，有人到教堂里烧香，他们把挂图上抱着耶稣的圣母玛丽亚，当成了送子观音。夜晚到来的时候，依旧有醉汉或恶棍往院里扔石头，最后小偷也光临了。密藏法术的寺庙不可能没有金银财宝。

洋教士在中国人中的形象非常尴尬。他们说的中国人不信，中国人信的他们又不说。如果他们的法术密不示人，中国人会恼怒的。更何况这些洋教士总是与中国官吏勾结在一起，这更能引起百姓的厌恶。韶州的文人和无赖又发难了，一天晚上，喝醉了的暴徒闯进教堂……

六 洋和尚在中国腹地游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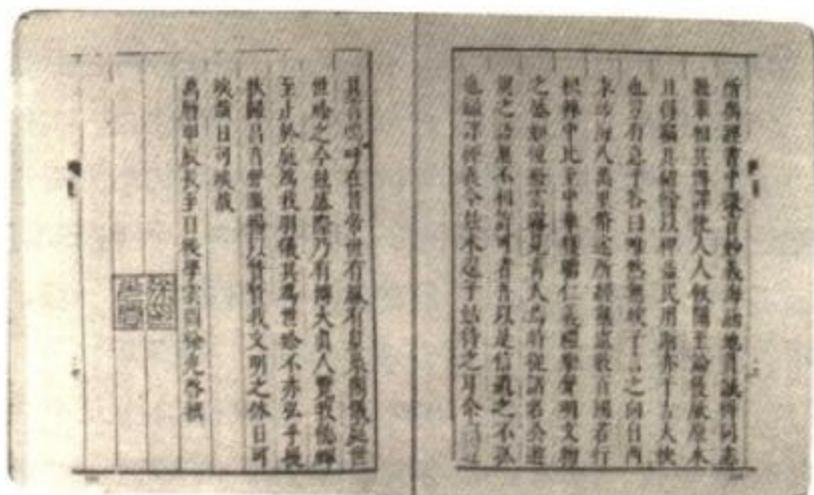
沙勿略在上川岛的热病恍惚与风雨涛声中，度过他弥留的日子。1552年10月6日，福音终于找到了进入中国、将经受苦难与光荣的肉体。那天，在意大利小城马切拉塔，利玛窦降生。月光流溢在寂静的月桂树梢上，神圣的希望展现在晨光中漫山遍野的石竹花上，犹如无数彩蝶缤纷的翅膀。

真正开启福音进入中国的第三次浪潮的人，是利玛窦神父。利玛窦知道，福音在中国立足，只有去北京。中国只有一个脑袋一颗心脏，全在紫禁城。利玛窦用一个计时沙漏打动兵部侍郎石星带他去北京。途中遇阻的时候，他又装神弄鬼地拿出一个威尼斯水晶三棱镜，石大人看得眼花缭乱，“北京去不了，就去南京吧。”石大人给他办了官照。到南京的时候，他又一次被看热闹的百姓当成炼金术士。时值倭寇入侵高丽，留都南京不敢收留任何外国人。利玛窦从南京又转到南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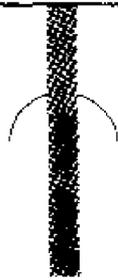
江西巡抚面前，利玛窦先后拿出石星签署的官照与水晶三棱镜，并且用上帝启发他的语言说：“韶州瘴气很重，我身体不好，希望在南昌居住。如不能赐准，我就回去。”

利玛窦留在南昌，又深入中国一步。他越来越了解中国人，误解也是可以利用的。自鸣钟、三棱镜可以满足那些贪婪的官员，快速记忆术、道德格言可以让一心读圣贤书、想升官发财的文人羡慕不已。利玛窦在南昌如鱼得水，每日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游山玩水，请客吃饭，他自己都承认经常忙得到晚上才有祈祷的时间。这是中国的方式，他感到内疚但又无可奈何，他知道，在中国，重要的不是传教，而是居留下来。这一步他已经达到了。

在南昌的上流社会，利玛窦结交了许多朋友。尽管其中不乏向他讨教化朱砂为白银的诀窍的黄白术士，总还是头脑健全的多。这还要感谢瞿太素，在韶州的时候，他就让利玛窦脱下僧袍，改穿儒服。中国人尊敬儒士。在南昌的士人眼里，利玛窦是教授记忆术与道德格言、绘制地图的“泰西进士”。他用快速记忆法教达官贵人的子弟准备科举考试，甚至可以试探性地跟那里最博雅的学者讨论基督教教义，当然他要尽量使用儒家经典里的术语。利玛窦虚拟建安王与他的对话，编



利玛窦著
《交友论》明
刻本。



了一部由七十六句西方道德格言组成的《交友论》，这部书在文人圈子里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其中的原因不是中国人发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发现西方文化可以证明中国文化的价值。妄自尊大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南昌偌大，人文荟萃。在士人圈子里，利玛窦摆脱了那些尾随他向他扔石头的暴民，却没有找到尾随他学习福音的信徒。甚至连一个瞿太素那样真正热心的人都没有遇到。利玛窦醒悟到，他的交游都是因为中国人的好奇，他感自己再次跌入冰冷的深渊中。中国文化的傲慢与虚荣即使在彬彬有礼的谦虚中也能让人感觉到。利玛窦总结在南昌跟他交往的有五类人：1. 对洋人好奇的人；2. 炼金术士；3. 科学之友；4. 请他消灾祈福的；5. 对局部记忆术感兴趣的。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人对他身上的什么东西都可能感兴趣，唯独基督福音除外。

越深入中国，利玛窦就越感到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困难。如果不能宣扬上帝，他在中国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意义。此时欧洲已经有人批评他这种中国化的传教方式，似乎只将基督教中国化而不将中国基督教化。利玛窦焦急，到中国十五年，一筹莫展。他知道在中国，什么事从上到下则顺，从下到上则逆。如果不能让中国的皇帝信教，皈依任何人都没有用。中国这个庞大的巨人的任何一点笨重的拥动，都决定于那蜷缩在北京紫禁城里、与帝国的外貌极不相称的病态而暴虐的心脏。1598年，利玛窦第一次获得进北京的机会。然而这一次他在北京只呆了一个月。王弘海把他引荐给两位太监，这两位太监听说利玛窦对黄白之术无所研究时，就不理睬他了。那年严冬，利玛窦返回江苏，在丹阳一所破庙里找到瞿太素，情景悲切，利玛窦大病一场。他到中国已经十五年，新世纪到来了，福音事业依旧一筹莫展。

一年以后，1600年5月8日，利玛窦终于取得前往北京进贡的机会。他与传教士庞迪我、钟鸣仁和游文辉乘太监刘婆押运丝绸的马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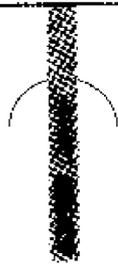
走运河前往北京。新世纪给他带来了希望。船到临清的时候，已是盛夏了。太监马堂的官船出现在他面前，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狡猾残忍的马堂听说这几位洋人带着许多宝物进京贡献，就想趁机捞一把。他强迫传教士们上他的官船前往天津候旨。三个多月过去了，依旧没有一点消息。传教士们被迫携带贡物迁往“城内一座花园”。太监马堂一再强调，如果他们有什么宝物隐匿不报，必将严惩不贷。年底的一天，马堂在返回临清前来到传教士居住的小屋里，二百多士兵将他们团团围起来，搜查开始，利玛窦一行携带的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马堂发疯般地叫嚷，暴跳如雷。突然，他发现一个打开的木箱子里装着几个木制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似血般鲜红欲滴的红漆、栩栩如生的长钉，让他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惊恐。他的脸被愤怒与恐惧扭曲了，他坚信他自己发现了最可怕的妖术阴谋，他拥有的符咒、魔魔术常识可以确凿地证实这是加害皇上、作妖作祟的蛊术！做一个针刺人体咒死人的事他已听说过无数次了。

传教士们大祸临头。1600年的圣诞节，他们在天津那所阴暗寒冷的房子里等待殉教。谋害皇帝的罪恶，哪怕只是企图，也不可饶恕。

番僧行妖术谋害皇帝的谣言，在天津、临清传得沸沸扬扬。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人来要他们的命。新年伊始，百无聊赖的万历皇帝突然想起了这几位送自鸣钟的夷使，竟让他们进京。真是世事难料。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抵达皇城，诚惶诚恐地奉上奏疏：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奏，为贡献土物事，臣本国极远，从来贡献所不通，遂闻天朝声教文物，窃欲沾被其余，终身为氓，庶不虚生；用是离本国，航海而来，时历三年，路经八万余里，始达广东，缘音译未通，有同喑哑，僦居学习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幅、天



主经一本，珍珠镶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敬献御前，此虽不足为珍，然自极西贡至，差觉异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初未婚娶，都无牵累，非有望幸，所献宝像，以祝万寿，以祈纯嘏，佑国安民，安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恣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臣益感皇恩浩荡，靡所不容，而于远臣慕义之忧，亦少伸于万一耳，又臣先于本国，忝与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疎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然而不敢必也，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谨奏。”^①

利玛窦的“贡物”里，万历皇帝最感兴趣的是钟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利玛窦在中国后来变成“钟表业的保护神”。

西方传教士们跟着利玛窦的足迹进入中国，他们是数学家、历法家、画家、翻译、铸炮师、钟表匠，中国能接受他们的“掩护身份”，难以接受他们的真实使命。他们说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可是，上帝却是个“胡姬”的儿子。他们说他们专心“诵经礼佛”，可“经”是什么经，“佛”是何方的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道妖僧，行迹可疑。刚到北京不久的庞迪我就说：“因为我的眼珠是棕钯的（准确地说，是铁锈色，*Ferrugineo colore*），他们从未见过，就产生了许多猜测，例如，说我的眼睛能发现地下有宝石或其他宝贝的地方，还以为那里边藏着莫名其妙的符箓。”^②

1606年，利玛窦在北京与太监学士们周旋，广东又起谣言，澳夷图谋入侵，长身虬髯的郭居静神父自立为王。广州当局下令拘捕一切洋人，尤其是番僧。黄明沙神父（方济各·马蒂内）从韶州到广州，被

^①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徐宗泽著，上海书局，1990年版，第177—178页。

^② 转引自《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1页。



捕，押解去衙门的路上，激愤的中国百姓群集在路边咒骂他。神父在刑名那里被施了酷刑，在牢里渴死。因为官员与狱卒们相信，这个番僧通妖术，能隐身水遁，只消一点点水，他就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神父的尸体带着手铐脚镣被埋到广州城外，城门上贴出“狡夷”的十一大罪状：

- 一、非法入境；
- 二、在澳门修建堡垒；
- 三、纠集倭寇，意欲进犯中国；
- 四、从事间谍活动；
- 五、身为魔法师，行妖作祟；
- 七、与日本同谋来往密切；
- 八、佛朗机与红毛夷匪首；
- 九、传教惑众，密谋造反；
- 十、私设讲堂；
- 十一、曾被官方驱逐。

黄明沙在广州殉教，教案迫害达到高潮。那一年年初，范礼安神父在澳门逝世，正准备前来中国大陆。“怀疑和不信任外国人是中国人的不治之症。”在一封写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范礼安神父就这样说，“因此，采用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在一个欧洲人的可能范围之内竭力将自己改造成中国人的作法是不够的。事实上，在同一时刻，通过澳门要塞和港口，中国人不断在眼前看到可怕的轮船，由此产生的嫉妒使得他们对我们打扮为中国人作法看作即使不是谋反的话，也是我们的一种诡计：好象是当他们不大警惕的时候，敌人就可以借此更安全地活动了。”

中国人的怀疑和不信任是有道理的，西方不断在海上制造恐怖事件，贩卖烹食小儿、杀人放火的故事早已流传开来，人们怎能不对这些魔鬼的祭司存戒心呢？“所以，我们经常不断地受到中国人民的仇恨和

恶棍们的诬蔑,恶棍们特别善于玩弄阴谋和非常恶毒地捏造令人相信的谎话。更加困难和危险的是,我们时时刻刻在一切方面都要取决于官吏们的专断,他们又经常更换,每次都从另一个省调来,开始执政时非常严酷,一阵心血来潮,就可以把我们驱逐回国。”^①

远在北京的利玛窦对此惨剧的发生无可奈何,他已经老了。那一年他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夸韦瓦的信中说:“我已经55岁了,从事这一万分艰巨的工作将近二十五年,现在是太疲倦了……当前,我工作的成就与其说是收获,不如说是播种,因此,不可以从教徒的数量评价我们的人在此的作为……至于我自己,尊敬的父,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就已年届六十了,也就是行将入土了。求上帝保佑我完成成为上帝服务所余最后的一个任务,即,改正我以往岁月中所犯的错误。……如果事情是按照工作的分量和努力的程度来衡量,那么,也许我可以期望有点成绩,然而,这是依据功德来计算的,而我仍然不够长进,所以我还在不断叹息,担心自己是白费了力气。”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已经二十五年。范礼安去了天堂,巴范济升任耶稣会的东方副省会长,罗明坚返回欧洲,在故乡的田园中安度



1586年罗马教会发表的传教书简集中的利玛窦书信。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附录”,第672—673页。



晚年。利玛窦则深入中国，从广东到北京的帝国大道上，有了4个传教点，近二千名中国人接受了洗礼。努力是巨大的，成绩却微不足道。新教徒七零八落，三心二意，传教点朝夕不保，岌岌可危。利玛窦辞世前还被更深一层的痛苦困扰着，他创立的中国化传教方式是否合理？他是叛教者还是殉教者？教会同伴能够理解他的事业吗？1595年，他第一次进入南京那天夜里，梦见一位陌生行人对他说：“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像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的宗教吗？”十五年后，他在北京逝世前，对熊三拔神父说：中国的大门虽已打开，但他们还在门口，以后还有更艰巨的工作，许多危险。

寂静的华北冬夜里，利玛窦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三十年前离去的那座意大利小城，山坡上的葡萄园、橄榄树与月桂林，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去了，如果他一生的努力能有所期望，那他希望故乡的一切都能在天堂里重逢。大限不远了，往事时常令他伤感。只有上帝的意志是永恒的，他在遥远的异乡生活了三十年，无数次惊险无尽的苦难，是上帝那双手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扶起来。路已到尽头了，他的肉体将消失在这异乡的人群中。

什么才是殉教，壮丽的瞬间还是漫长的痛苦？他恍惚又一次看到天边的原野上殉教者的血浇灌的鲜红的石竹花。

七 皇帝的钦天监与上帝的传教士

1610年利玛窦逝世时，一切还是那么令人悲观。毁灭性的教案即将开始，几个传教点正在风雨飘摇中，中国还是福音的沙漠，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忍受更大的痛苦。利玛窦说，他将他的同伴们留在洞开光明的门口，还有更大的苦难与牺牲等着他们。

奠基者死去的时候，艰难的事业才刚刚开始。第一次考验是1616

年开始的南京教案，发难者指责天主教有障王化，有悖名教：他们窥伺中国，图谋不轨；反对祭祖，教人不孝；私习历法，散布邪说；扰乱纲纪，伤风败俗。信徒教士被捕，南京的神父们被关在木笼里押解到广东，万历皇帝降旨驱逐利玛窦在北京的继承者庞迪我、熊三拔，两代传教士们几十年的努力几乎毁于一旦。1619年，汤若望一行随金尼格神父来到澳门时，阴风惨雨，中国大陆的福音事业一片黑暗。

拯救他们的不是信仰之光，而是科学之光。皇帝的历算师们使用的大统历，回回历，屡出差谬，有徐光启等人一再奏请，崇祯皇帝起用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进入历局，传教在各地也开始复兴。传教士们来京参修的《崇祯历法》来不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对明朝怀有信心的传教士追随明室逃亡南方，南明小朝廷里，太后、太子们都接受了洗礼，传教士们收获甚丰。

曾为崇祯皇帝铸炮炸伤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汤若望，却守在北京等



身着钦天监正官服的汤若望神父。



候清兵的到来。什么人统治中国并不重要，只要上帝统治他们的灵魂。汤若望知道，“新朝定鼎，天运已新”，少不了修历治历，当然也就少不了“西洋新法”，少不了他。他向多尔衮进呈《西洋新法历书》103卷。

耶稣会的同志们随南明小朝廷流窜南方时，汤若望在北京已成为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1651年，瞿纱微神父在桂黔交界处被清兵俘获劈首而死，汤若望又受封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授三品衔。郑成功围困南京，顺治皇帝冲动要挂帅出征，满朝没人敢阻，还是汤若望进宫劝止。顺治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可敬的爷爷”。

有“可敬的爷爷”在皇帝身边，外省传教畅通无阻。中国的传教点已从利玛窦去世时的4个增长到28个，教徒从不到二千人达到二十四万余人。^①成就是巨大的，但光荣似乎并不属于主，而属于科学。

在一个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意识形态基础的皇朝里，历法是有关系国祚的大事。在一个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专制帝国里，皇帝的恩准是最根本的保护。诺大中国，没有比钦天监更理想的位置了。既能发挥他们的天文学之长成为皇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能接近皇帝赢得皇帝的欢心以保证中国教务顺利进行。欧洲教会迫害伽利略的那些年里，伽利略的望远镜正在中国为教会赢得传教的机会。汤若望是伽利略罗马学院的同学，为中国皇帝主持钦天监，观象制器、修历著书。顺治再次为他加俸，赐地亩田产，封光禄大夫。只要钦天监里洋教士的历算不差，帝国广袤的土地上，福音就可能开花。

在中国，传教成败，系于科学，而科学又系于皇帝好恶。遗憾的是，“精于象纬，闳通历法”的汤“玛法”，也有“所观星象与实不符”的时候。得皇帝恩宠，举告弹劾都没有关系，一旦失宠，“历狱”到来也毫不留情。1662年顺治驾崩，玄烨登基，鳌拜专权，汉官杨光先上

^① 见德礼贤《中国天主教史》第67页与克鲁宁《西泰子来华记》第244页，另据《中华归主》统计，1664年耶稣会在全国11个省37个城市地区传教，有教徒114200人。

《请诛邪教疏》，参劾汤若望“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三大罪状。历法重要，皇帝比历法更重要。失宠的洋玛法被判处凌迟——中国最残酷的刑法。



R. P. IOANNES ADAMVS SCHALL, GERMANVS
e Societate IESV Praecepti Supremi ac Regii Mathematici
suae Tribunalis Praesens; indefessus pro Conversione
gentium in China Operarius ab anno 1618 usque 77
Johannes Schall

汤若望神父像，见1665年威尼斯版《历史》插图。

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没有什么人不生活于恐惧中，百姓怕官，

官怕皇帝，皇帝怕天。结案的时候，北京发生地震，天怒必有人怨，紧接下皇宫失火，朝野震惊，皇太后出面干涉，汤若望终于幸免于难。汤若望重返天主堂的时候，各地传教士共26人已押解到京，他们的教堂被封被拆，他们的教众被迫弃教。全国禁教，在利玛窦进入中国后还是第一次。汤若望开释，教案并没有结束。26名传教士除一名死在北京外，其余25名解送广州“留居于城内住院”，等于软禁，教士只能在街头行走，不可出城。福音之树如此脆弱。

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死在福音事业最惨淡的季节里，葬入北京紫禁城外二里沟一所杨姓太监自建的佛寺，这是五十六年前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在基督教中国传教史上，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重要人物。“利玛窦卒后，名业与玛窦相并，堪称为耶稣会之二雄者，若望也。”^①

^① 《主制群征》序。

最后的日子，年轻的南怀仁神父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南怀仁神父的身上，即将前往天堂的汤若望神父看到留在人世间福音的希望。二年以后，南怀仁奉康熙旨令与杨光先、吴明烜一同以测验日影的方式检验康熙八年历，结果南怀仁的测算“逐款皆符”，吴明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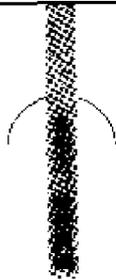


南怀仁神父像。

的“逐款皆错”，杨光先则“不知推算”。修历事大，有关国祚。当年参劾汤若望“谬历止二百年”的杨光先，如今被证明根本“不知推算”。

科学再次拯救了中国的传教事业，南怀仁因精于历法被授钦天监监副；杨光先因不通历法被革职还乡，死于路上；康熙皇帝因意识到不知历算会受人蒙蔽，决定向传教士学算^①。科学之光再次照亮福音田野。1669年，南怀仁从钦天监监副升任监正，西洋新法的“时宪历”恢复使用，被没收的宣武内耶稣会的房屋也归还了。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平反昭雪，拨款重造坟墓，并亲撰祭文。1670年，扣押在广州的神父们“奉旨归堂”。科学为传教赢得了皇帝的旗号，在中国就畅通无阻了。

^① 康熙对皇子们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御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御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86页。



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全面复兴，康熙当朝的时代，是中国传教的蜜月。南怀仁为康熙讲授天文学、几何学、静力学，徐日升教授乐理与西洋乐器。康熙不仅学习科学技术，对西洋的哲学、宗教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此时的南怀仁，完全恢复了汤若望在宫中的地位与荣誉。他主持钦天监工作，在汤若望的《二百年历表》的基础上编撰《康熙永年历法》，汤若望为崇祯皇帝铸炮，南怀仁为康熙皇帝铸炮。不久南怀仁的头衔也加上通政司通政使（1678）、工部右侍郎（1682）。钦天监里的洋教士，在宫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荷兰人来朝，他们充当翻译，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期间，他们的身份已成为皇帝的亲信顾问，监督谈判的进行。^①南怀仁去世时（1688年1月），康熙皇帝赐谥号“勤敏”，洪若翰、白晋、张诚等法国外方传教团的传教士，抵达北京。

洪若翰到中国后写信告诉他的教友：“我们在来中国之前所学得的科学技能，现在非常有用。因为这些科学技能就是康熙帝准许天主教公开传教的主因。”^②对于传教士，科技是手段，传教是目的；对于中国皇帝，科技是目的，容许他们传教是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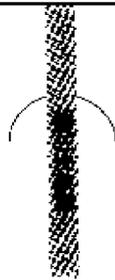
汤若望深得顺治皇帝宠信，但说到基督教，顺治却明确表态：“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经一执中之理……西洋之书，天主之道，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③顺治宽容天主教，是因为汤若望修历制器的功绩。康熙也一样，尽管他在更大程度上表示过对天主教的同情，甚至赋诗咏基督受难^④，但他始终并未入教，礼仪之争兴起后，禁教的也是康熙。

^① 《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美）约瑟夫·塞比斯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② 《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白晋著，台湾光启出版社1966年版，第37页。

^③ 《御赐天主教碑记》。

^④ “功求十字血成溪，百丈思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打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动八埃惊九品，七言一萃万灵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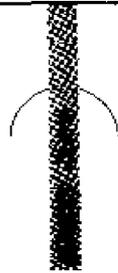


八 信仰之光或科学之光

对传教士来说，科学保护传教是有效的，但不是没有限度；对中国皇帝来说，为科学容忍传教是可以的，但也不是没有限度。1614年，耶稣会远东省会长卡瓦略发布教谕，禁止在华传教士向中国人讲授数学或《福音书》之外任何其他学说，可是，除了教授科学，充当数学家，钦天监或钟表师之外，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张潮评价这些传教士说：“其人则颖异聪明，其学则星、历、医、算，其俗则忠、信、耿、直，其器则工、巧、奇、妙，诚有足令人神往者……夫泰西之说诚胜于诸教。惜乎天主为言，则辞不雅，驯流于荒诞，缙绅先生难言之。苟能置而不谈，则去吾儒不远矣。”^①即使最友善宽容的康熙皇帝也明确表示“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原不相同，唯西教士能通晓数学，故国家起用彼等”。

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科技是为了传教，中国容许传教，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科技。双方二者间微妙的平衡，成为福音得以进入中国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平衡复杂敏感得难以维持。传教士过分传播科技，不仅会破坏天主教的神学基础，还会使中国人与传教士不知不觉中忽略了教义与教务；过分传播宗教，没有科技的保护他们就无法居留中国，中国当局也会因为他们教众过多、势力太大威胁到政教安全而禁止或驱逐他们。以科学传宗教，科学在世界观本质上是与基督教相矛盾的，此时在欧洲已经出现科学与神学的矛盾，在中国传播科学，迟早会自毁传教的信仰基础。更何况此时的中国，没有福音的土壤，未必就有科学的土壤。传教士的传教地位岌岌可危，科学地位也岌岌可危。中国的学术传统，儒家世界观，僧道势力，民族心理与民间知识

^①《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85页。



道德基础，既不能容纳基督教，也不能容纳科学。在中国，传教事业纠缠在科技与宗教、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西方教会与朝廷等等矛盾关系中，这些矛盾随时可能触发，将传教士们多少年含辛茹苦、小心翼翼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

自利玛窦时代起，科技就是传教士居留中国的资本。利玛窦首先让中国人叹服的是他绘制的地图，以后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都在为中国绘制地图。他们不仅是上帝的使者，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成长在文艺复兴的遗产中，如果我们想到达·芬奇全能的天才，就不会怀疑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多才多艺。

在中国，没有学问就没有威望，他们必须扮演“泰西儒士”或科学家的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为皇帝服务，并在文人圈子里传播一些西方科技思想。金尼阁第二次来华带了七千余册西书，17世纪耶稣会北京本部的北堂图书馆已有近万册西方图书，内容不仅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历史，还有大量的科技图书。为了向中国人传播这些知识，在华传教士自己也从事著述与翻译，并积极与中国文人合作。徐光启、李之藻与西来传教士一道将西方一些科学著作译成汉语，有资料证明，16-17世纪间耶稣会士在华的汉文著作三百多种，除阐发教理外，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建筑与水利方面的知识。

到康熙时代，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测绘学、建筑技术、水利与火器制作知识，都或多或少，或新或旧地传入中国，其中的某些理论已片段地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从龙华民到白晋神父，都曾设想并努力在中国建立科学院，科学不仅影响到中国文人，也影响到中国的皇帝。当教廷在欧洲审判伽利略时，最坚定的教皇卫士耶稣会传教士们正在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中国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1978年4月27日在法兰西学院所做

的报告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然而，西方科学与技术是否真正、或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影响到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呢？

传教士的科技知识不断帮助他们在的生活与交往。中国人是因为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左)。

他们的科技知识容忍或欢迎他们的。从利玛窦时代起，传教士就主动接近中国文人，向他们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从瞿太素开始，徐光启、李之藻、王征、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中国文人，探究西学，已涉及到许多领域，从天文历法到水利火器。但是，这些洋务派或西学派的先驱影响实在有限。徐光启入京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并与李之藻、王征等人译介西书、督修新法，购买洋炮，有“倘利于国，远近何论焉”的开明态度，到了晚年，不胜感叹：“臣等书虽告成，而愿学者少，有介无和，有传无习，恐他日终成废习耳。”^①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以前唯一一位懂得西方科技的人。他的纯科学的、非政治的坦诚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时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传教士的西学无动于衷。即使有借鉴，也难以以纯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与技术问题。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强烈的民族屈辱感造成的变

^① 《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月食先后各法不同缘由及测验二法疏》。

态的民族文化自尊，扭曲了客观的科学精神。中国文人不甘心这种“被动”的局面，很快从“会通派”发展到“西学中源说”。孔子问学于剡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老故事又出现了。康熙皇帝曾写过一部《三角形论》，当时著名的历算学家梅文鼎急忙大加颂赞：“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辘心以算弧度，心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祥，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金科玉律矣。”^①

明清际西方科技对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天文学，因为它关系到历法。帝制时代历法是国家大事，不仅关系到国家社稷，也关系到百姓生计。就朝廷来说，天文是国运的征象，修历与御宇，改历与改制都有同一的关系；就民生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民生为本，历法气象直接关系到农业的丰减，西方传入中国的诸种学科中，似乎只有天文学得到实际的利用。中国尽管有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但既没有普及之广，也没有深刻之精。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科技，把它当作宗教的工具，而中国皇帝又把他当作政治的工具。康熙学习科学，目的是“断人之是非”。康熙皇帝热衷于科技的消息在西方传得神乎其神，他向传教士学习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西方医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下有道，学在官府。康熙感兴趣的并不是科学本身，而



白晋神父《康熙帝传》中的康熙皇帝画像。

^① 梅文鼎《绩学堂诗抄》卷4。



是统治对科学的利用，而且，他的学习也仅限于兴趣。1692年，传教士白晋写信向法王路易十四报告康熙皇帝将要“在宫中建立科学院”。确有其事，不过《清史稿》中记载这个“科学院”名叫“如意馆”，这个名字令人想起皇帝个人的消遣游艺的地方。难怪中国人常将西方科技称为“奇技淫巧”，西方人知道若想讨中国皇帝喜欢，就送他们一些玩具或钟表。

“科学院”变成“如意馆”，一个皇帝、几个文人，即使有诚意，影响面又能有多大？张诚的日记中说康熙皇帝“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作。”皇帝的担心是什么？或许是中国民众与官僚对西方科技的抵制与反感。广大官僚与民众在知识上的愚昧与道德上的正统主义，都使西方科技在明清之际的中国难以容身。

汤若望出任新监正，为迎合中国传统，科学的观测报告也加入了迷信内容：“……（四月）初十壬戌，巳时候至午时，观见日生晕，围图赤黄色鲜明，良久渐散……谨按观象玩占，占曰：……五谷不成，人饥，天下有兵色。”^①汤若望入狱，大祸临头是因为“天算舛谬”，为荣亲王选择出葬的日子误用“洪范五行”，由此不吉导致荣亲王的生母董鄂贵妃旋即归天，不久顺治皇帝染天花驾崩。汤若望罪恶滔天，以弑君罪被判最残酷野蛮的刑罚——凌迟。

就在上帝准备让衰老的汤若望在惨烈的殉教事件中获得圣徒美名时，另一件荒唐的事发生了，北京地震，宫内大火，朝野震惊，相信吉时忌日的中国人也相信冤情可以震怒苍天。汤若望被赫免了。在中国，政治可以成就科学也可以毁灭科学，它与各种巫术迷信一样都是统治工具。“历狱”虽以杨光先最终获罪，但在当时大众的心里，他也可能是抵御妖言邪术，维护中华正统的义士。他的著作与议论得到许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钦天监前三朝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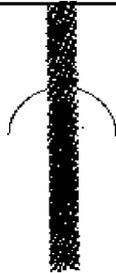


多人响应。如果不是皇帝的决断总是对的，我们也可能看到那个时代对杨光先的另一种评价。

杨光先并不是那类只会造谣中伤，罗织陷害的胸无点墨的奸佞小人。他也懂得象启蒙主义者那样写些雄辩的小册子，散布到社会上争取舆论。据说传教士曾出重金收购销毁流传于世的杨光先的《不得已》。杨的文章写得很动人，他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螺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

在中国传播科学，中国人不是好学生，传教士也不是好老师。传教士们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也并没有将西方近代科学的真髓传播到中国，他们教授和运用的天文学是第谷体系的，欧洲科学中的最新成果，诸如解析几何、微积分、牛顿力学、林奈的生物分类法和命名法等，并未传入中国。另外，传授科学也不是他们的目的。这些忠心耿耿的传教士从来也不曾混淆手段与目的，传播科技是他们在华居留的条件，而在华居留的目的是传教。他们教授科学最直接的想法是讨皇帝与官宦的欢心，把在科学技术上的微小进展都当作传教的法码。而这样不仅陷害了他们自己，也陷害了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这是一个误会，事情并不像西方人想象得那样容易。中国人能够毫不觉察地放任他们从科学偷渡到荒唐离奇的宗教中去？

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那段脆弱的“蜜月”，充满了相互之间的猜疑、防范、危机与迫害。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而向中国传播西方科技



是无可奈何，中国人为探究西学而容忍传教士伺机宣教也是无可奈何。就科技传播而言，传教士不是好教师，中国文人或皇帝也不是好学生，他们之间的默契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妥协或误会。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灾难，那就是他们双方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中国的政教神话的陷阱中去。

中国只能有一种权威，皇帝既统治人的身体又统治人的头脑。如果传教士非要在中国的“天子”头上凌驾一个西方的“天主”，那么他们就必须离开中国，这是传教士面临的选择。因为从政治角度讲，天子头上不能再有天主；从文化角度讲，中国天子头上更不可有西夷天主。中国政教传统与基督教的本质矛盾，使基督教在中国只能苟且不能发展。苟且尚能生存，发展将导致覆灭。金尼阁为利玛窦的传教方法辩解：“……应该把中国传教团和其它传教团区别开来判断。这里的要点是，中国人认识到我们丝毫不搞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也不指望任何物质利益，只是前来传布唯一圣教，那和帝国的利益丝毫没有抵触；一旦确定了这一点之后，辛勤孕育的婴儿就一朝诞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抛弃任何人的同时，我们有意避免追求数字，然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他们却达到了五千之众。我们害怕群众的聚集，以免在一夜之间使多年的成果丧失殆尽。我们采用的办法就是使自己依靠官员正有如依靠上帝一样，为的是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说法——人民也追随他们的榜样。这就是何以我们深信，这里的基督教将会随着圣教及其使者们之获得信任而取得进展，又将会随着不合时宜的热情使得人数膨胀而倒退。”^①

传教士们只能借传播科学传播宗教，然而，即使是科学，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只有一种权威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工具，科学也一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附录”，第661—662页。

样。朝廷里政权将它当作御用工具，可留可去；文人探究西学，皮毛尚可，追溯到本原，就有可能动摇儒家正统与夷夏之防的信念，就只能证明西学源出中国，西学中源的理论



身穿汉装的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神父。

一旦出现，探求西学也最终成为尊夏攘夷的意识形态工具。

在中国传教，的确不易。“对一个只怕皇帝、只爱钱财，对于一切永恒的主题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民族宣扬教义必须不厌其烦。如果你不具备某种柔和、某种温厚、某种坚韧不拔的品质，你每时每刻都会觉得难以忍受。”沙守信神父写信对他的同伴说：“在这里传教比世界其他千百个传教区都要困难得多。”“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是中国人在弱小民族之列，仍惟我独尊看不起任何其他民族。他们固执于自己的国家、风俗、习惯、至理名言，他们不相信中国以外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们向他们指出他们崇拜偶像是荒谬的，我们使他们承认基督教是伟大的、神圣的、颠扑不破的。好像他们要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了，其实远远还没有完呢，他们冷淡地对我们说：“我们的经书中没有提到过你们的基督教，这是外国的宗教，如果中国以外真有这样的东西，我们的圣人学者们还会不知道？”^①

^①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朱静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9页。

九 在沙皇与皇帝之间铤而走险

“1688年3月11日举行了南怀仁神父的葬礼。我们参加了这个葬礼……”刚到北京的洪若翰神父，十五年后在浙江舟山写信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追记这场隆重的葬礼。代表皇帝出席葬礼的官员早晨七点就到了，葬礼同时按中国习俗与基督教习俗举行，国丈骑着马，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路旁是数不清的老百姓。灵柩落葬在城外的耶稣会墓园里，利玛窦与汤若望神父坟旁。葬礼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在中国，钦天监里的洋教士们，再也没有比南怀仁神父获得更高的荣誉与地位的了。

钦天监的洋教士，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那是耶稣会在中国的黄金岁月。1688年洪若翰、白晋、张诚、李明神父等一行五位“国王的数学家”抵达北京，传教士在中国的黄金岁月即将达到高峰。此时中国有近百个住院，近百名教士，约二百座教堂，二十多万教众。葬礼之后，洪若翰等觐见了伟大的康熙皇帝。白晋、张诚奉旨留在宫里，其他三位往外省传教。五年以后作为康熙皇帝的钦差回到法国招募传教士的白晋，充满希望与自信地向路易十四介绍中国教务的成就：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在中国引入和传播基督教，宣传科学是一切必出之途中的主要一种。到目前为止，上帝要所有的传教士都动用这种手段。……中国皇帝给予他的臣民们有信仰我教的充分自由。这就足以使人们有希望在某一天能看到一个基督教的中国。……我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期望中国皇帝和他整个帝国的改宗，期待普遍和平的奠定。”^①

传教士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期望中国皇帝和他整个帝国的改宗”，因为他们感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他们在挫折与失败

^① 《康熙帝传》，（法）白晋著，马绪祥译，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5页。

中努力了一百年，可只有在最近这五年，希望才突然展现在眼前。

法国传教士刚到北京那段时间里，就听到人们议论与俄罗斯谈判的事。一年以后，张诚和徐日升神父一道奉旨随中国使团前往尼布楚与俄国人谈判。这是一项艰难而又令人激动的任务。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根本的矛盾：俄罗斯的政策是贸易或者战争，中国的态度是既不想贸易也不想战争。冲突已经开始，俄罗斯不断扩张，中国也很强大，谈判是迫不得已的，哪一方让步都很困难。而耶稣会士，作为中国使团的翻译、信使、调停人、顾问，他们既想讨好中国皇帝，又想讨好俄国沙皇。讨好皇帝可以获得在中国开放传教的机会，讨好沙皇可以获得俄国开放从欧洲前往中国的陆上通道。早在南怀仁神父在世的时候，就一边在康熙皇帝处争取随团出使的机会，一边带信给沙皇尼古拉“表明他和徐日升神父对俄国的忠诚”。

谈判的确让人费尽心机，耶稣会士两边奔走，作为上帝的使者，他们不愿意偏袒任何一个世俗皇帝，但作为世间的传教者，他们又必须有世俗权威的容许与支持。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总是在两个强力极端间铤而走险。幸运的是，在他们的斡旋下，谈判成功了。中国人开放了边境皮毛贸易市场，俄国人退让出黑龙江流域的土地。俄国人可以贸易，中国人可以守土，回程的路上，神父们或许感到欣慰，皇帝与沙皇都满意了，上帝的事业将从他们的满意中获得利益。

在两个强力极



多明我会修士冈明我神父认为，中国是最强大最优秀的国家，欧洲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效法中国。他从中国回到欧洲后写出《中华帝国志：历史、政治、道德与宗教》，图为该书1676年马德里版本扉页。



端间铤而走险，这一次成功得很精彩。俄国大使在签约第二天，酬谢他们此次谈判中和以往在北京朝廷对俄罗斯的贡献，并且表示将在彼得大帝那里替他们说情。更可喜的消息来自康熙大帝。康熙非常满意，二十年的边疆困扰终于了结，他在自己的寝宫里接见了徐、张二位神父：“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以惬朕意。朕亦知和约得以缔结，实赖尔等之才智与努力”。

一切都很美满，多年的努力即将收获，如今他们已不仅是皇帝的历法学家、教师，他们的影响已经明显实现在帝国政治中，皇帝的宠信也达到顶点。1692年，杭州教案又起，神父殷铎泽向北京告急，曾率团出使尼布楚的国舅佟国纲议奏：“臣等会议，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数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进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之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俱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敢擅便，谨具题请旨。”^①正合上意，朱批：“依议”。这就是所谓的“1692年宽容敕令”。

传教士在中国大地上自由行走，教务异常蓬勃。徐日升主持钦天监，白晋开始研究《易经》等先秦典籍，张诚则在宫中讲授几何学、数学、哲学，进行解剖学、医学实验。机会不断，传教士们欣喜地看到上帝在这个异教国家播下的种子即将开花。一年以后，康熙皇帝患疟疾，高烧不退，张诚和白晋献上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皇帝的病好了。没有哪一次让皇帝这么切身地体会到“科学的胜利”。这是皇帝的幸运，也是上帝的幸运。康熙赐地拨款建造天主堂（即北堂），教堂落成的时候，皇帝亲题匾额“万有真原”与对联一副：

^① 《中国教案史》，张力、刘鉴唐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十 同时被皇帝与教皇抛弃

灾难性的突变往往就在幸运的高峰中到来。教堂动工的时候，白晋作为康熙的钦差返回法国，他在最好的时刻带回最好的消息，康熙皇帝将可能成为中国崇拜偶像教的破坏者，中国可能成为基督教王国。

然而，就在1693年，张诚、白晋在京城用金鸡纳霜大悦圣意的时候，他们的同会传教士，罗马教廷传信部任命的“有总辖中国教务之权”的代牧主教颜瑯，在福建发布七条训谕，禁止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并将此训谕寄呈教皇英诺森十二审阅。酝酿已久的“礼仪之争”最终爆发。对于耶稣会上，这是一场覆灭性灾难的开始，他们的处境总是在两个强力极端间铤而走险，这一次，两个强力极端教皇与皇帝间的冲突，将彻底葬送他们百年努力的中国传教事业。

颜瑯发布主教训令，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严禁在教堂中悬挂“敬天”字样的匾额，Dieu只能译为“天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华的传教士又起纷争，欧洲从巴黎到罗马，教士们也开始争议，甚至哲学家们都加入了。在罗马教廷派出调查组准备做出裁定时，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联名请康熙判断“敬孔”、“祭祖”的意义。康熙肯定了耶稣会的观点：“敬孔”、“祭祖”并非宗教仪式，“敬孔”是“敬其为人师范”，“祭祖”是“尽孝思之念”，与信仰真神上帝无关。

康熙的圣谕传到罗马，不仅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化了矛盾，耶稣会士诉诸中国皇帝的权力令西方人反感。十年犹豫之后，裁决最终做出，1704年，教皇克莱孟十一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此时教皇的特使多罗已到菲律宾，准备前往北京。两种权威的冲突已经到来，教皇与皇帝、神圣与世俗、西方与中国，在华耶稣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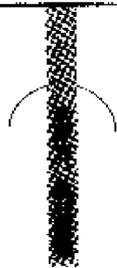


命运被夹在他们之间，教皇可以在罗马通令禁止“敬孔”、“祭祖”，皇帝可以在北京禁止基督教，真正的受害者却是耶稣会士，这一次他们在两个强力极端间铤而走险的结局是覆灭。1705年，教皇特使多罗在颜珰陪同下到京，要求彻底禁止中国教徒的尊孔祭祖活动。康熙恼怒，通令全国各地传教士“领票”传教，不遵循利玛窦成规者，驱逐出境。耶稣会在华传教命运的灾变已经导致最初的恶果。

颜珰激化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早就开始了。1633年，多明我会士范玉黎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发现耶稣会士归化的基督徒竟一如既往地尊孔祭祖，他们认为这是迷信和偶像崇拜，耶稣会士默认并参与这种行为属于叛教。这两位狂徒为此吃尽了苦头，被中国人关进监狱，带枷示众，打了几十大板后遣还澳门。他们越发想不通，在澳门向耶稣会巡视使李玛诺神父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并将辩诉送到马尼拉的总主教与罗马教皇那里，质问耶稣会有什么理由允许他们的基督徒官吏与文人们前往孔庙或先皇的偶像寺庙跪拜敬神、进献祭品并举行各种祭祀仪式，耶稣会的神父们有什么理由允许并参与文人祭祀先祖的仪式，参加不信基督教者们的吊丧或葬礼活动、在祭坛上供奉已死去的不信基督的文人之灵牌？

这是一个不祥的开端。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与耶稣会就一些“礼仪”问题的争吵，教皇一时也听不明白。Dieu(Dio)一词在汉语中是否应译为“上帝”、“天”或“天主”，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祭祖的形式是否属于迷信或偶像崇拜？

从教皇英诺森十世1645年的第一道通谕开始，教皇的态度就忽左忽右，时而支持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时而支持耶稣会，欧洲不同教派也出自各自的成见加入这场危险的争论。多明我会传教士在中国开始为他们的执拗而殉教，耶稣会士仍是扮演儒士化的科学家。1665年，各地传教士集中北京后押解广州留居城内住院，19名耶稣会士、5名多明我会士、1名方济各会士用四十天的时间讨论了42个有关礼仪之



争的问题，决议一致通过准许中国信徒参加祀祖祭孔仪式，只有1名方济各会士反对。

大难临头时，意见尚能统一，柳暗花明时节，他们却自相分裂。1693年是耶稣会在华传教最有希望的一年，颜珰那狂悖专横的训谕一出，一切都完了。光明的顶点即是黑暗的开始。颜珰的训谕已经惹怒了康熙皇帝。皇帝有涵养的宽容是因为耶稣会士的天文学与金鸡纳霜，洋教廷得寸进尺，多罗特使不通情理，“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康熙到此还是有节制的，传谕“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之人，许他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们居住”。“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凡各国各会，皆以敬天主教者，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①礼仪之争，可以休矣。

徐日升神父病倒了，1708年12月24日去世。他的同伴甚至康熙皇帝都认为，多罗来使是徐日升神父病逝的主要原因。“他看到，在多罗来使中国期间，三十五年来他所致力教会事业有被毁的危险，他看到耶稣会的名声遭到了危害，他看到自己的名誉和品德被诬蔑为口是心非和背叛。皇帝本人就认为徐日升之所以得病以致于他的健康受到损害的原因，是多罗对这个著有功绩、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太严酷了。”^②

康熙支持耶稣会。多罗在南京发布训令，制止传教士向朝廷“领票”，严禁教徒尊孔祭祖，违者开除教籍（“绝罚”）。冲突升级，康熙下令驱逐多罗出境，拘禁澳门。1710年，多罗受尽澳门耶稣会折磨，死于中风，逝世前他见到教皇派马国贤神父送来的枢机主教的小红帽，他被提升为红衣主教。教皇支持多罗。

一直试图在两种权威间平衡的耶稣会士们，发现自己正成为两种

^① 康熙四十五年上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六），（二）。

^② 略入辣神父语，见《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136页。



权威冲突的牺牲品。讲学、实验、谈判、测绘，献药，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朝廷里鞠躬尽瘁并深得皇帝器重的张诚，在教皇与皇帝的冲突中，却一再为多罗与罗马教廷辩解。平时传教士们都表现出两种忠诚，到真正冲突选择的关口，就只有一种忠诚了，对上帝与教会的忠诚。或许皇帝已经隐约感到自己被利用，传教士们伪善的忠诚不过是为了得到他的庇护传教。

十一 第三次浪潮落下

福音进入中国的第三次浪潮，就要落下了。1709年张诚逝世，葬礼远没有他们初到中国时见识的南怀仁神父的葬礼那么隆重。他被悄悄地下葬在北京正福寺法国人墓地，康熙皇帝竟没有一点表示。1719年康熙对教士利国安说：“……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以前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出会除会技艺的人留用外，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①

礼仪之争并没有结束。在华传教士均得“领票”居留，限制多了，禁教已经初见端兆。1716年广东碣石总兵奏请禁教，翌年，两广总督又送上同样奏折。如果说此时康熙禁教之意仍不坚定，那么，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来华，再次递交教皇对中国教民的禁约，康熙被激怒了。

仔细读过教皇通谕的译文后，康熙朱批示：“览此告示，只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信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懂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②这位曾经庇护传教士的中国大皇帝，开始禁止臣民信奉洋

① 《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②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十四。



教并限制传教士自由传教。

二十年前白晋曾经预言，有朝一日康熙大帝“可能成为在中国崇拜偶像教的破坏者”，如今白晋在北京，作为康熙帝唯一信任的幸存的传教士，眼看着这位可敬而又可怕的大皇帝，竟成为可怜的基督圣教的破坏者。1722年，康熙逝世前几个月到达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写信描述他所目睹的中国教务状况：“我来中国只有几个月。当我看到传教工作在不久前还是那样充满希望，竟然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教堂已成废墟，教徒已鸟兽散，传教士被驱逐并集中到广州，中国唯一开放的口岸，不许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已几乎遭到禁绝。阁下，这就是我所见的这个原以为比较容易接受福音的国家所呈现的可悲景象。”^①

禁教开始，基督教在中国短暂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接下去的是不断的厉禁与迫害。1722年12月，康熙皇帝去世。对传教士，漫长的康熙时代令人悲喜交集。雍正即位，事情不是更好而是更糟。

福建又起教案，闽浙总督奏请厉行教禁。雍正批准礼部奏议，通令各省，国人信天主者必须弃教，否则处以极刑，各省洋教上半年内离境。冯秉正、巴多明等在京传教士奏请赦免，雍正宣他们进宫，从冯秉正1724年10月16日的信中，我们知道雍正皇帝亲自向他们解释了禁教的原因：

1. 西洋人践踏我法律，扰乱我子民，事关国家，不可不禁；
2. 康熙帝袒护你们，已为文人学士所不满，洋教不假，但一国有国之教义，如果中国派一队和尚喇嘛去西方传教，西方怎么反应？
3. 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太快，你们的宗旨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天主教徒，而所有的教徒都听从你们指挥，一旦西方国家从海上入侵，里应外合，中国将会大乱；

^①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江文汉著，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4. 我作为个人，可以同情帮助你们，但作为国君，必须以国家安危为重，中国目前边境不宁，北有俄罗斯，南有西洋人。你们只可在北京、广州居留，但不可传教，若有怨言，就全部离境。

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将中国禁教的原因说得这么清楚。各地的教堂有的被毁，有的改为公廨、书院甚至庙宇。在同一封信里，冯秉正神父伤感地写道：“我们神圣的宗教在中国被完全禁止了，除了在北京的传教士以外，我们所有传教士都被驱逐出中国，我们的教堂或者被拆毁，或者被移作它用。诏书已经颁布。诏书命令基督教徒放弃信仰，禁止中国人入基督教，违禁者将受到严厉惩罚。我们花了二百年的心血建立的传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①

冲突已经到了总爆发的时刻。中国皇帝厉行教禁，罗马教皇的绝对禁令也颁布了。耶稣会士如果允许他们的教徒祭祖祀孔，将是叛教行为，他们效忠的教皇准备抛弃他们。礼仪之争在欧洲闹得沸沸扬扬，几百部著作出现，几乎不参加这场争议的人就没有学问也没有信仰。大家都很执著，也很自以为是。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没有人体谅、珍惜他们一百多年来艰辛努力与惨重牺牲所换得的成果。他们将变成两面受敌的可怜的殉难者，为一些谁也搞不清楚的中国礼仪，远在欧洲的教皇与教士们，哲学家与阴谋家们，为什么就不能顾全大局呢？

教皇的使节嘉乐主教回到欧洲，事态进一步恶化，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在中国，耶稣会士又卷入宗室党祸，穆敬远神父被发配西宁。在西方，教皇坚持厉禁礼仪的通谕，许多人都把耶稣会士当成狂妄、虚伪、背叛教会的异端，甚至有人主张对他们施以火刑。1726年，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出版他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格列佛发现，在小人国利立浦特，最大的战争竟发端于鸡蛋该从大端磕还是从小端磕的元

^①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朱静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6页。



聊争议。为了这一鸡毛蒜皮的争端，他们历史上已发生过六次叛乱，皇帝为此丢了皇位甚至送了命，11000多人“情愿受死也不肯打破蛋较小的一端”。“如今，一场关于磕鸡蛋的礼仪的血战已在两大强国之间持续了三十六个月……”^①

可怜的耶稣会士，同时被他们效力效忠的皇帝与教皇抛弃了。他们原来理想成为这两大权威之间的桥梁，可他们建起的不是桥梁，而是幻化的彩虹。

如今皇帝认为是他们居心叵测的奸细，教皇认为他们是胆大妄为的叛教者。他们总是试图在两大强力集团间铤而走险，但结局总落得很惨。《尼布楚条约》签定，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刻。他们希望中国人收复了土地，俄国人开展了贸易，两全其美；而耶稣会，既博得皇帝的欢心获取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机会；又博得沙皇的欢心准予开放从欧洲到中国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通道。一箭双雕。不料戈洛文使团还没有回到莫斯科替他们美言，彼得大帝就于1689年10月关闭了莫斯科的耶稣会教堂与住院，驱逐所有的耶稣会士。一端失落了，还有另一端，莫斯科的不幸消息1694年传到北京，耶稣会士们正在中国享受“尼布楚胜利”的成果，可三十年后，这一成果也失落了。两端都踏空，1727年皇太子警告为葡萄牙来华大使充当翻译的巴多明神父等说：

“你们像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一旦两只船分开了，你们就掉到水里去了。”^②

① 《格列佛游记》第一卷，第四章。

② 巴多明神父1727年11月的信，见《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155页。

